

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

碩士論文

北京視野下的兩岸關係：角色理論的觀點



指導教授：黃瓊菽 博士

研究生：張忠慎 撰

中華民國一〇七年一月

## 謝辭

研究生涯將告個段落，一路上有各種情境，砥礪抑阻礙存乎一心。「人之所以偉大，乃在於它是橋梁而不是目的；人之所以可愛，乃在於它是過度和沒落。」感謝在路上幫助的師長與朋友，沒有這些機緣無法成為現在的自己。感謝父母的無條件正向關懷；感謝瓊菽老師的不離不棄，感覺已經到了溺愛的程度；感謝朋友們的各種「協助」，幫助我時時了解戴奧尼索斯，進入無意識的荒野；感謝總能讓我平靜的繆思。我懷念這段期間的日與夜。

忠慎

2018年2月9日 木柵



## 摘要

本研究主要動機在於兩岸關係的複雜與動態發展的特性，不能簡單的一言以蔽之，複雜在於中國的變化以及兩岸主權的特殊性。本文聚焦的重點在於，透過角色理論的爬梳，先探討中國角色型塑的過程。透過中國的歷史自我以及中國是天下觀底下培養出的他者投射，兩相結合整理中國的角色變化。尤其在中國邁入現代後賦予其「身分」與「地位」兩個自我概念，再試圖整理現代中國自我認知與他者投射後產出的角色。透過中國大陸的角色建構過程，分析中國在特定時間內的角色以及其特性。

其次，透過大小政治實體理論，以及中國自身的角色變化，觀察中國越南與中國朝鮮兩個不對稱理論的案例實踐中，中國作為大政治實體展現出的特性。中國在實踐中越關係以及中朝關係時，一方面受到自身角色的影響，另一方面受到不對稱關係交流中的限制，並不能無視小國意願的為所欲為。因此。透過中國與越南和朝鮮的關係實踐，可以對於中國在大小政治實體概念中，處理兩岸關係的啟示。

最後，整理不對稱理論中小國對於大國的可能選擇，以及中國大陸的角色變化，搭配兩岸關係三十年間的重要轉折點，將兩岸關係分為四個具有重要特性的時間段。希望藉此回答中國大陸自身在兩岸關係中的變與不變。

關鍵詞：兩岸關係、角色理論、大小政治實體

# 目次

<b>第一章</b>	<b>緒論</b> .....	<b>1</b>
第一節	研究背景、動機與問題 .....	1
第二節	文獻回顧與研究方法 .....	7
第三節	研究架構與章節安排 .....	22
<b>第二章</b>	<b>中國大陸在國際場域的角色建構過程</b> .....	<b>26</b>
第一節	中國的「歷史自我」 .....	28
第二節	中國式世界觀底下培養出的他者投射 .....	45
第三節	小結 .....	57
<b>第三章</b>	<b>大小政治實體下的中國角色</b> .....	<b>62</b>
第一節	大小政治實體框架下的大國角色建構 .....	63
第二節	大小政治實體下的中國—越南關係與中國的角色 .....	71
第三節	大小政治實體下的中國—朝鮮關係與中國的角色 .....	80
第四節	大小政治實體概念對於理解中國處理兩岸關係的啟示 .....	86
<b>第四章</b>	<b>中國的角色認知與兩岸關係實踐</b> .....	<b>93</b>
第一節	大小政治實體理論與小國的選擇 .....	95
第二節	兩岸關係的初始：從融冰到破碎（1987-1996） .....	98
第三節	由熱到冷：武嚇台獨乃至法理反獨（1996-2005） .....	103
第四節	兩岸的再接觸：反獨到促統的轉移（2005-2015） .....	109
第五節	重新結凍：馬習會至今（2015 至今） .....	114
<b>第五章</b>	<b>結論</b> .....	<b>118</b>
<b>參考文獻</b>	<b>123</b>	

## 圖目錄

圖 1-1	大小政治實體模型 .....	22
圖 1-2	大小政治實體建構中國模型 .....	23
圖 3-1	中國角色變化圖 .....	67
圖 3-2	中越關係時間圖 .....	73
圖 3-3	中朝關係時間表 .....	80
圖 4-1	扈從、避險與抗衡光譜圖 .....	96



## 表目錄

表 1-1	兩岸關係以領導人任期與「一中原則」分期 .....	3
表 5-1	中國歷史自我角色表 .....	119
表 5-2	中國角色斷代以及中越、中朝與兩岸關係比較 .....	120



# 第一章 緒論

## 第一節 研究背景、動機與問題

### 壹、研究背景

1949年國民黨與共產黨在中國大陸的戰爭在國民黨播遷至臺灣後暫時劃下了逗點。自此開始，國民黨政府與共產黨政府隔岸而治，宣稱彼此擁有對方的主權並在國際上互爭中國正統，開啟了兩個政治實體隔海而治的現象，可謂之兩岸關係的濫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世界情勢轉換為冷戰格局，以美國為首的民主勢力與以蘇聯為首的共產勢力在全球意識形態場域做政治角力。當時的國際關係背景為美蘇兩大超級強權所主導的兩強結構，在這樣的背景下，兩岸關係鑲嵌在兩強的國際體系中。一開始，做為中華民國盟友的美國以自身利益為考量，支持退居臺灣的國民黨政府為中國正統，藉以箝制共產主義的發展。然而，蘇聯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在1957年後迅速交惡，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始攻擊蘇聯共產主義為「修正主義份子」，拉攏第三世界國家開啟美蘇兩強之外的第三條道路，開展了數十年的中國自身外交道路。在政治現實的理解與國際情勢的改變下，美國認為拉攏中華人民共和國始能更有效地壓制蘇聯勢力以及維護自身的利益。是故，1971年的聯合國第2758號決議讓中華人民共和國取得聯合國的中國代表權，自此開始，國際的天平漸漸導向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方。此外，中華人民共和國與美國在1978年發表了「中美建交公報」，正式與臺灣斷絕了外交關係。臺灣與美國斷交後，中華人民共和國透過1979年第五次「告臺灣同胞書」表達和平統一的目標，並呼籲兩岸應增加彼此的認同與回歸意識，增強彼此交流。時任中華民國總統的蔣經國因此發表了「不接觸、不談判、不妥協」的三不政策回應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訴求。直到1987年臺灣方面開放民眾到大陸探親，兩岸關係才

進一步有了實質上的交流與進展。<sup>1</sup>

在這段時間中，中國大陸靠著自身綜合實力慢慢林列強國之列。中國大陸自 1978 年第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啟了社會主義市場化經濟改革（socialist market reform），這是亞洲共產主義國家轉型的主要模式。改革開放後，吸取了「市場化」的概念，將計畫經濟與市場調節做出結合。隨著時空的遷移，經濟發展的方式漸漸向「市場化」靠攏，也達成了過去中國大陸數十年的經濟高成長，直至今日，中國大陸已是單一國家國內生產總值（GDP）僅次於美國的世界第二，<sup>2</sup>軍事實力排名世界第三。<sup>3</sup>軍事花費全球第二，<sup>4</sup>儼然有了逐鹿世界的強國之勢。自 1987 年以來，兩岸因語言文化相通，以及產業之間具有互補性，經貿往來急遽升高。臺灣的兩岸貿易占外貿比重從 1988 年突破 2% 後一路上升，2009 年至今都維持超過 20% 的貿易比重。臺灣的對外投資自 1991 年累計至 2016 年有高達 60.1% 是在中國大陸地區。<sup>5</sup>除了經貿之外，兩岸民間各個領域也交流日盛，文教交流、觀光產業交流、社會交流等等自不在話下。然而，兩岸之間並沒有簽屬任何停戰協議，在法理上仍處於戰爭狀態，就連目前為止兩岸關係最為良好的馬英九總統時期，大陸當局在東南沿海的武裝部屬也沒有下降的趨勢。在兩岸的各類交流與協定中均未觸碰到政治領域的議題。形成了特殊的兩個政治實體之間「經濟熱、政治冷」的現象。

---

<sup>1</sup> 童振源，「兩岸關係與區域經濟」，王振寰、湯京平、宋國誠，**中國大陸暨兩岸關係研究**，（新北市：巨流，2011 年），頁 500。

<sup>2</sup> The World Bank GDP ranking 2015, World Bank Group. 檢索日期：2017 年 6 月 10 日。  
<<http://data.worldbank.org/data-catalog/GDP-ranking-table>>.

<sup>3</sup> Global Firepower Countries Ranked by Military Strength 2016, Global Firepower. 檢索日期：2017 年 6 月 10 日。<<http://www.globalfirepower.com/countries-listing.asp>>.

<sup>4</sup> SIPRI Fact Sheet Trends in World Military Expenditure 2015, Stockholm 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 檢索日期：2017 年 6 月 10 日。  
<<http://books.sipri.org/files/FS/SIPRIFS1604.pdf>>.

<sup>5</sup> 『兩岸經濟統計月報』，（台北：行政院大陸委員會）120 期 表八 臺灣對大陸貿易占我外貿之比重。檢索日期：2017 年 6 月 10 日。

<<http://www.mac.gov.tw/public/MMO/MAC/%E5%85%A9%E5%B2%B8%E7%B6%93%E6%BF%9F%E7%B5%B1%E8%A8%88%E6%9C%88%E5%A0%B1no.1208.pdf>>、284 期 表二 兩岸貿易占外貿比重。檢索日期：2017 年 6 月 10 日。

<[http://www.mac.gov.tw/public/MMO/MAC/284\\_2.pdf](http://www.mac.gov.tw/public/MMO/MAC/284_2.pdf)>、284 期 表十 我國對外投資統計-國家（地區）別。檢索日期：2017 年 6 月 10 日。

<[http://www.mac.gov.tw/public/MMO/MAC/284\\_10.pdf](http://www.mac.gov.tw/public/MMO/MAC/284_10.pdf)>。



兩岸關係自 1987 年至 2017 年的三十餘年間，由於各自的國內發展、世局遞嬗與相互的理解程度，彼此間的交流經歷了冷熱之間的各種變化，臺灣當局與大陸當局也經歷了不同的角色轉換。當中筆者認為影響兩岸冷熱最為關鍵的議題在於兩造政府對於臺灣是否仍在「一中原則」中的認知，若中華民國政府對外不主張臺灣獨立，符合「一中原則」的架構下雙方較可能走向合作（熱）；反之，中華民國政府對外有臺灣獨立的傾向時，雙方則容易走向對抗（冷）。若參考臺灣總統的任期與官方聲明如何處理「一中原則」的特性為界，可以粗斷為六個階段。

6

表 1-1 兩岸關係以領導人任期與「一中原則」分期

時間	1988-1995	1995-2000	2000-2002	2002-2008	2008-2016	2016-今日
臺灣領導人	李登輝	李登輝	陳水扁 <sup>7</sup>	陳水扁	馬英九	蔡英文
大陸領導人	江澤民	江澤民	江澤民	胡錦濤	胡錦濤、習近平	習近平
臺灣對「一中原則」以的態度及實際作為	正面：國家統一綱領	正面：兩國論	負面：四不一沒有	負面：一邊一國、入聯公投、終止國統綱領	正面：九二共識	負面：九二會談歷史事實 <sup>8</sup>
陸方代表性回應	關係正常化、增加交流	武力威脅	降低交流	反分裂國家法	增加交流、領導人會面	暫緩政府交流，加強民間工作

資料來源：作者自繪

<sup>6</sup> 此分類參考蘇起於 2016 年 2 月 22 日在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的演講。

<sup>7</sup> 陳水扁總統的任期先熱後冷，在陳水扁總統的第一任期前半段，提出了「四不一沒有」藉以將民進黨的意識形態靠近北京。此外，更以「積極開方、有效管理」取代「戒急用忍」，一直到陳水扁總統於 2002 年 8 月 3 日向東京世台會年會發表視訊談話時提出「一邊一國」始與中國大陸越走越遠。

<sup>8</sup> 九二會談歷史事實難以界定，可以解讀為不承認「九二共識」，也可以解讀為民進黨立場下最接近承認「九二共識」的表述，然目前尚未被北京接受。

上表可以注意到幾個關鍵，首先，本表認為雙方交流冷熱的重要關鍵在於主權的認知，也就是「一個中國」原則。臺灣需要在同意「一個中國」原則的架構下北京才會同意與臺灣交流，甚至給予臺灣國際空間。其次，臺灣是否實際上挑戰「一中原則」不僅是我國的宣稱，尚需考量北京的認知。如陳水扁時期的「四不一沒有」政策有著明顯向大陸示好的意涵，然大陸方面不認為這項聲明可以抹去陳水扁台獨背景的疑慮，沒有正面回應臺灣所釋放出的善意，這也導致日後陳水扁政府與北京漸行漸遠，這說明了兩岸關係的認知是在雙方不斷互動下所展現出的成果。進一步闡述，在雙方交流的過程中，政府的公開文書並不完全代表了兩岸關係的實際情況，雙方在「言」與「行」之間往往會出現落差。Brantly Womack認為雙方在缺乏互信下，更容易忽略善意舉動並放大負面行為，這說明了為何民共之間較難產生互信進而合作。<sup>9</sup>最後，中國大陸在處理臺灣給予的主權挑戰時，方式自古而近的出現了變化。從 1995-1996 年的武力展現，到 2005 年透過法理（反分裂國家法）的方式與 2016 年至今的官方限縮民間擴大。可以觀察出中國大陸在雙邊交流中的角色是有在調整的，在二十年間從軍事大國演變為綜合實力強國。這不但表現出了中國在世界的位置與角色出現變化，也將此變化展現在兩岸關係的處理中。

本文試圖透過中國大陸的角色變換解釋兩岸關係自 1987 年至 2017 三十年間的變化。時至今日，中國的角色也從「韜光養晦，有所作為」的沉潛到「大國」、「負責任大國」國際角色賦予，近日甚至輸出了中國自身價值，頗有中國人民站起來了之勢，<sup>10</sup>中國大陸在世界舞台上的重要性已不容忽視。有鑒於兩岸的歷史淵源、中國共產黨的意識形態與中國在世界參與的重要性日益上升，兩岸關係的

---

<sup>9</sup> Brantly Womack 在 2010 年的 *China among Unequals Asymmetric Foreign Relationships in Asia* 書中提出美中與美台的兩條「尊重與順從 (Acknowledgment-for-Deference)」(簡稱 AFD) 關係是美中台不對稱戰略三角的穩固基礎，AFD 的概念類似於扈從，只是這個概念更需要雙邊具有共識方能完成。他提出 2008 年馬英九上台後中台雙方也出現了 AFD，這改善了雙方原本緊張的關係。放入兩岸關係的歷史，台北對北京 AFD 不僅是台北方的表態，尚須受到北京方的認證，這也是為何在陳水扁初期與現任蔡英文時期都有向北京釋出善意但仍不被北京接受的原因。所以本文對於扈從與否的定義在於臺灣有沒有主權獨立的聲明。

<sup>10</sup> 如早期的孔子學院嘗試、北京共識的討論、中國夢的拓展、屠呦呦獲得諾貝爾醫學獎等等，都是中國試圖打入西方世界價值體系的嘗試與例證。

內涵成為了臺灣發展的決定性因素。臺灣越來越難以繞開中國獨自在世界舞台中發聲。當此之時，兩岸關係的重要性日益增長，理解兩岸關係的局面，將會是臺灣如何在世界上自處所不能忽視的議題。在這個脈絡中，解讀中國看待兩岸關係的觀點、閱讀中國理解自身在此關係中的角色定位與對臺灣的角色期待，既有助於理解兩岸間大小政治實體如何在理論與實務層次實踐角色，更能幫助吾輩進一步認識兩岸關係的本質與基礎。

## 貳、研究動機

過去三十年的兩岸關係的研究已是汗牛充棟；現有研究中，多將重點置於短期個案的分析，攸關兩岸關係理論的典範研究較為匱乏。國內不少學者關懷兩岸關係研究在臺灣學術界的發展何以無法與國際關係研究相比。例如中研院院士吳玉山認為正是因為兩岸關係對臺灣發展具有迫切性，所以學術界對於相關議題的研究均偏重於重大事件的分析和政策建議，罕有純粹學術性與理論性探討的作品。<sup>11</sup>楊開煌也認為兩岸關係研究為政治服務的性質過重，所以成為了「政策」導向的學科，大部分學者將重點放在兩造的行為預測，而又因為臺灣的民主體制，影響了兩岸研究的時效性，結果兩岸關係研究的源頭不是學術本身的自我碰撞、反省和批判，而是來自兩岸當局的政策互動和社會萬象，這將導致兩岸關係研究的學術內涵更加退化。<sup>12</sup>

吳玉山將既有的兩岸關係研究區分三個主要面向：國內政治（國內因素如何影響兩岸關係）、國際環境（國際體系如何影響兩岸關係）與兩岸互動（兩岸互動的模式），<sup>13</sup>這三個大面向互相影響彼此交融，揉合出了有起有落的兩岸波濤。然而，既有研究如大小政治實體與傳統戰略三角的研究途徑容易將中國大陸定位為對臺灣具有主權要求的強大政治實體，這將會忽略中國大陸自身的變化。而關注中國大陸自身變化的中共外交研究仍有應用在兩岸關係的空間。所以本文試圖

---

<sup>11</sup> 吳玉山，「爭辯中的兩岸關係理論」，包宗和、吳玉山，**爭辯中的兩岸關係理論**，二版（臺北市：五南，2012年），頁24。

<sup>12</sup> 楊開煌，**出手-胡政權對台政策初探**，（臺北：海峽學術出版社，2005年），頁21-26。

<sup>13</sup> 吳玉山，「爭辯中的兩岸關係理論」，包宗和、吳玉山，**爭辯中的兩岸關係理論**，二版（臺北市：五南，2012年），頁1。

在現有的基礎上，將國際環境與兩岸互動做出結合。透過國際環境中的中國身分、位置改變的角色變化如何影響兩岸互動做出詮釋。本文希望透過外交決策分析的途徑，即角色理論（role theory in foreign policy analysis）的視角，解讀中國大陸這三十年間的變化，同時將中國大陸對自身角色的認識放入權力不對稱（theory of asymmetric relations）理論的框架中進一步分析，以解析中國大陸的國際角色變遷與兩岸在權力結構不對稱下交流的事件與現象。希望藉由本研究的成果，提供另外一種兩岸關係研究的視角。

### 參、研究問題

有鑑於本文試圖將中國大陸的角色發展與兩岸關係作出結合，所以研究問題在於探討三十年的兩岸關係發展中，中國大陸自我認知的改變及其影響，特別是對於兩岸關係的影響。北京視自身的主權與領土完整性為意識形態中的核心議題（hard core），<sup>14</sup>兩岸關係的重要性自不言而喻。是故，中國大陸的角色轉變與兩岸關係的影響在理解中國的探討上就具有了相當研究意義。

本研究將中國大陸對於自身「角色」的認知做為自變項，並將「兩岸關係」作為依變項，觀察中國大陸角色變化所發生的改變。<sup>15</sup>本研究認為，中國大陸融入國際體系的程度越高，將越容易受到其他國家的期望與外部體系的限制，在與體系的其他行為者互動中形塑出自身角色認知。換言之，在這個過程中，中國大陸的角色不斷調整與修正，和其自身的變化以及與他者的接觸和其他行為者對中國的角色期望高度相關，共同形塑出今日中國的面貌，進而改變了兩岸關係的發展。

承上所述，本文的研究問題包含以下兩個部分：

1. 中國大陸三十年如何理解與實踐自身在世界舞台上所扮演的角色？其角色認知是否發生了改變？

---

<sup>14</sup> 可參見於上海公報、建交公報、八一七公報、五四憲法、八二憲法中的一個中國原則。

<sup>15</sup> 誠然兩岸關係直觀而言就是「挑戰與回應」的模式，但是相似的挑戰在不同的狀態中會有不同的回應。舉例而言，中國大陸曾在1995-1996年以今日北韓式的回應面對昔日臺灣給予的挑戰。但是相距十年後則改以制定「反分裂國家法」的方式作為臺灣挑戰中國大陸主權紅線的回應。



2. 倘若中國大陸對自身角色的認知與理解確實發生改變，這些改變如何影響中國大陸處理兩岸關係的方式以及其看待兩岸關係的觀點？

## 第二節 文獻回顧與研究方法

### 壹、文獻回顧

筆者因應本研究的需求，將文獻分為兩個面向，分別為：兩岸關係研究、中國的角色與角色理論。如下圖所示，目前主流兩岸關係研究包含了國內政治、國際環境與兩岸互動。而中國的角色研究主要出現在國際關係中探討中國對外關係的文獻中，較少見於兩岸關係的研究中，<sup>16</sup>本研究試圖將中國的角色變化帶入兩岸關係研究的視野。所以本節首先爬梳既有兩岸關係研究的三個主要面向，後探討中國在世界中的角色變化。又由於筆者希望借用大小政治實體的分析架構，所以會特別著墨於大小政治實體。相信藉由這些文獻可以幫助本研究釐清本文的研究問題與架構。

#### (一) 兩岸關係研究

前文提出吳玉山將現有兩岸關係研究主要分為三個部分，分別為國內政治、國際環境與兩岸互動。現有兩岸關係研究也可歸類在這三樣範疇中，本文將依據這個分類處理相關研究，然會將國際環境面向中的部分重疊研究移至中國的角色與角色理論中探討。必須再次強調兩岸關係研究是三個不同部分的集合，所以學者會跨越不同面向探討他們關注的議題，下述的分類僅是參考大致的研究方向而非完整且嚴謹的分類。

#### 1. 國內政治面向

國內政治面向希望了解臺灣內部的決策背景與限制，繼而影響兩岸關係的變

---

<sup>16</sup> 戰略三角分析途徑是個例外，戰略三角在兩岸關係研究中普遍將美、中、台視為戰略三角中的三個行動者，三邊的關係良好與否決定該戰略三角的穩定性。

化，如臺灣內部認同、民意與選舉投票行為、臺灣的國家性質如何影響臺灣對中國大陸的政策等等。代表著作有吳玉山Taiwan's Domestic Politics and Cross-Strait Relations，<sup>17</sup>文中藉由兩岸互動理論的大小政治實體理論導引，將臺灣的大陸政策分為「扈從」與「對抗」兩個面向，進而探討臺灣國內因此而發展的兩岸關係變化。其次，Sobel, Richard、Haynes, William-Arthur、Zheng, Y. U.<sup>18</sup>三人與Lynch, Daniel C<sup>19</sup>均從「認同」的角度出發，分析臺灣的歷史背景、文化傳統與交流過程中發生的認同的變化，進而探討現象的發生。冷則剛<sup>20</sup>則從「國家與社會關係」出發，討論臺灣民主化後使得「發展性國家」的國家與社會互動產生變化，進而影響到國家自主性及國家能力，借以探討「發展性國家理論」在臺灣1990年後的可適用性與臺灣的大陸經貿政策根源。

## 2. 國際環境面向

國際環境面向關注兩岸關係在國際大環境中所受到的影響。可粗分為現實主義與自由主義兩樣範疇。以現實主義為出發的兩岸關係研究可見於John Mearshimer在新版『大國政治的悲劇』中的附錄，「向臺灣說再見？」。<sup>21</sup>Mearshimer臺灣在現有的國際格局下有幾個選項，其一為發展核武，其二為發展傳統嚇阻能力，其三就是選擇香港模式，盡可能地從北京手中取得自治權。另一方面，包宗和在戰略三角模型上的應用<sup>22</sup>也是現實主義中的一環。包宗和將美、中、台至於戰略三角的三個端點檢視了1950年代到1995年後的美中台的三方博弈中的六個戰略三角時期變化，認為三方間若沒有兩方過度接近或是敵對，將可在戰略三角

<sup>17</sup> Wu, Yu-Shan.2005."Taiwan's Domestic Politics and Cross-Strait Relations."*The China Journal* (53), pp. 35-60.

<sup>18</sup> Sobel, Richard, William-Arthur Haynes, and Y. U. Zheng.2010."Trends-Taiwan Public Opinion Trends, 1992-2008: Exploring Attitudes on Cross-Strait Issues."*The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74 (4), pp. 782-813.

<sup>19</sup> Lynch, Daniel C.2004."Taiwan's Self-Conscious Nation-Building Project."*Asian Survey* 44 (4) , pp. 513-33.

<sup>20</sup>冷則剛，「大陸經貿政策的根源：國家與社會的互動」，包宗和、吳玉山，爭辯中的兩岸關係理論，二版（臺北市：五南，2012年），頁149-184

<sup>21</sup> John Mearshimer 著，潘崇易、張登及譯，大國政治的悲劇，一版二刷（臺北市：麥田出版社，2014），頁476-493。

<sup>22</sup>包宗和，「戰略三角角色轉變與類型變化分析-以美國和台海兩岸三角互動為例」，包宗和、吳玉山，爭辯中的兩岸關係理論，二版（臺北市：五南，2012年），頁233-250。

中保持一種微妙的平衡。但是傳統的戰略三角模型並沒有考量不同點之間的國力大小變化，沈有忠<sup>23</sup>與Womack<sup>24</sup>均對戰略三角模型做出改良，補充了三角中國力大小的影響。Phillip Saunders也透過美中台三方的關係解讀未來的可能性，他認為美國不應該在一個中國問題與美國對台援助的矛盾上多作描述，應該盡可能的模糊相關用詞而關注於保持現狀。然而，未來趨勢終將可能迫使美國在臺灣與大陸間做出選擇。<sup>25</sup>除了現實主義外，袁易所提出的「安全典則」基本上屬於自由主義的範疇中。袁易比較了新現實主義與新自由主義後，認為國際典制是兩派學者間的一個交集。依循國際典制的脈絡，他認為美中關係已在柯林頓總任內發展了美中的安全建制，藉以觀察美國如何應應中共的崛起，可以做為兩岸關係互動的參考。<sup>26</sup>

### 3. 兩岸互動面向

兩岸互動面相注重兩岸交流與互動，如兩岸如何整合的探討。代表著作有整合理論、分裂國家模式、大小政治實體與兩岸協商。整合理論是功能主義、新功能主義與聯邦主義的結合。高朗透過這三個學說應用到了兩岸關係，試圖釐清兩岸之間未來的可能解決方式。功能主義認為兩個政治實體若通過經濟的結合與共同面對環境與社會問題，將會漸行漸近，進而透過下而上的社會力量整合在一起。新功能主義並不排除功能主義的影響力，但是加入了上而下的政治力互動，新功能主義認為單純自下而上的擴散不必然的可以讓兩個國家間產生政治結合，政府會在中間扮演更重要的角色。聯邦主義則認為重點不在雙方整合過程，而是要建立一套成員間享有自治的權力進而達到共治的目標。由這三個理論來看兩岸關係的發展可以發現均不具有完全的適用性，功能主義的以經促政功能在兩岸間非常

---

<sup>23</sup> 沈有忠，「美中台三角關係：改良的戰略三角分析法」，*展望與探索*，第4卷第3期(95年3月)，頁39-32。

<sup>24</sup> Womack, Brantly: *China among Unequals Asymmetric Foreign Relationships in Asia*, World Scientific Publishing Press, Singapore, 2010. pp. 383-392.

<sup>25</sup> Saunders, Phillip C. 2005. "Long-term Trends in China-Taiwan Relations: Implications for U.S. Taiwan Policy." *Asian Survey* 45 (6), pp. 970-91.

<sup>26</sup> 袁易，「安全典則與美『中』關係：一個認知社群的分析」，包宗和、吳玉山，爭辯中的兩岸關係理論，二版（臺北市：五南，2012年），頁269-299。

緩慢、新功能主義的高層互動則有許多政治菁英的歧見、聯邦主義則在看到香港經驗後裹足不前。最重要的，臺灣當局與人民樂見於整合的比例也很低。<sup>27</sup>分裂國家模式的模型為東西德與南北韓的經驗，然而，張五岳也提出了分裂國家模式在兩岸關係中最大的不適用點，就是北京始終不願承認臺灣是與其對等的政治實體。在這樣的巨大困境前兩岸關係目前最重要的是「求同存異」創造雙贏，縱然對國家問題有不同的見解，但仍應以臺灣人民的利益作為出發點。<sup>28</sup>

在國際現實中，強而有力的大國與小國之間如何交流是兩造都須面臨的議題，大小政治實體就是觀察兩個實力不對等政治實體之間的交流理論，目的在於建立一個穩定的不對稱關係。大小政治實體的個案研究自古至今層出不窮，首次進入兩岸關係研究視域正是吳玉山借鑑俄羅斯與過去蘇聯國家之間的互動發展而來的。吳玉山在研究中提出在權力不對稱和大國對小國有主權要求的情況下，小國的選擇將變得非常有限，將會在「抗衡」(balancing)與「扈從」(bandaging)中作出選擇。而「抗衡」與「扈從」之間的選擇將會受到小國的內部與外部兩個主因的影響。內部因素主要有經濟發展程度、國內認同、文化差異和歷史經驗，外部因素主要是西方國家的支持程度，其中經濟發展程度與西方國家的支持程度尤為重要，這兩個主要因素將會決定小國的生存策略。若經濟發展良好且受到西方國家高度支持，將會選擇「抗衡」。反之，則會選擇「扈從」。吳玉山認為實力差距是兩岸關係中的決定性因素。在兩岸關係中，北京的政策是屈服臺灣的意志，而臺灣的選擇有「抗衡」與「扈從」兩個選擇。「抗衡」與「扈從」兩個光譜間的擺渡將會取決於臺灣的經濟發展實力與美國的支持程度。<sup>29</sup>吳玉山在這個研究假設下將中國大陸設定為對臺灣有主權要求的強國，探討臺灣在這樣的結構中與內外部的變化下該如何在「扈從」與「抗衡」中作出選擇，進一步在這個結構下

---

<sup>27</sup>高朗，「從整合理論探索兩岸整合的條件與困境」，包宗和、吳玉山，爭辯中的兩岸關係理論，二版（臺北市：五南，2012年），頁19-51。

<sup>28</sup>張五岳，「分裂國家模式之探討」，包宗和、吳玉山，爭辯中的兩岸關係理論，二版（臺北市：五南，2012年），頁53-79。

<sup>29</sup>吳玉山，「臺灣的大陸政策：結構與理性」，包宗和、吳玉山，爭辯中的兩岸關係理論，二版（臺北市：五南，2012年），頁109-135。



分析各個政黨在「選票極大化」的理性抉擇中，如何影響各政黨的大陸政策。

吳玉山的著作重點著墨在臺灣自身的選擇，若欲關注大小政治實體中中國大陸的部分時時，則可參考Womack在2006年與2010年的兩本著作。Womack在2006研究中越關係時使用了大小政治實體的概念，關注於中國與越南之間的關係。更在2010年<sup>30</sup>改良了既有的傳統戰略三角模型，建構出了大小政治實體下的戰略三角（Asymmetric triangles）。值得注意的是Womack筆下的「抗衡（defiance）」與「扈從（deference）」主要是說明小國對大國時所展現出的兩種可能態度，與吳玉山的權力平衡（balance of power）概念有所不同，他認為兩岸關係中的實力分布是美國大於中國大於臺灣的羅曼蒂克型三角。在這段羅曼蒂克三角美國中擔任了責任重大的側翼（Pivot）角色，需要成為這個三角中的和平維護者或和平倡議者，反而付出最多得到最少。中國則因為美國的介入無法武力統一臺灣且不滿於現況，臺灣也不滿不能違反美國的一個中國原則，必須在一中原則中尋求與中國對等的關係，臺灣同時也是三角中最脆弱與容易感到不安全的一方。<sup>31</sup>

此外，兩岸協商關注在兩岸交流本身，吳秀光以博弈理論為出發點，將兩岸協商的狀況如議題的可操作性、時間成本、協議強制性的變數代入各面向中，將實務面的談判發展為博弈理論的兩岸關係研究內涵。<sup>32</sup>趙建民分析2008年以來的兩岸談判為個案，探討中共的原則問題與談判策略進而描繪出中共談判的制度化軌跡。<sup>33</sup>

## （二） 角色理論與中國的角色變化

中國的角色變化是研究中國對外關係中的重要議題，本研究希望除了中國對外關係外，也可以將中國的角色變化帶進兩岸關係研究的視野。所以本研究將利

---

<sup>30</sup> 吳玉山，「爭辯中的兩岸關係理論」，包宗和、吳玉山，**爭辯中的兩岸關係理論**，二版（臺北市：五南，2012年），頁109-147。

<sup>31</sup> Womack, Brantly., *China among Unequals Asymmetric Foreign Relationships in Asia*, World Scientific Publishing Press, Singapore, 2010. pp. 383-392.

<sup>32</sup> 吳秀光，「兩岸談判之結構分析：由博弈理論出發」，包宗和、吳玉山，**爭辯中的兩岸關係理論**，二版（臺北市：五南，2012年），頁53-79。

<sup>33</sup> 趙建民，「中共談判行為」，蘇起、童振源，**兩岸關係的機遇與挑戰**，初版（臺北市：五南，2013年），頁123-143。

用角色理論的理論引導關注中國的角色變化，後進一步的與現有研究對話。

## 1. 角色理論

如何了解國際之間的外交政策，一直是國際關係研究中的重要問題。角色理論運用在國家行為的觀察上就是將國家「擬人化」。角色理論始於國際關係中的外交決策分析研究（Foreign Policy Analysis 簡稱 FPA）脈絡中，K.J.Holsti 在 1970 年所發表的“National Role Conceptions in the Study of Foreign Policy”<sup>34</sup> 中的國際角色概念是公認角色理論在國際關係中的首次應用。回顧 Holsti 的主張，他在文中統整了許多人的蓋定並加以統整，如印度哲人 kautilya、現實主義大師 Morgenthau 等等。Holsti 認為國際社會就是一個舞台，而國家則擬人化為舞台上的表演者，每個表演者都有他所要扮演的角色，他的行為也將會受到他所賦予的角色制約。Holsti 在文中提出了十七個角色類型進而有了角色功能上的區別。進一步分析，他認為角色行為（Role Performance）取決於幾個由下而上的面向，自身文化、社會結構與組織、法律、需求與目標和價值將會形塑出自我角色的概念，受自我詮釋後會明瞭所扮演的角色類型，進而出現角色行為的差異。<sup>35</sup>

角色理論一度在國際關係理論中很火熱，在八零年代時，美國政治學界興起了行為主義風潮，行為主義認為國家可以如同人一般的測量，這也導致角色理論的熱度不斷上漲。但是九零年代後整體研究就被導引到了文化途徑，角色理論也在冷戰結束以後式微了。Thies 認為 Holsti 的研究開啟了第一波的角色理論熱潮但同時 Thies 也認為 Holsti 尚未嚴謹的學術定義角色理論。Holsti 聚焦在國家自我（Self）如何影響對外政策的概念上。早期的角色理論受到社會學、人類學的影響，較為重視結構對角色的影響，那時候並沒有解釋角色的出現與行為者如何選擇角色，決策者其實有不同的角色可以選擇，角色的能動性沒有特別被表現出來。這同時也給予了角色理論研究範圍的限制。<sup>36</sup>簡言之，現在的角色理論與

<sup>34</sup> K. J. Holsti, "National Role Conceptions in the Study of Foreign Policy."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14, No. 3 (Sep., 1970), pp. 233-309.

<sup>35</sup> K. J. Holsti, "National Role Conceptions in the Study of Foreign Policy.", p. 240.

<sup>36</sup> Cameron G. Thies. & Marijke Breuning, "Integrating Foreign Policy Analysi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rough Role Theory." *Foreign Policy Analysis*, (2012), pp. 1-4.

第一波角色理論的不同主要在於國家如何建構角色上做出改良，進而發展出外交決策分析（FPA）外的國際關係研究（IR）貢獻。

角色理論現在生意盎然，但也因為不像現實主義與自由主義般已有長時間的發展歷史與非常明確的理論主導性（主導線），所以我們比較常將角色理論作為補足建構主義中的中層分析途徑。Sebastian Harnisch 提出角色理論的精神在於互動，透過不斷的互動過程可以更清晰的看出國家的對外政策邏輯。除此之外，也可以補充建構主義中的角色能動性論述如反映評鑑（reflected appraisals）或鏡像模仿（mirroring）擔任結構中的橋樑。<sup>37</sup>在互動間用比喻的方式形容國家在環境裡面的互動，也因為比喻在使用的時候需要較多詮釋，所以在應用上顯得雜亂。舉例而言，角色理論中形塑自我的「他者投射（altercasting）」行為就是用詮釋的方式，藉以說明國家在看待自己角色的時候如何詮釋這個角色與自我定義，再基於這個角色來與他者互動，又透過互動的過程改變了對自身角色的想法。Harnisch 認為國家的角色建構（Role conception）是內在自我（The Self）與外在的結構以及他者（The Others）的動態結合下的產物。自我（The Self）的內涵有未受規範的原始自我（I）和透過與他者互動後明瞭所該扮演角色的受規範自我（Me），兩者將會形塑出具有身分認知的自我（The Self）。他者（The Others）則是幫助自我建構的外在因素，主要分為一般性的他者（Generalized Other）、重要性的他者（Significant Other）以及結構性他者（Organized Other），這些不同性質的他者將回饋到自我做出角色的建構。除此之外，Harnisch 在研究中國角色中發現中國的「歷史自我」（Historical Self）對於中國現今的行為擁有巨大的影響力。在國際上高呼保護人權是許多國家的基本價值也是一個國家「先進」與否的指標，但若是及到領土問題時中國就會表現得非常保守而不願表態，原因就是中國自身揹負了許多領土上的困擾如西藏與新疆等等。<sup>38</sup>

<sup>37</sup> Sebastian Harnisch, "Conceptualizing in the Minefield: Role Theory and Foreign Policy Learning." *Foreign Policy Analysis* Vol. 8 (2012), p. 63.

<sup>38</sup> Sebastian Harnisch, "China's Historical self and its international role." Harnisch, Sebastian, Sebastian Bersick, and Jörn-Carsten Gottwald. *China's International Roles : Challenging or Supporting International Order?*(NY : Taylor & Francis, 2016), Volume 3, p. 46.

除此之外，國家不會僅有一個角色，以美國的角色建構為例，美國自詡是世界和平的維護者，但是當涉及美國自身利益時，美國也會在未經聯合國同意且證據不完全下出兵伊拉克。這兩個矛盾的行為正說明了角色行為是個國際、國內等多項因素有機互動下的產物，且會因為外在期待與環境變遷中不斷更替。<sup>39</sup>

最後，Thies對角色建立提供了另外另一項視野，他將角色的建立與變化統整為四個面向。角色期待（role expectations）、角色需求（role demands）、角色定位（role location）、和觀眾效應（audience effects-including cues）。角色期待的概念包含準則、信念，以及個體在其社會地位中的表現偏好；角色的概念在根本上是一種互動行為，所以角色期待也可以視為個體和社會結構間的橋樑。關於角色期待的內涵，可透過數個向度來界定：普遍性/特異性，廣度範圍，確定性/不確定性，與其他個體的一致性，正式/非正式。當角色期待的內涵越是模糊不清時，對於該個體行為的預測力也就越低。角色需求將決定/限制角色的選擇；亦即，角色需求指的是個體在特定情境下將有的特定角色設定。角色定位意指個體在某個社會結構中，定位自身的互動性歷程，角色定位是一個認知歷程，是透過觀察者所給予的提示和需求回饋，來找出自己適切的角色定位。在任意的角色設定中，都包含了角色扮演者、角色補充者，以及觀察前二者互動過程的「觀眾」。觀眾可以幫助角色維持一致性，並且提供扮演者的角色應當如何的參考提示，若角色出現偏差或維持，觀眾也會給予角色正面或是負面的回饋，最後，觀眾可以維持角色的穩定性。簡言之，觀眾效應就是其他國際行為者的投射對角色的作用。

40

## 2. 中國的角色變化

中國的角色受到宏觀的國際架構，微觀的國家互動兩方面彼此影響。國際架

---

<sup>39</sup> Sebastian Harnisch, "Conceptualizing in the Minefield: Role Theory and Foreign Policy Learning." *Foreign Policy Analysis* Vol. 8 (2012), p.58.

<sup>40</sup> Cameron G. Thies, "Role Theory and Foreign Policy", pp.9-12. 檢索日期：2017年6月25日

<<http://myweb.uiowa.edu/bhlai/workshop/role.pdf>>



構給予中國一個「位置」與「身分」，國家互動則強化了角色的內涵。下文將挑選研究中國學者關於中國行為的解釋與他們認為中國對外政策的脈絡內涵，其中包含重視中國受到結構性因素賦予不同身分的研究；重視中國歷史影響因素的歷史自我（Historical Self）對現今的影響；重視關鍵他者（significant others）對中國對外政策的驅力；綜合以上觀點再加強角色之間交流後的影響進而探討中國大戰略如何制定等等。

首先，張登及將建構主義的行動者「身分」（Identities）與結構現實主義所重視的體系「位置」（Positions in the system）兩者作出結合，認為這兩者是中共外交的重要趨向。其中「位置」限制了行動者的選項，使其無法有無限多的政策可能；「身分」則在有限的政策選擇中，依據行動者自身的歷史經驗與價值認定，合理化特定選擇，進而做出挑選。張登及將「身分」與「位置」的概念與中國外交類型學做出對話，將三種身分：國際體系平衡者（Balancer）、國際社會負責者（Responsible stakeholder）與國際現狀挑戰者（Revisionist）與 1978-2010 年的中共外交軌跡劃分出七個階段：聯合美國制衡蘇聯霸權的平衡者、獨立自主傾向西方的平衡者、韜光養晦尋求突圍的平衡者、以均勢尋求大國身分、美中夥伴與負責任大國身分的發展、上升中的一極—立足於睦鄰責任的平衡者、朝向霸主下的首極前進—負責的挑戰者，強化了中共外交的歷史縱深。<sup>41</sup>這給予了中國角色變換的架構。

此外，近代主權國家的概念誕生於 1648 年的西伐利亞條約（Peace of Westphalia），日後國際關係中對於國家的討論多半也在此範疇內。然而，中國的國家概念與歐洲國家的發展概念並不同，這也導致了許多學者在討論中國的角色時加入中國自身歷史元素，這反映出了對角色理論中「歷史自我」(Historical Self) 的重視。「天朝觀」(All-under-Heaven)，Bart Dessein 認為瞭解中國「天朝觀」

---

<sup>41</sup> 張登及，「外交戰略與國際地位」，王振寰、湯京平、宋國誠，中國大陸暨兩岸關係研究，（新北市：巨流，2011 年），頁 422-449。

可以促進我們了解中國的對外政策哲學。<sup>42</sup>Dessein 認為中國自漢朝起就已然建立好了「天朝觀」，並在歷史發展上不斷受到考驗與轉化。「天朝觀」最開始的考驗發生在唐朝的華夷之辨，華夷之分式傳統儒家思想中辨別意我的方式，唐太宗透過「天可汗」的共主身分方式包容了不同的族群，解決了當時的困境。隨後經歷了元朝與清朝的異族統治，儒家思想的內容詮釋慢慢有了不同。到清朝時，儒家觀念被強化進了「天朝觀」中，「天朝觀」開始不是具體的治理範圍而成為一個抽象的儒家世界範圍。清朝末年，孫中山透過民族主義推翻滿清過後也面臨到國家如何組成的問題，大民族主義與小民族主義的爭辯日益嚴重。共產黨上台後由於共產主義將人民分為階級而非國籍，藉此解決了民國初年的民族問題。改革開放後，經濟快速成長造成了貧富差距，左派人士認為中國此時已經偏離了社會主義道路。經濟市場化造成的不平等對於共產黨的共產主義意識形態有著不良的引響，可能進一步侵犯共產黨的統治合法性，所以儒家思想在這個時候作為取代根基不穩的無產階級革命意識形態再興了。儒家思想的再興不但疏通了國內的治理危機，也幫助了北京在國際上建立所謂的中國價值。

除了「天下觀」外，Yudan Chen 透過中華文化中的圍棋概念詮釋中朝關係、傳統的陰陽太極兩儀概念探討中日關係、儒家禮的概念與道家的相關思想推廣到中國在國際社會的角色。進而探討中國角色建構（China's role conception）中的中國性質（Chinese characteristics）。他認為中國並不只追求生存與權力，中國的歷史背景影響了中國的對外政策。從中朝與中日關係中可以看出中國並不會明確的表明自身的立場，會模糊他的角色特性進而創造運作的彈性。在國際中盡管中國已經成長為國際強權，中國仍極力避免兩極的狀況發生，習近平繼承的「永不稱霸」概念就是中國傳統思想的延伸。<sup>43</sup>

---

<sup>42</sup> Bart Dessein, "Historical narrative, remembrance, and the ordering of the world." Harnisch, Sebastian, Sebastian Bersick, and Jörn-Carsten Gottwald. *China's International Roles: Challenging or Supporting International Order?* (NY: Taylor & Francis, 2016), Volume 2, pp. 22-37.

<sup>43</sup> Yudan Chen, "Philosophy, Identity, and Role Theor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Harnisch, Sebastian, Sebastian Bersick, and Jörn-Carsten Gottwald. *China's International Roles: Challenging or Supporting International Order?* (NY: Taylor & Francis, 2016), Volume 5, pp. 77-94.

Harnisch 依循了上述的辨證方式，認為國家會透過不斷的自我修正角色進而面對當時的國際結構與中國被給予的角色，在中國的例子中政府甚至會透過教育的方式灌輸人民政府所需要的意識形態，藉此改變中國在世界上所扮演的角色。Harnisch 認為毛澤東的「統戰」就是個很好的例子，敵人的敵人就是我的朋友在國際關係上代表角色可以持續變換。他更舉出當中國與蘇聯發生衝突時，中國對自我的角色定位就從共產主義國家轉化到了初階社會主義國家，進而和蘇聯有所區別。而且因為受到中國歷史自我（historical self）影響，毛澤東認為中國過去持續受到外國強國欺壓，而有了受害者情節，所以在反蘇後並沒有選擇親美而是走了第三條路線，意圖遠離曾經侵犯中國的政治強權。Harnisch 更分析中國在聯合國安理會中的表決案來說明，以維護世界和平的角色而言，在索馬利亞、科索沃、敘利亞、南蘇丹的議題上，中國表現得很不穩定，時而反對時而贊成。但是若以關鍵他者（significant others）的角度來看，中國將非洲聯盟（AU）作為關鍵他者的對象，中國致力於拉攏發展中國家並重視與非洲國家的夥伴關係。當非洲聯盟也有強烈意願支援南蘇丹時，中國就會取決非洲聯盟的意願而不是維護世界和平的角色做出決定，如此一來中國在安理會表決的邏輯就可以理解。此外，中國自身也有人權議題我西藏分裂議題，所以當國際欲干預國土分裂爭議時中國往往選擇反對或忽略。<sup>44</sup>

最後，中國的角色與自我定位也可以從其大戰略設計中觀察一二。一個國家的大戰略取決於三個要素：維護領土與自身安全的追求、世界上的角色以及自身的經濟社會發展程度。Chih-Yu Shih 與 Chiung-Chiu Huang 透過角色理論解釋中國在維護領土與自身安全追求要素上所發展的大戰略。<sup>45</sup> 他們認為縱然雙方有著政治穩定、安全、繁榮的相似需求，但中國的大戰略迥異於美國。中國作為一個

---

<sup>44</sup> Sebastian Harnisch, "China's Historical self and its international role." Harnisch, Sebastian, Sebastian Bersick, and Jörn-Carsten Gottwald. *China's International Roles : Challenging or Supporting International Order?*(NY : Taylor & Francis, 2016), Volume 3, pp. 38-58.

<sup>45</sup> Chih-Yu Shih & Chiung-Chiu Huang, "Identity and international role of China." Harnisch, Sebastian, Sebastian Bersick, and Jörn-Carsten Gottwald. *China's International Roles : Challenging or Supporting International Order?*(NY : Taylor & Francis, 2016), Volume 4, pp. 59-76.

二十一世紀的大國，就被賦予了全球和諧的功能。然而，對中國而言，和諧並不同於和平。中國不斷的透過雙邊溝通創造和諧必然帶來其他雙邊關係的不和諧。他們認為美國的全球戰略正在試圖建立一個意識形態規範，如民主議會制度、自由貿易和不擴散領土，美國在提供其他國家援手時會試圖介入其他國家的事物，然而中國則相對冷淡許多，中國對於其他國家的意識形態並不會加以干涉。這樣的異同表現可以追溯到兩國的過往經歷。美國在過去就秉持著門戶開放政策且具有傳福音的基督教精神，又因為冷戰時期與蘇聯不僅是軍事還有意識形態上的對抗，所以散布美國價值在美國的外交政策中是重要的一環。相對的，中國在過往就有著「關係」的概念，遇到不同的情況要做出不同的選擇，所以每一段關係都是特別的。如此一來，就要因地、人制宜，沒辦法一視同仁。這也導致中國的大戰略在學者以及觀察家眼中是不一致且模糊的。不過藉由美國出售臺灣軍武的個案而言，中國目前的大戰略是避免美國的大戰略侵犯到自身的核心利益。

綜上所述，張登及的中國外交類型學提供了我們中國角色變換的大方向。在這方向下 Dessein 與 Chen 將中國的歷史自我帶入中國的對外關係討論，認為很大部分的角色型素是受到歷史因素的影響。Harnisch、Shih 與 Huang 強調中國角色轉換中的角色建構與他者投射的互動概念，解釋中國對外政策的改變與邏輯。

### 貳、研究途徑

#### （一）角色理論（Role Theory）

角色理論從 Holsti 於 1970 年將其帶入外交決策分析領域至今經歷了許多變化，晚近的學者更豐富了其理論內涵。然角色理論本身的並不是已發展完全的理論架構，不同學者之間所使用的方式也有所差異，本文無意也無能力處理角色理論在典範建構下的統整，是故將目標放在分析結構上幫助本文建立兩岸關係中的中國角色變遷。幸運的是，由於中國的國際影響力越來越大，已有許多學者試圖以角色理論為切入點，用以定義中國。本文將借鑑角色理論中的角色建構（Role conception）概念，進以探討中國所扮演的角色變化，本文認為角色建構有兩個重要概念，分別為歷史自我（historical self）與他者投射（altercasting）。一個國



家的歷史自我會影響角色的內涵與產生行為，在行為後所受到的他者投射會再回到角色建構中作出角色的調整。

本研究認為中國的角色對於兩岸關係至關重要，而中國的角色建構受到了臺灣與其他國際行為者的影響。中國首先經由歷史自我選擇了如何處理兩岸關係，後在透過兩岸間的互動以及其他行為者造成的他者投射改變對自身角色的理解進而重新進行角色建構。這個角色建構就在多邊互動中不斷進行改變，進而影響中國在兩岸關係中的行為。

## (二) 大小政治實體 (The Politics of Asymmetry)

在國際現實中，強而有力的大國與小國之間如何交流是兩造都須面臨的議題，大小政治實體是觀察兩個實力不對等政治實體之間的交流理論。Womack 關注於大小政治實體如何建立一個穩定的交流關係以及「大對小」與「小對大」之間的差異。他認為在大小政治實體的實踐中，雖然大國明顯的在交流中具有優勢，但是也不能單純「統治」這段關係。原因在於當大國意圖屈服小國的意志時，小國有「抗衡 (defiance)」與「扈從 (deference)」兩個選擇，當小國被逼迫而採去「抗衡」時，在兩方面而言是大國所不願意見到的。首先，在這段關係中小國將自身策略調整為「抗衡」時大國也要付出相當的代價。其次，在真實世界中並不會只有兩個國家，周邊國家與其他大國在看到當事大國做出違反國際建秩的作為時將會警惕甚至譴責，如此一來大國將得不到它原始出發點所想要得到的利益。在 Womack 的研究中，大國往往會過於低估小國對於其政策的反應程度，相對的，小國也常常對於大國政策出現過度的解讀，出現了錯誤認知。至於要如何解決彼此的錯誤認知，Womack 認為主要在於要創造一個穩定的共識。在雙方互動時往往會受到過去交流經驗、議題敏感性等等的影響，若雙方可以在議題上持續創造雙贏與共同解決問題，從零和博弈到雙贏賽局；在制度上建立完善的互訪機制與雙方順暢的溝通管道。當彼此信任越來越高，就會降低彼此誤判對方意圖，

成為一段穩定的關係。<sup>46</sup>

本研究將採取 Womack 的大小不對稱關係結構，將分析焦點放在中國大陸一方，探討作為兩岸不對稱權力結構底下的大國，北京在制訂對台政策時，如何受到自身視野的引導與限制，包括如何將對台政策放在其大國外交（對美國）與周邊外交（對東亞地區）的框架下理解與執行、以及其制訂對台政策的過程中，忽略或誤讀了那些來自台北的訊息。在分析過程中，本研究將結合角色理論提供的概念，探討北京在不對稱關係結構下對自身角色的認知與對於來自台北與其他國際行為者的他者投射的回應。本研究結合不對稱關係理論與角色理論的理論視角，期望能提供現行兩岸關係研究更為細緻的分析觀點。

## 參、研究方法

### （一）歷史研究方法

本研究的研究途徑以歷史研究途徑為基礎，透過歷史角度作為研究出發點。這並不單純的是歷史研究問題，在社會科學領域中的研究方法，是從歷史中尋找因果關聯，並試圖去重建過去的一種工作。<sup>47</sup>而是希望從歷史的角度檢視中國角色認知變化與兩岸關係的發展。本研究嘗試處理 1987 年至 2017 年的中國角色認知變化進而探討與兩岸關係研究的關聯。將過去的事件加以有系統性的論述，並將問題情勢的發展與嚴格做一段長時間的研究。依據這段時間內的角色建構、歷史自我與角色投射作為判斷中國角色認知變化的因素。

### （二）文獻分析法

本文參考文獻以國內外專書、學術期刊、論文以及兩岸之間交流的言論與政策為主。希望藉由這些文獻資料，幫助了解中國自身變化與兩岸關係之間的關聯，藉此釐清本文的研究問題與驗證假設。文獻分析法針對蒐集的文獻與資料進行分析與比較，主要透過歷史文獻的方式再次的檢閱中國角色問題的整個起源和癥結，

---

<sup>46</sup> Womack, Brantly., *China and Vietnam: The politics of Asymmetr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2006, pp. 77-92.

<sup>47</sup> 易君博，*政治理論與研究方法*，（台北市：三民書局，1990年），頁 165。

以期了解事件的全貌。先以歷史的角度檢視中國角色認知的改變，以此為基礎在分析當前的問題，進而分析兩岸關係的時空背景，特別是中國角色認知與兩岸關係間的因果關係。

#### 肆、預期貢獻

本研究試圖建立出三個貢獻，其一是將中國自身的變化帶入兩岸關係的研究領域，其二是透過角色理論的方式探討中國在兩岸關係中的變化，進一步補充大小政治實體的內涵。其三是融合上述兩點，討論中國在世界的多邊角色建構與兩岸關係的雙邊互動行為之間的關聯。本文希望透過外交決策分析的途徑，即角色理論（role theory in foreign policy analysis）的視角，解讀中國大陸這三十年間的變化，同時將中國大陸對自身角色的認識放入權力不對稱（theory of asymmetric relations）理論的框架中進一步分析，以解析中國大陸的國際角色變遷與兩岸在權力結構不對稱下交流的事件與現象。希望藉由本研究的成果，提供另外一種兩岸關係研究的視角。進而補充現有兩岸關係研究。

### 第三節 研究架構與章節安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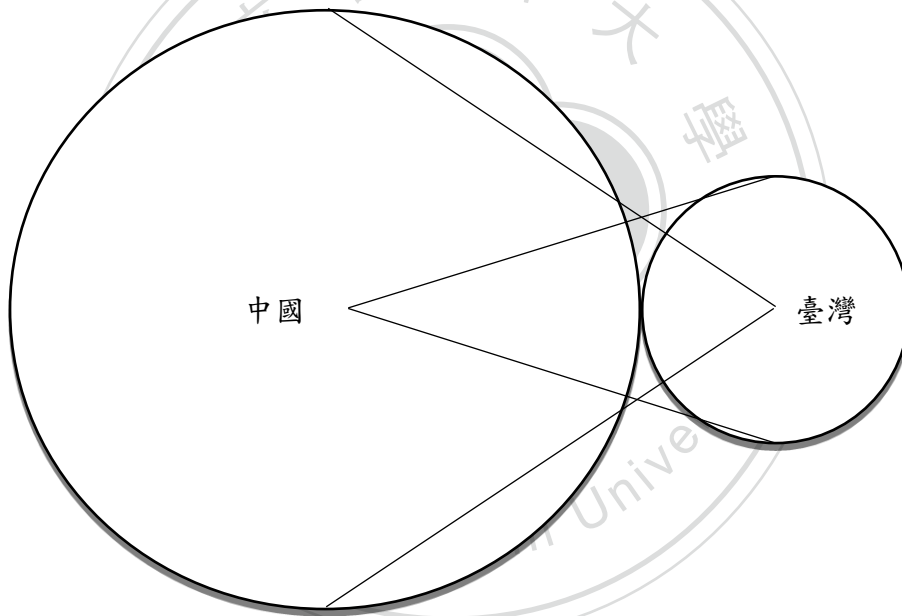
#### 壹、研究架構

為了聚焦於本研究的兩個研究問題，亦即為

1. 中國大陸三十年如何理解與實踐自身在世界舞台上所扮演的角色？其角色認知是否發生了改變？
2. 倘若中國大陸對自身角色的認知與理解確實發生改變，這些改變如何影響中國大陸處理兩岸關係的方式以及其看待兩岸關係的觀點？

本文研究架構將由下面兩張圖表作出解釋。

圖 1-1 大小政治實體模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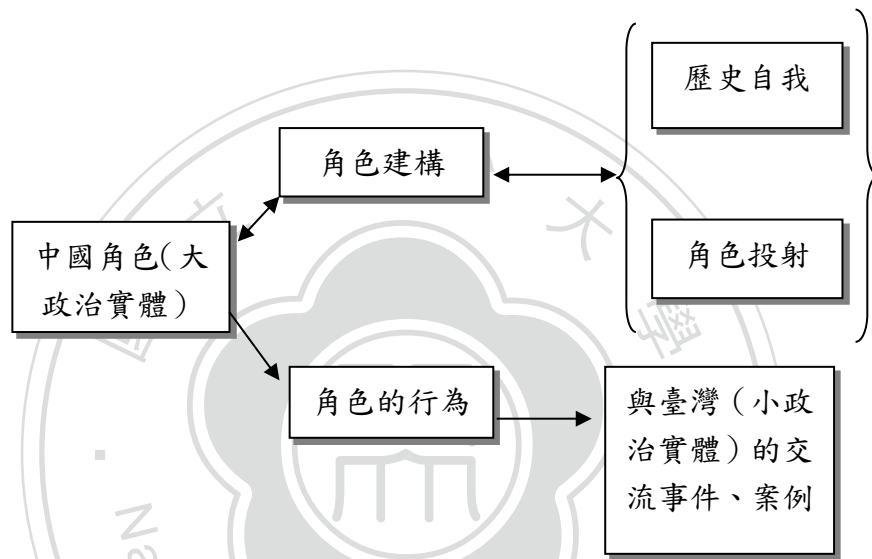
資料來源：作者參考 Brantly Womack 的大小政治實體模型<sup>48</sup>繪製

圖 1-1 為 Womack 大小政治實體的模型。Womack 認為在「大對小」的狀態下大國會賦予較低的關注進而出現回應過慢的情形，「小對大」時則是過度關注進而反應過度，這樣的現象將會造成兩者之間出現錯誤解讀的情況。Womack 解釋會出現這種現象主要是大國會將主要注意力放在其他大國身上，相較於其他大國而言，小國對大國的影響力較低，所以自然的會投注較低的關注。本文將分析

<sup>48</sup> Womack, Brantly., *China and Vietnam: The politics of Asymmetr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2006. p. 79.

焦點放在中國大陸一方，探討作為兩岸不對稱權力結構底下的大國，如何受到自身視野的引導與限制，包括在國際行為者的影響框架下理解與執行、以及其制訂對台政策的過程中，忽略或誤讀了那些來自台北的訊息。然而，大小政治實體中的大國與其他大國的互動如何反饋到「大對小」的行為上，是需要再著墨的過程。所以本文在這個部分引入了角色理論的觀點，形成圖 1-2 的內容。

圖 1-2 大小政治實體建構中國模型



資料來源：作者自繪

圖 1-2 在原有的基礎上新增了角色理論的內容，將兩岸關係中的大政治實體增加了角色建構的過程。本文認為中國角色建構將透過歷史自我與角色投射的影響，回饋至中國角色本身時將改變角色行為，角色行為將體現在大小政治實體中「大對小」的政策。此外，由於在雙邊的大小政治實體中增加了多邊的中國角色建構，更可進一步的探討中國大陸在多邊的角色建構與雙邊的兩岸關係中的行為關連以及是否出先落差？若是，又如何體現在「大對小」中的行為。

本文命題：

- 一、中國大陸在國際上扮演的角色越重要時，越會受到國際架構的限制與其他行為者的他者投射影響，並有符合外界對其角色期待的需求。



二、中國大陸在融入國際社會較低時，將會在兩岸關係中採取直接且原始的手段，如軍事行動、口頭威脅。

三、中國大陸在融入國際社會較高時，將會在兩岸關係中採取更多元化與柔性的手段，如經濟制裁、壓縮臺灣國際空間、切斷既有交流。

本文試圖以大小政治實體的分析途徑觀察中國如何處理兩岸關係，並探討中國大陸的角色變化過程。所以本文將先探討中國在國際場域中的角色建構過程，再將角色建構的過程放入大小政治實體中分析兩岸關係的變化。本文假定中國大陸在這三十年間並不是一個不變的超穩固狀態，歷史自我與角色投射會形塑出角色建構進而影響角色認知。在這雙向的過程中中國大陸對自身角色的認知與理解會發生改變，也因角色的變化改變了兩岸關係的內涵。

## 貳、章節安排

本論文一共分為五章，第一章為導論，包含本論文的前言、研究動機與目的，文獻回顧，研究途徑與方法，預期貢獻與限制。文獻回顧主要探討既有兩岸關係研究、中國的變化與角色理論。探討現有兩岸關係的趨勢以及各學者的關注焦點，後加入中國自身的變化試圖將兩者作出關聯。接著探討角色理論與大小政治實體如何實際應用在兩岸關係研究中。最後以章節安排做論文整體的解釋與介紹。

第二章為中國大陸在國際場域的角色建構過程。第一節將會借鑒學者們對中國角色討論，理解中國大陸歷史自我與對外政策的關聯，如何展現出中國式的對外政策特性。第二節則透過中國崛起過程中其他國際行為者主要為美國對中國自身認知的影響，也就是他者投射對中國角色建構的影響。本節將探討中國如何在與國際互動中找出自身扮演的角色，如和平維護者、現況挑戰者等等。第三節將做出綜合討論，探討中國歷史自我與他者投射兩者如何交互影響，除了被動的國際限制之外，還有中國在適應中展現出的能動性，建構出中國的角色認知。

第三章為大小政治實體下的中國角色。第一節將回溯中國對兩岸關係的定位，這具體表現在了不同階段對「一中政策」的詮釋以及大陸領導人的言論如「告臺灣同胞書」、「江八點」、「胡六點」、習近平相關講話等等。第二節則聚焦在臺灣

身上，將討論臺灣的「抗衡」與「扈從」之間的選擇，整理自 1987 年至 2017 年的臺灣作為小政治實體的選擇。

第四章為中國的角色認知與兩岸關係實踐。本章節將以時間為限，選定 1996 年台海危機、2005 年反分裂國家法與 2015 年馬習會為重要分界點。第一節探討 1987 年至 1996 年的中國角色認知，並如何實踐在這段期間的兩岸關係中。第二節則是 1996 年台海危機過後到 2005 年反分裂國家法之間的轉變，探討中國如何從武力脅迫演變為法律制定的改變。第三節為 2005 年至 2015 年馬習會，這段時間內中國角色在世界越發重要，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與 G2 的提出代表中國確實躍升為世界強權，而兩岸也在十年的互動過程中促成了領導人會面。第四節將是 2015 年馬習會後乃至於 2016 年蔡英文上台後的兩岸關係變化。兩岸關係中重新進入到了雙方官方凍結的情勢，面對到這樣的情勢，中國大陸選擇對台灣不作為的邏輯是本節所要探討的。

第五章為結論。綜合歸納本文的研究發現。

## 第二章 中國大陸在國際場域的角色建構過程

「一邊倒、另起爐灶、打掃乾淨屋子再請客」

毛澤東 中共建國初期三大外交政策

「我們誰也不怕，但誰也不得罪，按和平共處五原則辦事，在原則立場上把握住。」

鄧小平 1989

「永不稱霸，永不擴張，永不謀求勢力範圍。」

習近平 2017

三位不同的中共中央領導人，在三個不同時期的對外態度，表現出了三種不同的特性，也是三樣對自身角色的理解，大致呈現了中國大陸的角色認知在不同時期的變化。本研究的目的是在於觀察並解釋兩岸關係三十年來的演變，可以將其視為中國大陸對臺灣之間的關係與認知。因此，本章節將聚焦在中國大陸自身角色的建構過程，透過歷史自我與他者投射兩者正反合出的中國角色認知，作為研究兩岸關係的脈絡。歷史自我是一個角色透過自身成長路徑，對自己的認知和過去所走過的路徑為主，發展出的角色。他者投射則是承接歷史自我建構出的角色，在國際場域與其他角色互動，後調整認知形成雙方在動態行為中凝聚出共識的角色。也就是原初的角色透過自我意識建構出，後會吸收外界的影響進而改變原本的角色，凝聚出新的內涵。

<sup>1</sup>本研究從角色與結構對行為者的影響與認知開始延伸，目標在確立中國大陸如何在一段時間內認知自身角色變化，並在不同角色的認知下理解兩岸關係<sup>2</sup>，進而作出調整，出現不同的行為。

首先，在角色建構過程當中，中國的歷史自我佔了很重要的部分。習近平與

---

<sup>1</sup> 吳玉山在 2017 年 9 月 10 日長風講座與鄭永年對話的研討會中提出。目前的兩岸關係研究有三個主要研究方向，其一是如何避免雙方發生戰爭，其二是雙方要如何交流，其三是雙方如何理解這段關係，這恰恰是現實主義、自由主義與建構主義的研究途徑。本研究較類似建構主義的研究途徑，新增了中層理論的角色理論作為解釋行為者自身能動性的詮釋。

<sup>2</sup> 如中國共產黨如何看待與臺灣政府的關係，是不能交流的敵我矛盾抑或是可以與之交流的人民內部矛盾。



其他中央高層的對外發言，引用了許多中國過往的經典，甚至是對外經濟政策，都與過去的絲綢之路相互連結，表現出中國過去與現在結合的特色，甚至進一步在未來可以發揮中國文化的影響力。習近平在十九大政治報告時提出，「中國智慧」是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一直踐行的一些外交原則、準則、標準，也蘊含著中國傳統文化的精隨，比如和而不同、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天下大同等理念。<sup>3</sup>甚至屠呦呦以傳統中國醫學獲得諾貝爾獎都可以看出，中國傳統文化的力量慢慢正在被展現出來。中國的信史至今雖未五千但也發展了四千多年，歷經朝代遞嬗卻還都宣稱著中華正統。是歷史的影響也好，是制度的慣性也可，欲研究今日中國的角色形塑就不能忽視中國延展至今的傳統。因此，在歷史自我的部分本章節將會探討前秦至今的中國自我認知，以葛兆光之言即為「何謂中國？」。

其次，除了中國大陸的自我歷史脈絡外，中國大陸的角色建構尚需透過與他者互動的「他者投射」概念。原始的歷史自我與他者投射相互結成了中國的角色，受到新的他者投射的刺激，辯證出了新的中國角色，後再出現了新的刺激，進而形塑出更新的角色。此即是角色理論中所強調的，角色形塑是一個動態的過程，不同因素彼此交融而出的成果。由於中國歷史中有非常多次的我者他者之辯，並且在他者的刺激後產生了實質的影響。他者投射有短期的外交個案中的重要行為者，也有長期的整體外部結構影響，中國角色究竟在發展的過程中出現了什麼轉變，又在進入國際舞台後受到了什麼樣的影響形塑出現今中國的角色認知，將會是本章節的重點。此外，在原有的角色理論內涵中，以張登及的客觀「地位」與主觀「身分」兩項內涵補充角色建構的內容。簡言之，一個角色的建構過程中，角色的「歷史自我」經驗，給予角色原初的內涵；國家角色的客觀「地位」與主觀「身分」兩者是角色自己賦予到自身的內涵，且可能出現落差，當主客觀相結合時，則可使得國家確立自身所扮演的角色內涵；自我認知仍需外界行為者給予承認，方能強調自己的選擇是正確的。透過「他者投射」的外界影響，揉和上述

<sup>3</sup> 「中國日益走進世界舞台中央」，人民日報十九大專題報導，2017年10月22日。檢索日期：2017年11月25日  
<<http://cpc.people.com.cn/19th/BIG5/n1/2017/1022/c414305-29601479.html>>。

的兩項變數，就會確立在特定時空的角色建構成果。

最後，本文將「歷史自我」、客觀「地位」與主觀「身分」以及「他者投射」三樣角色建構的內涵綜合討論，探討中國乃至於中共在國際場域的角色變化，以利於後續分析兩岸關係三十餘年的變化。

## 第一節 中國的「歷史自我」

本節將主要探討中國的「歷史自我」。學者已有歐洲的國家概念始於西發利亞條約的共識，這種西方式的民族國家概念確實影響了近代的中國國家內涵。然而，中國自身文化傳承下來的國家概念也已內化到今日的中國。因此，中國作為一個較晚進入世界舞台的參與者，除了在一一定的程度已經學習了既有的國際建制標準，中國在崛起的過程也有讓其他國家放心的需求，更需要進一步地遵守現有準則。因此，現在的中國角色受到了其他行為者的影響，以及自身過去的歷史經驗、文化傳承等因素，揉合出了現今的中國。換言之，對於中國對內作為主要需求的身份（Identity），以及表現給他者所觀看的圖像（Image），兩者結合出當下的中國角色（Role）。所以，中國如何自處於世界與如何看待自己的角色，往往會出現中國獨有的觀點。有國際關係研究學者如陳玉聃認為，中國崛起之後，各方國際關係學者與各種國際關係理論均投注了大量關注在中國研究，但是傳統國際關係理論，包含角色理論，都始於西方用於西方。如此一來，在研究中國的時候解釋力就會有所受限。究其所以，在於中國的哲學、自我認知等等是具有「中國特色（Chinese Characteristics）」的。<sup>4</sup>是故，我們更應該了解中國如何詮釋自己與世界，作為研究今日中國對外行為的基石。

許倬雲在『我者與他者：中國歷史上的內外分際』中關注的是中國歷史上的

---

<sup>4</sup> Yudan Chen, "Philosophy, Identity, and Role Theor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Harnisch, Sebastian, Sebastian Bersick, and Jörn-Carsten Gottwald. *China's International Roles : Challenging or Supporting International Order?* (NY : Taylor & Francis, 2016) , Volume, 5, pp. 77-78.

內外分際問題，他將中國歷代的內外關係，分界為中國與其他國族的互動、中國中心與邊陲的互動、中央政權與地方社會的互動、社會上層與下層的互動、市場經濟網絡的運作、文化學術層面，「正統」與「異端」之間的關係等六項<sup>5</sup>。許倬雲認為上述六個系統彼此變動又互相影響，不停的互動呈現出來的動態活力不能停止，若停止互動將失去調節能力進而僵固。而個不停演化的過程，如同忒修斯之船（ship of Theseus）一般，許倬雲透過這個認同方式來探討「中國」這個共同體的變化，甚至存在與否的問題。中國的歷史並不只是一個主權國家的歷史，中國的文化也不是單一文化系統。中國不論是作為政治性的共同體，或是文化性的綜合體，中國歷史上不斷出現了「他者」幫助中國界定「自身」，在六個向度中影響了中國的歷史。

本章節將分為兩個部分。首先，會將重點放在中國的歷史自我，將探討中國天下觀的源起與天下觀遞嬗的內涵。因為天下觀內涵決定了過去的中國如何看待世界，進一步地在進入現代後受到主權國家衝擊而改變內涵。因此，若要追本溯源了解中國看待世界的特殊性，就不需探討中國的天下觀。其次，梳理中國秦漢時期至清朝中期的天下觀的實踐與角色的認知，與實踐天下觀的過程中遇到的挫折與其轉變，進而理解中國的歷史自我。

## 壹、中國天下觀緣起

在探討中國的對外關係時，除了前文的陳玉聃提出了的中國特色，趙汀陽以哲學角度出發的天下體系，<sup>6</sup>秦亞青的代表作『關係與過程：中國國際關係理論的文化建構』，也開創了「關係」與「過程」為核心概念的「關係理論」，<sup>7</sup>以及石之瑜分析中國許多外交決策行為，如中越戰爭等並不符合既有理論的預測。因此，學者開始辯論為什麼中國的決策會超出既有理論對行為者的臆測範圍？中國究竟是個什麼樣的國家？是傳統的天下觀國家亦或是西發利亞之後的民族式國

<sup>5</sup> 許倬雲，*我者與他者-中國歷史上的內外分際*，（台北市：時報文化，2009.10）。

<sup>6</sup> 趙汀陽，*天下體系：世界制度哲學導論*，（河南省：江蘇教育出版社，2005年）。

<sup>7</sup> 秦亞青，*關係與過程：中國國際關係理論的文化建構*，（上海市：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

家？在這樣的議題討論中，必須先區別西方式民族國家認同的類型。李英明認為，西方式的民族國家觀念搭著資本主義的快車席捲了全世界。在擴張的形況下，以白人為主導的力量擴張將會加強白人以「主權」為訴求建構出的兩種概念。其一是一定領土範圍內，不同種族集體效忠一個具有集體意識的國家，進而成為一個種族的「國家民族主義」；其二為透過要求某一特定種族在政治上獲得自主性進而組成一個國家的種族民族主義。<sup>8</sup>在這個脈絡中的「民族」，是被建構出來的。民族的形成是通過語言、文學甚至神話提供一群人共同想像的集體歷史記憶，在這個基礎上，民族形成了一個彼此生活在一起相互信任與承認的共同体。與此同時，民族主義會將民族與實際的地理區域連結在一起，通過對領土延伸出的主權做出連結與要求。因此，西方式的民族往往成為具有「政治意涵」的族群。<sup>9</sup>

因此，中國的國家發展過程，同樣也面對到了「民族認同」這個環節。過往，中國是以文化認同與民族主義兩條路徑操作及體認同議題，在天下觀的脈絡中，兩者相互交融的，進而形成的以中國為中心的「中國中心主義」。李英明認為中國在五四運動在認同道路上經歷了掙扎與轉向，即由文化認同主義轉變為民族認同主義，同時進一步形成由種族觀念轉變為國族的觀念。但是，中國又透過傳統中華文化提出世界大同這一終極理想來避免中國的民族主義走向西方帝國主義的悲劇，中國將這種理念視為是「王道思想」的表現，不同於西方式的霸權，<sup>10</sup>以習近平的話語，即是「永不爭霸」。因此，探討近現代中國的民族、認同問題，更可體現出滿清末年開始，天下觀在破碎的中國「國家重組」過程中，佔據了很大的意涵。

中國的天下觀已是了解中國行為的重要因素。本節將探討中國自先秦時期開始因革損益的「天下觀（All Under Heaven）」，追尋中國自古至今的天下觀變化脈絡。中國的「天下觀」原本屬於中國歷史研究學者的研究範疇，主要探討中國古代的疆域、民族、文化與歷史等等，但這一概念近年也多受研究中國對外關係

<sup>8</sup> 李英明，**重構兩岸與世界圖像**，（台北市，生智，2002），頁 110-112。

<sup>9</sup> 李英明，**重構兩岸與世界圖像**，頁 114-116。

<sup>10</sup> 李英明，**重構兩岸與世界圖像**，頁 117-118。



的學者所關注。王柯以「天下觀」作為主體脈絡，從中國多民族國家思想的起源出發，進入文明的華夷觀念，處理中國自先秦至今的國家問題。

趙汀陽認為，中國若要發展成為世界上的大國，就必須在思想上有所創造，不能無話可說，不能無所作為，不能隨波逐流。<sup>11</sup>「天下觀」迥異於西方的哲學思想為在於思想的主體為整體的「天下」而非一個個的單一國家。趙汀陽認為西方思想體系國家就已是最大的政治單位，所以現有的西方國際關係理論並沒有世界政治制度的位置，<sup>12</sup>這就與中國傳統的思維出現落差。由於「天下觀」是以天下為出發點，所以實際應用上的他者與自我雖然「異」但是可以轉化為「同」，由於彼此都是在一個更大的「天下」載體內，所以注重關係中的「和諧」一同存在天下中。

王柯整理先秦以前的「天下思想」大致可以分為三個部分，「天」、「天下」、「天子」。「天」是萬物主宰，「天下」是在這思想脈絡中的世界範圍，「天子」則是天在地上的代言人，透過「天命」受予統治合法性。傳統上中國人將宇宙想像為「天圓地方」的結構，世間萬物均被「天」所籠罩，是故產生了只有一個「天下」且萬物都要服從「天」的意志。<sup>13</sup>自此延伸出了統治者的「天命」概念，統治者的統治合法性就取決於「天」的意志，而「天命」的轉移與否，在於統治者的「德」是否喪失。是故商、周之間的朝代遞嬗均有處理天命移轉的問題。<sup>14</sup>傳統「天下觀」成形之時，中國人對於世界的了解尚有限，所以有著「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的單一天下概念，然而在政治集團越來越明確後，發現各個朝代的實際統治範圍和想像中的天下範圍不可能一致，所以出現了「九州」、「四海」等地理上的天下概念。此外，尚有「五服」以血緣為主的階級式親疏遠近。值得注意的是，此時已出現「內服」天子直接統治的區域，或稱王

<sup>11</sup> 趙汀陽，*天下體系：世界制度哲學導論*，頁 11。

<sup>12</sup> 趙汀陽，*天下體系：世界制度哲學導論*，頁 17。

<sup>13</sup> 王柯，*中國，從「天下」到民族國家*，（台北市：政大出版社，2017），頁 3-4。

<sup>14</sup> 天有玄鳥，降而生商以及商朝不得民心因此失去天命，後天命由周朝繼承的論述。



畿，以及「外服」周邊的獨立或半獨立的諸侯國。<sup>15</sup>在此時，就已經出現了間接王權的概念了。在更往外，則是四夷的蠻夷戎狄。因此，推論傳統天下觀中的中國角色應為天下的領導者（leader）以及天下的保護者（protector），甚至是周邊民族的榜樣（exemple）。<sup>16</sup>

王柯考察周禮、禮記，參考李學勤、顧頡剛與馮友蘭的考證後認為，中國最初的民族意識是一種「文明論的華夷觀」，是通過文明的方式來區分中華與四夷，且不排除四夷通過文化認同轉為華夏。換言之，中國先秦的天下構造是種「三重的天下」，以天子為首的直接王權、周邊半獨立或獨立的間接王權以及最外圍的不同文化認同等四夷。由此可以看出，中國政治倫理的「天下思想」本身就要求實現多民族國家。「華夏」與「四夷」的區別並不是現代民族討論的共同生活地域、語言、歷史、風俗習慣型塑出的共同體意識，而是文化的差異上。換言之，認定一個人是否是中國人，是在於是能否服從天下的秩序，即符合「禮」的文化內涵。另一方面，一個原本的中國人背離了「禮」，則會被斥為「四夷」。<sup>17</sup>例如，春秋戰國時期的諸侯如楚、吳、越由於位置處於傳統中國南方，並不屬於傳統諸侯是透過周天子分封的方式形成，而是自我形成的國家，所以一開始也被歸類在「蠻夷」。但是隨著國力的增強，以及與其他中國國家接觸，他們接受了「華夏」的文化，被承認是中國的國家。

以文明為判別民族集團標準的意義在於，提供了中國文明成為有機體的特性。我者與他者是可以相互變換且均生活在同一個天下中，換言之，「三重的天下」架構包含了中國的我者與他者，並提供了他者透過文化認同轉化為我者的可能。這影響了中國歷朝歷代的民族政策以及非中華民族政權的成立。只要承認王朝的主權，就可以享有如同一國兩制般的「都護」、「土司」等少數民族自治的權利。相對的，既然以「禮」作為民族認同的標準，征服王朝入主中原時，只要通過後天學習掌握華夏文明的「禮」就可以轉變為「華夏」的思想，也會被承認是中國

<sup>15</sup> 王柯，中國，從「天下」到民族國家，頁 11-17。

<sup>16</sup> 本文角色內容參考於 Holsti 於 1970 年所提出的 17 個角色。

<sup>17</sup> 王柯，中國，從「天下」到民族國家，頁 27-36。

的正統王朝，漢人官僚也不覺得侍奉征服王朝有太大的問題。中國歷史進程中更不斷因為四方民族的「華夏化」，不斷擴大控制範圍。

## 貳、從秦漢時期至清朝中期的天下觀實踐

本章節將討論「天下觀」的理想在中國朝代中實踐的結果，以及天下觀實踐中的核心中國與邊陲他者之間的關係。換言之，天下觀是一個理想型的典範，但在與他者互動的過程中，出現了變形，並不是一個無所不包且沒有變化的典範。本章節將緊扣天下觀的理念實踐，專注於唐宋變革前後的中國歷史自我變化。

「六王畢，四海一。蜀山兀，阿房出。」杜牧的「阿房宮賦」開頭四句描述了戰國末期秦國統一中國。秦始皇統一天下設立郡縣制，將過去的七國合而為一個行政體系，並車同軌、書同文及統一度量衡，權力高度集中皇帝身上。自此，開始了秦王朝對於中國的構想初探。大陸電視劇『芈月傳』，當中刻畫了芈月以及義渠王的戀情，劇中的義渠人無需奉行秦朝的王法，生活習慣也與秦人有所落差，為何如此？因為義渠就是秦帝國間接王權的制度的「屬邦」。「屬邦」擁有自治權，而秦王僅對「屬幫」實行間接的統治。秦朝的屬邦制度實際上是由異民族來管理的特別行政區，統治者均是該異民族首領，可以說是中國對少數民族實行少數民族自治政策的濫觴，開啟了中國天下觀下一國兩制的先驅。雖然秦帝國並沒有如同始皇帝所預想的千秋萬世，僅二世即亡，但是，作為中國第一個帝國的政治制度，秦朝的許多施策都直接的影響了後世的政策。秦朝的「屬邦」制，是對先秦時代成形的多民族共同體思想以及「多重型天下」政治體制的繼承，<sup>18</sup>也影響接續王朝的政治思想。

漢帝國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王朝，其對中國的圖像描繪影響深遠，尤其是「漢人」之稱甚至沿革至今。漢王朝繼承了秦朝的基礎，劉邦也繼承了皇帝之名。然而漢朝初期，國力不興，過去秦直接統治的領土範圍至漢縮減。因此，漢帝國所詮釋的天下，依同心圓三分為「核心」、「內屬」與「外臣」。漢帝國對外臣的作

<sup>18</sup> 王柯，中國，從「天下」到民族國家，頁 54-56。

法類似於秦的屬邦制，承認其統治者的王位，並保護其不被外來者侵略的同時，要求外臣「稱臣」、「奉貢職」、「遣使入朝」與「入宿衛」。<sup>19</sup>由此可知，漢王朝的外臣制度並不是單向度的統治者與被統治者關係，雙方也同時具有雙向的義務，漢王朝需要在這段「關係」中提供保護，相對的換取效忠。至於漢王朝對內屬國的做法，是撤銷彼此國界、統一法令。維持其原本統治者的同時，由中央任命內屬國的行政、軍事以及司法官吏，達成除了統治權外的行政權控制。如同前文提到的我者與他者之間的光譜可以左右移動，漢王朝時期的外臣可以提出成為內屬的需求，如漢武帝時期的南越，就從原本最外圈的外臣向內轉化為內屬。

漢帝國時期的傳統中國天下觀遇到了第一個重大的挑戰，一個天下一個天子順應一個天命的理想受到實力與漢王朝分庭抗禮的匈奴所挑戰。漢高祖劉邦為此出兵卻被困於平城，不得已開始了天下觀實踐中首次與他者平起平坐的和親、歲供與通關策略。天有二主顯然不合乎傳統的天下觀，也違背了中國作為天下的領導者（leader）的角色，此時中國由於實力的減弱，被迫接受自己成為區域領導者（regional leader）的現實。

直至武帝時期重用魏青、李廣、霍去病等人，將兩國實力天秤的頹勢扳回，使得中國的天下觀理念、領導者的角色認知與現實再次結合，當後人有感於邊疆不穩時，就有了此時期的想像「但使龍城飛將在，不教胡馬渡陰山」。由於匈奴仍是中國最大的威脅，因此漢王朝在處理時非常小心，採用了同時兼具懷柔與牽制意涵的對匈奴政策，將匈奴切割為數個「屬國」，成為軍事管制的特別行政區。此時的華夷關係由於雙方進行許多軍事交流，且草原文明經濟生活出現困頓時，向農耕文明打草穀以解決內需的次數日趨頻繁，更可能是華夏文化大一統時的史觀開始注重這種民族間的摩擦，因此華夷之間的歧視日益上升。但是，回到中華帝國天下觀的三重天下體制，整體而言外夷仍然是中國天下概念的重要參與者，並且在歷史上扮演的角色越來越重要。東漢後期至晉朝末期，上演的歷史就是一段胡人漢化；漢人胡化，彼此越來越無法明確切割，再再的顯現出天下觀中將外

<sup>19</sup> 王柯，中國，從「天下」到民族國家，頁 58-60。

夷視為天下一部份的理想／現實結合，也更添加了「中國」的內涵。

晉朝滅亡後，中國以南北為界，北邊的匈奴、鮮卑、氐、羌、羯分別在中國地域的北方建立起各自的政權。如前趙的劉淵、後趙的石勒、前秦的苻健、北魏的拓跋珪等等，後世稱之五胡十六國。身為少數民族，馬背上打完天下後遇到的是廣大領土的漢人臣民。為了統治需求以及確立自身政權合法性／延續性，胡人領主幾乎都將政權建立為中華王朝，並且建元稱帝，稱自身政權是順應天命的出現，以符合正統思想與天下觀。當時的胡人政權不論仕官途徑與政治體制，均類似於原本的漢人王朝建制。但是仍須關注，許多胡人政權並不願意被全面漢化，因此會有「雙元」的「胡漢分治」統治方式，原本的根據地以及仍然在當地的胡人依原本的統治方式稱「單于」，到漢人為主的地區使用漢人制稱「皇帝」。王柯認為這種雙元的統治方式主要是為了適應社會的現狀而採取不同的統治方式，<sup>20</sup>但在雙方交流後往往胡人政權會傾向漢化的一方，如北魏的「華化」。然而，既然有漢化的需求，也就會有漢人胡化的例子，如北齊的高歡。陳寅恪也認為，在當時以胡化漢化而非胡種漢種對認同做出區別，原因在於文化認同而非血緣。<sup>21</sup>

在胡人政權的統治下，以「德」統治天下的這項中華文明早期思想反而得到新的詮釋和實踐。中華文明也在地緣上獲得實質的擴張。雙方在交流的過程中經歷歧視是必然，但更多留下來的是雙方合作的成果，縱然「非我族類，其心必異」但只要有「德」，就可以順應天命成為上位者。更為包容的中華思想在此時佔了上風，更影響到了後世的唐、遼、元。多民族體制在中國歷史上，唐、遼、元、清<sup>22</sup>是四個最為重要的朝代，他們的相關政策以及文化思想，更是天下觀文化中，我者他者意涵的要點。

唐朝是漢朝之後長時間分裂後的大一統，且唐太宗更被周邊國家尊稱為「天可汗」，與周邊國家保持著各式各樣的「關係」。唐代可以說是最符合趙汀陽所論述的「天下觀」理想型態，亦即天下概念的世界觀是兼容萬事的「無外」原則，

<sup>20</sup> 王柯，中國，從「天下」到民族國家，頁 85-87。

<sup>21</sup> 陳寅恪，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唐代政治史述論稿，（台北市：里仁書局，1980）。

<sup>22</sup> 清朝由於時間點較近，且具有與西方民族國家對抗的特殊背景，故將在後面予以討論。



無論是中原對外族的承認或是外族對中原思想的接受，都顯示了天下／帝國概念的開放性<sup>23</sup>。唐太宗並不是一開始就被尊稱為「天可汗」的，在隋末開始，北方少數民族的共主是強盛的東突厥，就李世民都與東突厥皇族突利以突厥方式結為盟兄弟。後李世民繼位唐太宗後，出兵攻破東突厥，將西北遊牧部落共主的地位拿下，開始被稱為「天可汗」。唐朝後又擊敗吐谷渾、西突厥、新羅、百濟、高句麗。影響力東起朝鮮半島，西至中亞，北起西伯利亞南端，南至印度支那半島，這樣的影響力，也維持到了唐朝中葉。這段期間，唐天子既是中國的皇帝，也是周邊許多異民族集團的領袖，更在這段期間成功繼承了天下領導者、天下保護者與榜樣的角色身分。

在這樣的背景下，唐朝使用與秦漢以來面對異民族實施間接統治類似的「羈縻」制度。羈為馬具縻是牛鼻繩，目的在於操控周邊民族的前進方向但是不直接干涉。「羈縻府州」的都督或州縣的刺史，均由該民族集團原本的首領擔任，唐朝更會對其首領冊封，承認世襲的權利。然而，並不是所有的周邊民族都選擇成為唐王朝「間接王權」統治下的羈縻州府。文成公主王昭君出塞曲傳唱至今，她所和親的對象吐蕃，就是唐王朝另外一種處理周邊國家的「關係」，近似於三重天下觀的更外層結構。與間接王權下的羈縻州府不同，羈縻州府代表接受了唐的冊封，承認統治者的正當性來自於唐王朝的賦予。「和親」是一種較為平等的「婿舅」關係而非上下直屬的「君臣」關係，所以就意義上而言是唐王朝權力無法到達的地方。在唐王朝時，周邊異民族可以輕易地成為唐王朝的羈縻州府，但要與唐王朝「和親」，則需要有一定的實力，方可與唐平起平坐。

異民族對唐朝提供對宗主國的忠誠，唐朝賦予了自治的權利。對於更外圍以及有能力的異民族唐王朝則祭出了和親策略。由此可見，中國面對四夷的三重天下觀，從先秦、秦、漢至唐代；從屬邦、屬國到羈縻，並沒有太大的變化，甚至可以說唐朝是將該一思想集大成的朝代。只是這樣的三重天下觀制度，必須建立在核心的中國國力強盛上，當唐王朝中期開始積弱，周邊王朝就沒有將唐王朝視

<sup>23</sup> 趙汀陽，*天下體系：世界制度哲學導論*，頁 59-61。



為天下共主的動機，天下領導者的角色就無法延續。除此之外，唐王朝會對外族採取較為親合的立場，有很大的原因也在於唐王朝李氏的外族背景。唐太宗曾被問到為何能使四夷歸順時說：「自古皆貴中華，賤夷狄，朕獨愛之如一。」所以，唐王朝的強盛與四海來朝在中國歷史上也屬罕見，在當時所打下的基礎，更是影響了當時周邊國家以及中國人的認同至今。以今日的角度而言，中國對異民族的「羈縻」制度，大體符合現今中國的兩項特色：直接繼承此制度的「一國兩制」以及間接繼承此精神的「不干涉」策略。

在歷史研究學者眼中，唐宋變革是中國的一個重要轉折點。唐末至宋朝之間，傳統天下不斷受到外來者的挑戰，過去實踐的「天下觀」慢慢轉化為理想的「天下觀」。在這個時期，中國周邊出現了類似於現代的國際關係，有契丹的燕雲十六州，西夏也與宋朝進行戰爭，這時候的東亞已經開始不承認中國王朝為中心的國際秩序。所以天下的領導者（leader）以及天下的保護者（protector）這兩種角色，都降階成為地區領導者（regional leader）與地區保護者（regional protector），甚至是周邊民族的榜樣（Exemple）這屬於軟實力的輸出影響範圍均在唐帝國後限縮，開始對原本沒有排外意識的天下觀內涵增加了漢族中心的理念。

葛兆光認為這是自我中心的天下主義遭遇挫折的時候，自我中心的民族主義開始興起。這顯示了現實世界與觀念世界的反差，即在民族與國家地位日益降低的時代，民族和國家的自我意識卻在日益升高。<sup>24</sup>在這樣的背景下，宋代開始重新建立以漢族傳統、儒家倫理為中心的文化，重新解構再重建屬於漢族的中國文化。也是因為如此，傳統天下觀包容並屬於天下觀的「他者」在宋朝被漢人切割，出現了「排他性」。也因為如此，明朝的「土司制度」已經沒有唐朝時期「羈縻制度」中的自由性，清朝時期更是把土司切為眾多小勢力，只擁有少量的權力，並納於自身直接王權的統治。除此之外，筆者認為這與趙汀陽提出的天下一國家一家（個人）三層結構<sup>25</sup>有關聯。趙汀陽認為中國天下觀對現在國際關係理論的

<sup>24</sup> 葛兆光，*何謂中國-疆域民族文化與歷史*，（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14），頁 127-128。

<sup>25</sup> 趙汀陽，*天下體系：世界制度哲學導論*，（南京市：江蘇教育出版社，2005），頁 44。

貢獻在於多出了超越國家層次的「天下觀」。傳統天下觀是天下一家（個人）的兩層結構，宋朝時期中國與其他行為者互動後開始確立民族與國家的概念。由於傳統天下觀的他者可以轉化為自我，所以天下層次中的他者與自我並不會有明顯的排他性；國家層次的他者與自我就有了明確的分別，進一步的提升了主權的概念。

中國傳統同心圓式的三重天下觀在外族入主的遼、元、清時受到挑戰。由於屬於外來王朝，他們打下積弱的中國時，都意識到了為何身為少數民族可以統治人口國體均大於他們許多的漢人的國，原因可能在於漢人自身的制度上。並且，要保持遊牧民族的剽悍民族性，必須與漢人保持距離。這也點出了趙汀陽所忽略的歷史事實，也就是外民族統治者心中的天下概念，和漢族統治者的天下概念還是有所不同。<sup>26</sup>外民族在繼承天下／帝國的正統傳承概念的同時，遼的南北官、元的二都制與清的八旗制，均是為了讓征服王朝保持原本的狀態。也在此時，出現了異於過去同心圓式的「多重型天下體制」的「多元型天下體制」。但在中國歷史的任何一個時代，都可以看到周邊民族集團的文化向中華文化的光譜偏移，原因在於漢人畢竟佔據了被統治人民的最大多數。在征服王朝以華治華的過程中會有意無意地使統治民族集團走向華化，其中，中華多民族國家的天下觀思想也起到了很重要的功能。

本節至今以中國天下觀出發，探討了朝代遞嬗之間如何處理對外關係，以及對自身的角色認知。從先秦開始的天下觀，不斷地因革損益調整自身的內涵。也如同「中國」在歷史上的變化，揉合出了現今的樣貌。中國傳統天下觀中，以文化作為主要認同的方式，凡我族類，其心必同；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因此有很明確的核心向外擴散，所以中心疆域是明確的，而外部疆界則是模糊的。雖然有模糊的概念，但並沒有硬性的疆界認知。這個觀在宋朝開始受到挑戰，如「澶淵之盟」與遼國之間確立邊界。不過最大的影響要到清王朝中後期時，這個觀念才

<sup>26</sup> 趙汀陽認為外來民族採用了天下理論來建立和解釋其統治的合法信，自認所建立的帝國屬於天下／帝國這一模式和傳統，如蒙古帝國的國號更改為「大元」所顯示的天下意識，顯示了天下／帝國的開放性。

開始受到了西方「民族國家」的影響與挑戰。葛照光認為，正是在中國無邊「帝國」的意識中，有有限「國家」的觀念，在有限的「國家」認知中，保存了無邊「帝國」的想像，近代民族國家恰恰從傳統中央帝國中蛻變出來，近代民族國家依然殘存者傳統中央帝國意識，從而是一個糾纏共生的歷史。<sup>27</sup>

中國的歷史自我也在原本的天下的領導者(leader)、天下的保護者(protector)以及周邊民族的榜樣(exemple)這三樣主要角色弱化為地區領導者(regional leader)與地區保護者(regional protector)，甚至周邊民族的榜樣(Exemple)這屬於軟實力的輸出影響範圍也限縮。這是角色理論的角度解讀天下觀從理念到實踐中的變化。中國在這段期間的角色受到當時他者投射的影響，周邊國家如日本等，不再給予中國作為天下領導者與天下保護者的角色資源，在交流的影響下中國歷史自我的角色也出現變化。此外，角色認知將會影響角色行為。當朝鮮半島在明朝末年受到日本入侵時，中國身為地區保護者的角色，影響了中國當時的行為，不顧自身國力已然衰弱，依然出兵幫助朝鮮半島平亂，就是一例。

### 參、清天子遇到民族國家—兩個世界觀的碰撞

清王朝對蒙古、西藏和新疆這三個非漢藩部的統治仍然是依循「多元型天下觀」的脈絡。清王朝僅是這三個藩部的民族同盟盟主，直到1884年新疆建省方才打破了這樣的概念。新疆建省的背後思考邏輯其實很複雜，但有一個重要的背景且與本章節內容息息相關，那便是英俄勢力的入侵。新疆是北方俄國與南方英國雙方夾擊下的緩衝地帶，更由於阿古柏在1867年消滅了原有的清朝勢力，統治了天山南部的地區。在當時的時空背景下，英俄兩國藉透過商人作為代理人在新疆試圖發揮自身的影響力，透過通商與出售武器建立了與當時動亂新疆領導人的情誼，使得新疆問題更為複雜化。清王朝在一開始並沒有立即採取武力措施，直至英俄兩國動作越來越頻繁，清王朝在左宗棠的「塞防論」與李鴻章的「海防論」兩方論戰中，體認到現在是傳統中國與現代民族國家對於領土的認知需要轉

<sup>27</sup> 葛兆光，何謂中國-疆域民族文化與歷史，頁70。

變的「千古變局」以及外來勢力的嚴重性後，方在 1876 年開始對阿古柏政權採取軍事行動，一年之後便收復了除了伊犁外的領土。

左宗棠「塞防論」與李鴻章「海防論」的論戰是清朝末年對於他者（英俄）所激發出的爭辯。雙方爭辯的重點在於，清末已經近乎崩潰的國家資源，究竟應當放在何處。李鴻章認為新疆為接壤俄羅斯、土耳其與英屬印度，中國實在沒有能力再花費資源在這個容易崩潰且各國心懷鬼胎的地域，「即勉圖恢復，將來必不久守。」、「新疆不復，於肢體之元氣無傷；海疆不防，則腹心之大患愈棘」。因此，防堵來自於海上的威脅，方為投資報酬較高的提案。左宗棠則認為，海上威脅者目的在於通商，並沒有直接威脅到清王朝的領土。而北方的俄國狼子野心，若有機會則會尋找機會併吞中國領土，威脅並不亞於海上的強權，因此新疆不能輕易放棄。值得注意的是，雙方也都清醒的認知到，處理新疆問題的方針將會牽動清王朝的「天下大局」，因此要審慎實度。<sup>28</sup>

帶有主權領域範圍觀念的「塞防論」得到中央的認可。很大的原因在於俄國通過對伊犁地區的領土野心讓清王朝感受到威脅，促使清王朝最高統治階層下定決心改變對新疆的統治政策，進而維護新疆為領土一部份的決心。新疆的收復代表中國一反過去「多元型天下觀」的統治概念，明確了主權領域範圍即領土界線，將新疆建省。這是中國我者與他者；天下觀與民族國家作用下的一個重要里程碑。改變了過去中心疆域明確，而外部疆界模糊的傳統觀念。自此，民族國家概念越發內化至中國的國家概念。在經歷過短暫漢族中心的革命運動後，當中華民國建立時，革命黨人繼承清朝整體大帝國的思想蓋過了革命時喚起群憤的漢族中心理論，開始發想五族共和理念。也由於國界的確立，「天下」的無邊概念與國家的有限概念分離，成為趙汀陽所言的天下—國家—家（個人）三層結構。<sup>29</sup>

清朝末年受到西方世界與日本勢力發展的影響，中國的地區領導者與地區保護者兩樣身分受到的強大的衝擊。日本在甲午戰爭與日俄戰爭中，表現出不同於

<sup>28</sup> 王柯，中國，從「天下」到民族國家，頁 185-195。

<sup>29</sup> 趙汀陽，天下體系：世界制度哲學導論，頁 44。



其他亞洲國家的能力，也因此，在經歷過短暫漢族中心的革命運動後，當中華民國建立時，革命黨人繼承清朝整體大帝國的思想蓋過了革命時喚起群憤的漢族中心理論，開始發想五族共和理念。有趣的是，這樣的轉變除了政治上的理性抉擇外，更受到很大部分的「他者」特別是日本的影響。總而言之，強調中國歷史的「納四夷入中華」已經不再是純歷史學術議題的討論，而是具有政治正確性的意涵，這個想法甚至流傳到今日。

在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日本大亞洲主義逐漸成為顯學，取代了中國成為區域領導者的角色。九一八事變以及滿洲國的成立，將中國推入國土被割據的危機中。此時若仍以漢族中心作為中國國體的想法，很可能將中華民國領土限縮為明朝時期，對於繼承下來的東北、蒙古以及廣大的西半部疆域將沒有統治的合法性。顧頡剛曾說「昇平時代，學者不妨為學問而學問，但在國勢陵夷，局天脊地的時代，卻只能所學務求實用<sup>30</sup>」傅斯年也說中國自殷周兩代嚴格政治之約束、春秋戰國大一統思想深入人心、我們中華民族，說一種話，寫一種字，據同一的文化，形同一的倫理，儼然是一個家族，<sup>31</sup>這與孫中山先生的國族理念相同。這樣的轉變除了政治上的理性抉擇外，更受到日本做為「他者」的影響。總而言之，強調中國歷史的「納四夷入中華」已經不再是純歷史學術議題的討論，表現出了政治意涵，亦即是中國國土的完整性。中國被其他國家當作弱者分食的恐懼，開啟了中國的受害者（victim）角色。

這段時期的中國，國家性質與角色受到了歷史自我與他者投射的雙向影響。由於面對西方勢力的介入與日本的崛起，中國在此時不但無法保有原有的區域領導人與區域保護者的角色，甚至國家能否延續都是個問題。此時的中國將自身角色視為被殖民者與受害者。在國家性質方面，二十世紀的民族主義在中國可以被視為西方帝國主義國家侵略的產物。不論國共，中國的知識份子均學習了西方主權國家的想法，追求富國強兵，開始了現代國家的觀念，越來越強調中國領土的

---

<sup>30</sup> 葛兆光，何謂中國-疆域民族文化與歷史，頁 89。

<sup>31</sup> 葛兆光，何謂中國-疆域民族文化與歷史，頁 89。



完整性和國際地位的平等。另一方面強調培養全體國民的國民意識，實行教育、意識形態以及法治進行改革，追求完整且具有共同歷史經驗的中國<sup>32</sup>。

這段時期的中國，其國家性質受到了歷史自我與他者投射的雙向影響。其實不論以考古、人類學、邊疆學的角度觀之，以文化或是血緣作為區別依據都有其支持者，不過由於政治的因素，此時期的主流中國性質可以總結在蔣介石的『中國之命運』中。『中國之命運』終將中國境內各個族群比喻為「同一血統的大小宗支」。在地域上定義中國包含黃河、長江、黑龍江以及珠江；在民族上，中華民族包含了漢族、契丹、女真、蒙古以及滿人。在漫長的中國歷史上，彼此同化融為一體，更沒有奇異的痕跡。因此「就民族成長的歷史來說，我們中華民族是多數宗族融合而成的」<sup>33</sup>這樣的說法其實就包含了「天下」以及「民族國家」兩種概念，放棄傳統民族國家追求血緣的認同，專注於天下觀「納四夷入中華」的傳統想法，之後進一步借鑒美國發展的民族融合理念將「民族國家」的內涵擴充，發展出屬於大中華思想的國族認同。

陳永發認為中國共產黨在這段時期的基調與國民黨相同，但主要的差距在於中共信仰了馬列主義，相信階級鬥爭是歷史發展的動力與「五階段論」的歷史發展具有必然性，這造成了國民黨與共產黨的主要差異。另一方面，在馬列主義的科學歷史觀與中國本土因素結合，可以說明為何中共會先從城市開展革命事業、為何會進行農村集體化的土地所有制、為何會反資反修進而反霸。這是由於中共的世界觀，或者可說是毛澤東的世界觀深深地影響了中共政權所走的方向與步伐。

中國共產黨成立早期，作為蘇聯共產國際的中國分支，此時的中共內涵較為教條，試圖照搬蘇聯馬列史經驗，主要以階級鬥爭為綱，人民的區別是階級而非民族。此時的中共認為自身角色為中國革命解放的堡壘（*bastion of revolution-liberator*）、反帝國主義的代理人（*antiimperialist agent*）、日本與西方列

<sup>32</sup> 陳永發，*中國共產革命七十年*，上冊，二版（台北市：聯經出版社，2001年）頁11。

<sup>33</sup> 葛兆光，*何謂中國-疆域民族文化與歷史*，頁108-109。

強入侵下的受害者 (victim) 以及共產國際在中國的忠實盟友 (faithful ally)。也因為中共信奉馬克思主義，因此對於國族議題設定較為模糊，大致上同意民族自決的方式，意識型態上以階級鬥爭為主。然而，中共在革命的過程中將理念具體實踐後，發現蘇聯式經驗不能完全照搬到中國來應用，毛澤東在中國因地制宜的革命策略反而得到了成效。毛澤東藉由成功的革命成果與政治路線鬥爭的勝利，壓倒了聽從共產國際的博古、王明一派。就算中蘇雙方均信奉馬列主義，中國本土農村革命經驗地融入，將在源頭上將中國共產黨與共產國際做出區隔，這兩個共產勢力大國勢必將會出現不同的發展。直至今日，「具有中國特色」五字成為了意識形態需求下的產物，說明中共仍然在意識形態中有正當性與繼承性，僅是因為中國的特殊性所以發展成現今的模樣。

因此，雖然中共是以階級鬥爭為綱，理應成立的是個無產階級國度，但在實際取得政權後面臨與民國創建者類似的情況。雖然在蘇聯給予的壓力之下同意外蒙古獨立，但是整體而言對於內蒙古、新疆、西藏等地，還是堅持一個歷史傳承下那四夷入中華的廣大中國。也因為堅持一個完整的中國，以及歷史列強的入侵經驗，關於主權與領土問題成為了意識形態中的「硬核」不容挑戰，更不能接受外國干預內政。

中國的歷史自我其實包含了許多面向，在中國發展的脈絡中，葛兆光特別提出其中有五點為「中國的」文化。其中的四點與第五點與本章節息息相關，第四點為天下觀的「天人合一」思想、鄒衍的陰陽五行學說，以及從這套學說為基礎發展的知識、觀念和技術。也就是太極的陰陽、五行的相剋相生等等。第五點是在「天圓地方」的宇宙論影響下，形成的特殊天下觀。在這樣的天下觀圖像中，古代中國形成了以朝貢體制為基礎的國際秩序。<sup>34</sup>

為了緊扣本研究主題，本章節重點在於論述中國自古以來如何理解世界以及和周遭政治實體、民族建立關係，進而形塑出歷史自我，以及相關角色的改變。這在很大部分就是天下觀思想下的朝貢體系以及與周遭的政治關係，實際從歷史

<sup>34</sup> 葛兆光，何謂中國-疆域民族文化與歷史，頁 112-117。

的角度爬梳過後可以發現朝貢體系並不能完全解釋中國歷史中的對外關係，越接近現代中國的直接王權有越擴大的趨勢。誠然天下觀中的朝貢體制本就是理想中的產物，實際執行時需要修改甚至幻想化，但這也導致了中國異於其他行為者的外交創新可能性。因此，整理出如下幾個中國歷史自我中的幾項特點。

- 一、 中國有很長一段時間都是中心確立，周邊模糊。如何定義是否為中國，則主要以文化做為區別。
- 二、 中國國家能力強，角色為天下領導人與天下保護者，越符合天下觀的文化傳統；（漢人政權）國家能力弱時，角色弱化為地區領導人與地區保護者越容易走向漢人中心主義。
- 三、 中國的天下朝貢體制是不對稱關係，中國作為天下領導人與天下保護者，有義務讓其他國家在交流過程中得到更有利的物質成果，藉以換取對中國的效忠或尊重。中國也不會過度過問羈縻方的內政事務<sup>35</sup>。
- 四、 「天下一家庭」的世界觀為傳統天下觀的概念；「天下一國家一家（個人）」為宋朝後出現，晚清時期確立的觀點。當國家概念成形後，對於主權／疆域的鞏固會更為強烈，也因此明、清、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sup>36</sup>對於「四夷」的主權要求更為強烈。
- 五、 宋代以前，中國的天下觀具有中國中心的朝貢意識，與周邊國家交流時重視關係而非實質的利益，直接王權的範圍也限於原本的統治地區。
- 六、 宋代之後，中國天下觀越來越具有直接王權擴張的現象，間接王權範圍越來越被轉化為直接王權。這也代表中國國家能力許可的時候，將周遭「四夷」納入「中華」的做法，並不是周遭小國遵守朝貢規則就可以自立<sup>37</sup>。
- 七、 由於很長一段時間中國角色為天下領導者、天下保護者與周邊民族的榜樣，加上天下觀的文化中心設定。中國在一定程度上渴望他者對於中國文化的追

<sup>35</sup> 這使中國異於美國的積極式干預他國策略，中國較追求雙方之間的關係而不干涉內政。

<sup>36</sup> 元朝由於是外來者政權的「多元型天下觀」，元朝僅為蒙古帝國的中國地區政權，且統治時間甚短。所以雖然應有唐宋變革後的國家概念，但是二都制仍是元朝主要的統治方式。

<sup>37</sup> 這是研究兩岸關係時的重要前提。

隨與認同。

八、 雖然宋朝時期就已經體現了初步的國家概念，但是中國從天下到民族國家的轉捩點是晚清時期，不斷受到西方國家以及日本的刺激。這造成了中國新舊結合的矛盾，出現了受害者與被殖民者角色，表現出對自身「身份」認知的再思考。

九、 這些歷史自我當中包含了中國自身的意識形態內容，在日後的中國角色行為表現出重要的影響。如毛澤東堅持援助朝鮮的行為，以及支持北越對抗美國等等，都隱含了中國歷史中潛移默化的意識形態概念。因此，所謂的歷史自我與現今的自我並不是一刀切開，而是不同時間點所展現出的不同性質，當中很可能有所重複。而這些內涵，又可以追溯到現今的中國共產黨意識形態中。

## 第二節 中國式世界觀底下培養出的他者投射

中國過往的角色受到天下觀、世界觀與歷史自我的影響。傳統天下觀的中國角色為天下的領導者、天下的保護者以及周邊民族的榜樣，並不要求周邊的小政治實體（四夷）體制完全複製成中國的政體。且對於周邊小政治實體多要求宣示效忠或建立關係，而非中國自身主權的擴張。清末時期，國家概念在此起彼落的外來者影響下確立，中國的歷史自我由天下的領導者、天下的保護者以及周邊民族的榜樣降階為區域領導者與區域保護者，<sup>38</sup>甚至在二次大戰中，因日本入侵成為被害者的角色。上述的歷史自我將在中共建政後的他者投射影響下，建構出新的角色與內涵。

回歸角色理論的基礎，亦即國家角色是自我與他人之間互動出來的，因為，在現實中，沒有一個自我是可以獨立於他人之外的存在。不同學者有著不同的關

<sup>38</sup> 與明朝末期相似，清朝末期日本入侵朝鮮半島時，中國持續扮演著區域保護者的角色，出兵朝鮮幫助區域中的被保護者(protectee)。



懷重點，所以分析途徑以及分析的重點就會有所不同。如 Harnisch 提出的國家的角色建構(Role conception)是內在自我(The Self)與外在的結構以及他者(The Others)的動態結合下的產物。Thies 則將「我者」區別出了角色期待、角色需求、角色定位（與他者互動後的結果），「他者」影響則用觀眾效應來解釋。石之瑜在解釋中國角色的分析時，透過國家對內的身份（我者）與國家對外的圖像（他者）。<sup>39</sup>

在短期個案中，「他者投射」主要探討的是個案中具有重要影響性的另一個行為者。然而，中共建政至今的長期發展，更多的是受到外部結構的力量影響。中共的角色在建政後經歷了一面倒向蘇聯的忠實盟友（faithful ally）、反帝的代理人（antiimperialist agent）、同時反蘇反美的孤立者（isolate）、第三世界革命解放的堡壘（bastion of revolution-liberator）、中美正常化後的平衡者（balancer）到今日的區域強權（regional power）。<sup>40</sup>本章節將討論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的角色認知，以及角色認知受到他者投射衝擊下的角色轉換。

## 壹、兩極結構下的一面倒向蘇聯

1945 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熱戰結束後，開啟了美蘇兩強對峙的冷戰格局，至 1949 年中共政權建立後此格局並沒有改變。由於中國新生的政權在意識形態中與歐美國家有深刻的矛盾，加上美國持續支持撤退至臺灣的中華民國政權，因此中共此時只有選擇與其他共產國家建交的道路。於是在 1949 上半年，毛澤東提出了「另起爐灶」、「打掃乾淨屋子再請客」和「一邊倒」三條方針，成為一面倒向蘇聯的忠實盟友，在兩極結構中決定投向共產陣營。這是根據中國的歷史和現實以及當時的國際環境做出的決策，並持續到 1956 年。<sup>41</sup>

<sup>39</sup> 石之瑜的分析方式較為特別，他將重點置於中國自身的不同面向上。「身份」是給予國內自身上而下與下而上構成的認同，「圖像」是給予「他者」理解中國自身的對外面向。所以「身份」較為自我中心，「圖像」則有讓他者接受的需求，深具關係性（relationality）所以會較願意努力符合外界期待與扮演無私。

<sup>40</sup> 同時包含了區域領導人與區域保護者的概念。

<sup>41</sup>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二卷（1949-1978）上冊，（北京市：中共黨史出版社，2011 年），頁 21。



在這樣的兩極結構中，中共選擇依附蘇聯這個共產陣營。換言之，中共在此時的外部結構中並沒有表現出如南斯拉夫「和而不同」的自身角色能動性。這個階段中共與蘇聯關係緊密，並在 1949 年底毛澤東親自赴蘇訪問後，雙方簽訂「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這個階段中國大致上依附於蘇聯並執行史達林的意志，又由於中共自身的歷史自我受到美蘇對立的兩元世界觀影響，相信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兩者無法相容，所以在建政初期的階段全力的援助蘇聯意志。最具代表性的案例當屬於中共不顧自身窮困，毅然投入對抗美國的朝鮮戰爭。這可能也小部分與中國歷史自我中區域保護者的概念結合。

朝鮮戰爭作為中共建政初期最重要的外交事件，中共人民解放軍在朝鮮戰爭的成果成功地抵禦了當時中共意識形態中「帝國主義」的攻勢，確立了日後朝鮮半島南北對峙的局面，強化了中共是反帝代理人的角色。在這場戰爭中，中國身為一個較為落後的國家，竟然可以將當時首屈一指的美軍打上談判桌，這贏得了其他共產國家與第三世界國家的尊敬，也漸漸地促成了中國的角色行為變化。1953 年底和 1954 年初，中共展開對印度的外交談判，一方面在重劃邊界時自動讓步，另一方面則讓一些無解的外交懸案懸在那裡，不堅持非解決不可，因而印度同意取消獨立前之宗主國（英國）在西藏的不平等權利。也在這一次的外交談判中，中共正式提外交五原則，即互相尊重領土主權、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平等互惠以及和平共處。有了這些外交突破，中共在國際場域開始得到善意的回應與第三世界國家的友誼，打破了除了共產國家外的國際孤立的態勢。中共在韓戰中的發揮對於日後中共的角色認知提供內涵，也積累了日後中共展現角色能動性的資本。<sup>42</sup>

中共經歷了建政初期一面導向蘇聯的外交方針，中蘇兩方雖有矛盾但仍被毛澤東定義在「人民內部矛盾」的範疇，這樣的態勢持續到 1953 史達林過世後基本沒有改變，但是中蘇關係和赫魯雪夫的甜蜜期極短，在赫魯雪夫上台後兩方關係的惡化開始浮上檯面。中蘇雙方公開決裂的主要導火線是 1956 年蘇共二十大

<sup>42</sup> 陳永發，共產革命七十年，上冊，頁 565。

中提出「關於個人崇拜及其後果」批判史達林在共產主義國家發展過程中的錯誤，自此中共與蘇共開始彼此猜忌，並在六零年代公開決裂。

在這個階段，國際格局基調沒有改變，但國際情勢出現了三點變化。首先，蘇共二十大過後激起了共產陣營自身國家不滿，波蘭與匈牙利出現了反蘇的抗爭被蘇聯老大哥鎮壓。且蘇聯此時認知到在美蘇之間均有核武器的情況下，不能再走過去全面對抗的路線，試圖與美國破冰的「三和路線」。<sup>43</sup>因此，美蘇兩超進入了時而緊張時而緩和的階段。其次，兩個主要陣營之間已不再是鐵板一塊，雙方都有各自陣營之間的矛盾。最後，亞洲、非洲與拉丁美洲的獨立運動興起，第三世界的勢力逐漸增強，造成國際上美蘇兩超均在這些地區加強自己的影響力。<sup>44</sup>在這樣的時局變化下，中共漸漸地找到自身能在世界發揮的機運和舞台，改變了自身角色的行為，不再只是蘇聯的忠實盟友，表現出了更多的角色面貌。

中蘇雙方在 1958 年至 1960 年間出現了巨大的關係轉變。先是在沒有知會蘇聯的情況下炮擊金門，後在蘇聯在中國境內興建長波雷達爭論主權議題，又在共同潛艇艦隊議題上爭論不休，蘇聯更在中印衝突時公開發表反對聲明。在 1960 年時雙方的衝突完全擴大，中國方面開始提倡「反對修正主義」，蘇聯則直接召回在中國的全部蘇聯專家。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鄧小平提出：「中國共產黨永遠不會接受父子黨父子國的關係。你們撤退專家使我們受到了損失，給我們造成了困難。中國人民準備吞下這個損失，決心用自己雙手的勞動來彌補這個損失，建設自己的國家<sup>45</sup>」

自此，中共與蘇聯走向了不同的道路。在國際上，左打蘇聯修正主義分子，右打美國帝國主義，積極拉攏第三世界國家。在國內，開啟了中國式的發展路線，亦及大躍進的嘗試，以及日後的文化大革命，力求快速趕上先進國家「超英趕美」。

蘇共二十二大結束後，中蘇雙方開始展開論戰，蘇聯批評中共是狂熱的民族

<sup>43</sup> 亦即「和平共處」、「和平競賽」與「和平過渡」。

<sup>44</sup>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二卷（1949-1978）下冊，頁 632。

<sup>45</sup>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二卷（1949-1978）下冊，頁 643。

主義者，而中共也批評蘇聯和南斯拉夫兩國為修正主義國家，並不能代表世界革命中心的角色，蘇聯更是大國沙文主義，<sup>46</sup>互相驅逐外交官和學生。<sup>47</sup>這個他者投射改變了中共一面倒向蘇聯的忠實盟友角色，感受到此時中共的角色受到1964年赫魯雪夫下台後布里茲涅夫接任，中共派遣周恩來和賀龍前往莫斯科參加慶典，試圖緩和雙邊關係。但當時的蘇聯國防部長建議賀龍效法布里茲涅夫，將毛澤東趕下台。在賀龍上報毛澤東後，雙方衝突進一步擴大化，彼此的邊界不時發生武裝衝突，又加上當時中共成功試爆原子彈，中蘇雙方終止了黨與黨之間的聯絡，更在日後對美國伸出友誼之手，彌補自己在國際上的戰略劣勢。<sup>48</sup>

此時中共有鑑於蘇聯的北方威脅、美國越戰的南方威脅與國內情勢的考量，發展了「三線建設」。「三線建設」內涵分別為，將沿海一線容易受到攻擊的工廠遷移到內陸的山西、河南和兩湖西部的二線地區，以及雲南、貴州、四川、陝西、寧夏、青海和甘肅等七省的三線地區，同時在三線地區建立一個完整的重工業和國防工業體系。<sup>49</sup>此時的蘇聯威脅，恍若清末「塞防論」的再現。此時的中共外交也陷入了瓶頸。一方面與印度交惡，另一方面印尼發生政變，親中的印尼共產黨幾乎被剷除，這造成亞非國家的外交進展困難。毛澤東為了打破孤立，全力援助各國親中的侵華派系，尤其是全力援助北韓、北越和阿爾巴尼亞。

綜觀這個時期的中國他者投射，中國原本的蘇聯忠實盟友角色被蘇聯所背叛，中國也因此不再認知蘇聯為反帝主義的代理人角色，自己應該取而代之，甚至也要成為解放的支持者（liberation supporter）。因此，爭取美蘇之外的中間地帶國家支持，成為主流兩方陣營外同時反蘇反美的孤立者，與第三世界發展友誼，就是此時中國角色的主要扮演。劉少奇、周恩來、陳毅多次出訪亞非國家，再次重

---

<sup>46</sup> 筆者認為，中共此時已將蘇聯認定為對中國主權有侵略可能的另一種形式的帝國主義角色，為與傳統美國帝國主義者的角色做出切割，因此將蘇聯定性為修正主義，已經不再是共產革命的意識形態盟主，中國才是反帝國主義的代理人角色。

<sup>47</sup> 陳永發，*中國共產革命七十年*，下冊，頁766。

<sup>48</sup> 陳永發，*中國共產革命七十年*，下冊，頁766-767。

<sup>49</sup> 陳永發，*中國共產革命七十年*，下冊，頁766-768。

申中國的和平共處五原則，逐漸發展成為世界是一隻獨立的力量。<sup>50</sup>對中國而言，在這個時期若蘇聯真的如「三和路線」中所提，與美國和平共處，則自己將會是下一個可能的目標。所以此時的中國角色選擇「不尋求參加既有的集團或建構自己的集團，已克服自己的孤立處境……只要有可能，鼓勵靈活權變及多極化……其意在於鬆開超級大國的控制……最終使得中國在 1972-1989 年間，透過創造和操控一個戰略三角，成為冷戰期間唯一從美蘇對峙中獲取安全好處的國家。」<sup>51</sup>

## 貳、中美關係正常化與三個世界論述下的中國與他者投射

國際格局在 60 年代至 70 年代產生轉變。美蘇之間原本美國具有科技優勢，蘇聯發射第一顆人造衛星造成了華府震撼，此時蘇聯的軍事科技發展也使美國感受到威脅。此外，美國陷入越南戰爭無法收尾的困境，尼克森上台前就已經發表文章認為需要與中國合作。<sup>52</sup>毛澤東此時委託葉劍英、陳毅、徐向前、聶榮臻四人研討此時的國際關係以及中國未來的可能佈局，四人認為國際上的主要對抗集中在美蘇之間，中國在美國眼中是個潛在非立即的威脅且目光主要放在西方。蘇聯則將中國當成主要敵人，對於中國的威脅較美國更大。中國則應該利用美蘇之間的矛盾，在雙邊爭取最大利益，因此有必要開展中美關係。<sup>53</sup>此後，與美國接觸成為了選項。

在蘇聯作為此時的主要他者威脅下，中共在 1968 到 1969 期間多次在邊界出現衝突，毛澤東更在 1969 年發動珍寶島反擊自衛戰，給予美方中國已與蘇聯硬切割的訊息。中共在審視了與蘇聯徹底翻臉後的國際政局，以及美國對中國釋放出的友善訊息，認為此時的美國並沒有立即的危險，已經不是對中國有威脅的帝國主義擴張者。<sup>54</sup>美國同時也在中蘇翻臉後，認知到中國的角色已不再是蘇聯的

<sup>50</sup>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二卷（1949-1978）下冊，頁 659-668

<sup>51</sup> 黎安有、施道安著，何大明譯，**尋求安全感的中國**，（新北市，左岸文化出版，2013），頁 52-53。

<sup>52</sup> 1967 年的外交季刊，尼克森署名發表了：從長遠來看，我們簡直經不起永遠讓中國留在國際大家庭之外...在這個小小星球上，容不得十億最有才能的人民生活在憤怒孤立的狀態中。

<sup>53</sup>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二卷（1949-1978）下冊，頁 882-886。

<sup>54</sup> 1968 年爆發捷克民主化事件，蘇聯提出「社會主義國家有限主權」的論調，派大軍深入捷克鎮壓。這代表了社會主義陣營中的國家，並沒有完整的主權，若與蘇聯為敵，蘇聯將會進行武裝干涉。這給了中國共產黨敲醒了警鐘，若要真正的獨立自主，則不能繼續待在蘇聯式的社會主義



忠實盟友，有成為美國在亞洲地區的合作者角色 (regional-subsystem collaborator) 的潛能。毛澤東在 1970 年年底透過新聞記者史諾傳話給美國總統尼克森，表示有意改善中美關係。此時尼克森陷入越南的叢林泥沼，更有意願聯合中國抵制蘇聯。中美雙方次時期頻繁透過不同層級與代理人甚至國家乒乓球隊進行接觸、交換意見、建立關係與象徵意涵。1971 年 5 月 26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討論中美預備性秘密會談的問題，提出了八點原則。前七點均與臺灣問題有關聯，最後一點提到東亞問題，<sup>55</sup>可見此時中美之間最爭議的議題就是臺灣問題。1971 年，中共在被孤立了四十多年後，獲得美國的支持，進入聯合國，取代了中華民國常任理事國的位置，<sup>56</sup>並在 1972 年簽署中美上海「聯合公報」，雙方關係正常化。

雙方關係正常化後，中共在世界舞台的角色隨之轉變，從被孤立者變為具有十億人口的潛在大國。中共自身看待世界的方式也有所改變，除了繼續與社會主義陣營交好外，開始與越來越多資本主義國家建立了外交關係。中國既不是完全擁護蘇聯的共產主義陣營，也不是資本主義國家的獨立者 (independent)，<sup>57</sup>這使得中國在外交上的處理可以更有彈性。毛澤東遂在 1974 年提出「三個世界觀」的戰略思想，基本認為蘇聯與美國是第一世界，亞非拉等發展中國家為第三世界，在這之間的其他國家為第二世界。中國屬於第三世界的一員，有義務與廣大的第三世界國家團結，爭取第二世界國間，聯合反對超級大國的控制與壓迫；在與第一世界美蘇兩個超級大國的霸權注意展開鬥爭時，注意聯合威脅較小的一方，集中力量反對更加危險的蘇聯霸權主義。<sup>58</sup>這樣子的劃分方式，很近似於中國於 50 年代開始展開角色能動性時的爭取亞非拉國家策略，差異在於與第二世界國家的和解與拉攏。

---

國家集團中。

<sup>55</sup>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二卷（1949-1978）下冊，頁 891-893。

<sup>56</sup> 陳永發，**中國共產革命七十年**，下冊，頁 832。

<sup>57</sup> Hosti 對於獨立者的定義為：不作為特定國家的忠實盟友，主要政策制定為自身利益而不是其盟友的意志。

<sup>58</sup>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二卷（1949-1978）下冊，頁 896-898。



自此之後，雖然冷戰的外部格局並沒有劇烈改變，中國擺脫了過往的外交孤立進入了世界體系。

### 參、改革開放後中國的角色變化與他者投射

中國在擺脫被孤立者的角色後，在國際上成為了重要的戰略角色。中國成為獨立於兩大陣營的獨立者，甚至是美蘇之間的平衡者。中國成為了兩強之間的重要籌碼，成為在冷戰結構中重要的角色，與兩強之間搖擺的玩家。此時美蘇兩強在海外的政治勢力投射，如蘇聯勢力進入中南半島（結盟越南入侵柬埔寨）與中亞（扶植阿富汗政權），以及日本與蘇聯在千島群島的爭端，中國都在其中影響了時局，<sup>59</sup>限制了蘇聯勢力的擴大。因此，美國在亞洲所投注的資源減少，更進一步的加強歐洲的實力，這使蘇聯西邊的威脅加重。中國此時受到蘇聯直接的軍事威脅減少，所以可以開始將資源投注在軍工業之外的領域，加強國家的四個現代化。簡言之，中國透過與美國交好，使用外交途徑成為牽制蘇聯的力量，當中國角色重要性上升，蘇聯侵略中國將受到美方的反對，因此中國此時的重要性上升，但軍事實力反而沒有過往那麼大的需求，幫助中國內部現代化的成長。

綜合上述的內容，張登及認為此階段 1978 年到 1982 年的中國為「聯合美國制衡蘇聯霸權的平衡者」，在中美關係正常化後，鄧小平緊接訪美，雙方開始了甜蜜期，甚至中國讓美軍在新疆建立兩個對蘇聯的監聽站。<sup>60</sup>可以說是從二十世紀開始後中美雙方走的最近的階段。

有鑑於西風又壓過了東風，莫斯科試圖與中國關係正常化。毛澤東過世後布里茲涅夫認為與中國改善關係的時期來臨，布里茲涅夫在 1982 年提出在互相尊重的基礎上舉行會談，尋求兩個共產主義陣營大國之間的關係正常化。<sup>61</sup>這樣的蘇聯他者投射增強了中國作為獨立者與平衡者的兩個角色內涵。而且，隨者中國國力的增強，周邊國家對中國的合作需求也增高，增強了中國重新取得區域領導

<sup>59</sup> 黎安有、施道安著，何大明譯，**尋求安全感的中國**，頁 131-133。

<sup>60</sup> 張登及，「外交戰略與國際地位」，王振寰、湯京平、宋國誠，**中國大陸暨兩岸關係研究**，（新北市：巨流，2011 年）頁 429-430。

<sup>61</sup> 黎安有、施道安著，何大明譯，**尋求安全感的中國**，頁 135-137。

人與區域保護者角色的自信。中國藉此當作籌碼，與美國換取了與臺灣核心利益相關的上海公報。此階段中國在美蘇兩國之間搖擺，在十二大時宣布「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成為「獨立自主」傾向西方的平衡者。<sup>62</sup>

戈巴契夫上台後，一改前任的施政，進行政治改革。在國際事務方面，快速在亞洲區減少駐軍，尋求過去達不到的外交突破。這造成了中蘇、美蘇關係快速友好與自身日後的崩潰。在1989年，四月十五日到六月四日，大量的中國青年上街集會向逝世的胡耀邦表達敬意。隨著時間的進展，遊行群眾慢慢轉變為要求「第五個現代化」的民主示威，與當局的緊張關係不斷升高，終在六月四日達到頂點，軍隊在這天強制恢復了秩序。這樣的行為避免了中國如「蘇東波」的解體，但也讓提倡自由民主輸出的美國需要採取必然手段，避免自身意識形態與道德領導者的國際角色違背，因此與中國的高層停止接觸，並進行經濟制裁。

中國領導人鄧小平與美國總統雷根在這段期間內私下交換了許多意見，對美國而言，中美關係再次崩壞將影響美國自身的利益，所以在這階段中，美國前官員如尼克森與季辛吉均有與鄧小平會面，但仍要到1993年在西雅圖舉辦的亞太經合會（APEC），兩國高層才恢復接觸。這段時間內，中國受到美國官方的刻意疏遠，這樣的他者投射下，獨立者的角色越發明顯，且強調中國的自身發展（internal development），韜光養晦孕育而生。也因為此時的中國在西方世界沒有辦法尋求突破，因此在其他地區尋求發展，如中國此時快速地與周邊國家關係如越南、南韓與台灣等改善關係。張登及將中國這個時期的角色定義為1989年到1993年「韜光養晦」尋求突圍的平衡者。

中國在1993年後，面對到的是美國作為獨強的世界，雖然兩國已經改善了關係，但中國認為均勢的世界與多極化的理念可以確立中國成為大國的位置。因此張登及提出1993年到1996年中國的角色是「以均勢尋求大國身分」。<sup>63</sup>中美在因為1989年六四天安門後的封鎖破冰後，雙方關係快速深化。但是就此時的

<sup>62</sup> 張登及，「外交戰略與國際地位」，頁430-431。

<sup>63</sup> 張登及，「外交戰略與國際地位」，頁433-434。

國際戰略結構而言，蘇聯的解體意味著連中抗蘇的需求已不存在，六四事件的爆發讓美國意識到，他們想像中國可以慢慢成為分享自由民主價值觀的國家可能性失去。此外，當中國客觀的地位與重要性越強，「中國威脅論」就越有市場，從人權及西藏到貿易壁壘及操控匯率，從臺灣到智慧財產權，從氣候變遷及環境到中國的軍隊威脅。<sup>64</sup>如何在客觀地位的提升時降低他者對其的恐懼，使他者相信中國和平發展的身分，將是中國成為大國的過程中所必須面對的挑戰。

張登及將 1996 年至 2001 年的中國角色稱為「負責任大國」身分的發展。<sup>65</sup>中國此時國力提升以及香港的回歸都給予了中國自信，又由於江澤民終於在第二代領導人退出政壇後實質全面掌權，中國開始開展高層互訪結交強權發展「大國外交」。其他國際行為者也承認中共「大國夥伴」的地位予以滿足，希望換取與中國在國際問題上的實質合作，此時中國也在 1999 年與美國達成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協議。但是「中國威脅論」仍然存在，2005 年美國副國務卿佐立克代表布希政府發布一項重要的對華政策聲明。他告訴美國群眾，中國的崛起不是威脅，因為中國並不尋求散播激進的、反美的意識形態。而且不相信其未來取決於推翻國際體系的基本秩序，在這樣的基礎下美中雙方可以有合作關係。但是美中合作取決於中國必須與美國共同致力於塑造未來的國際體系，而且需要降低美國對中國崛起所引起的焦慮，美國歡迎中國在國際事務中扮演一個「負責任的利益相關者」，而美國將與中國維持策略性模糊關係，既已觀察中國的行動。<sup>66</sup>

美國對中國的胡蘿蔔和棒子策略造成中國判讀美國意圖的困惑。2001 年後，美國對於中國角色的他者投射轉變。美國一方面表現出與中國合作的雙贏利益，一方面卻干涉中國內政欲強加西方世界價值觀。中國此前積極的與美方合作的「負責任大國」角色因而產生困惑，因此中國在與美國關係改善之於，也與中俄關係關係改善，繼續推銷「多極化」理念，<sup>67</sup>中國將在「多極化」中成為獨立自

<sup>64</sup> 黎安有、施道安著，何大明譯，**尋求安全感的中國**，頁 165-166。

<sup>65</sup> 張登及，「外交戰略與國際地位」，頁 434-435。

<sup>66</sup> 黎安有、施道安著，何大明譯，**尋求安全感的中國**，頁 167-168。

<sup>67</sup> 張登及，「外交戰略與國際地位」，頁 434。

主的自身角色新定位。且不相信世界僅有西方式價值觀，中國將成為自身信仰的捍衛者（defender of the faith）尤其此時美日簽訂安保條約，美國又同意時任臺灣總統的李登輝赴康乃爾演講，中美關係因此低落了一陣子，中國遂開展與其他國家建立關係。從大國之間的交往到周邊國家的合作，這都是建立國際上的籌碼，讓中國與美國談判時不氣虛。2001年至2002年較為接近一個過渡的時期，主要原因在於小布希上台後將中國認定為「戰略競爭者」的時間其實不長。在911事件後，中國與美國在世界反恐上找到了一個新的合作議題，尋求世界戰火的喝止，如朝鮮無核化的嘗試，臺灣問題與美中競爭就進入了次要的議題中。

胡錦濤上台後，中國的國際地位進一步的提升，更試圖扮演更重要的身分。張登及提出2002年至2010年中國的身分是「朝向霸主下的首極前進：負責任的挑戰者」。<sup>68</sup>此時的中美關係可以由2006年胡錦濤訪美提出「發展雙邊關係六項主張」做為總結，中國主張展開與美國的高層互動進而增加互信、強化雙方經貿關係，強化互賴，減少衝突、在臺灣問題上尋求美國共管法理台獨勢力<sup>69</sup>。

但是一個越來越強大的中國對美國以及周邊國家都可將其視為威脅，「再平衡」就是中國威脅論下的展物。歐巴馬上任後婉轉的依循布希政府時期的脈絡，在2009年提出了「戰略保證」的想法：

我們準備好歡迎中國...作為一個繁榮且成功的國家...中國也必須向世界各國保證，其發展的增強不構成威脅...，增加其軍事透明度，以使亞洲其他國家和全球對其意向放心...並表明它尊重法治和普適規範...我們將密切注意中國的軍事現代化計畫，並相應的準備去確保美國的利益及其盟友...我們將鼓勵中國，隨著其影響力上升，做出有助於和平、安全和繁榮的選擇。

70

兩國之間的競合關係可以藉此作出小結：美國歡迎中國崛起後的經濟實力，進入世界國際貿易，並增進全世界貿易的繁榮，促進世界穩定。但是對於中國崛

<sup>68</sup> 張登及，「外交戰略與國際地位」，頁437-440。

<sup>69</sup> 張登及，「外交戰略與國際地位」，頁438。

<sup>70</sup> 黎安有、施道安著，何大明譯，**尋求安全感的中國**，頁169。



起的軍事威脅，則中國需要降低各國對他的疑慮。

#### 肆、大國的想像與實踐：習近平時期的中國角色變化與他者投射

「朝向霸主下的首極前進：負責任的挑戰者」這個身份應用到習近平時期的中國角色還是適用，但是需考量到 2009 年開始美國「再平衡」系列政策的挑戰。本文認為，2010 年後，由於中國面對到了更多的挑戰，客觀地位的持續增長，以及想要在世界有所作為的身分認定，中國的角色成為「負責任的挑戰者 2.0」。與過去的負責任挑戰者相比，負責任的挑戰者 2.0 更加強了中國詮釋的「負責任」內涵。中國以自身的成長背景（歷史自我）以及過去負責任的挑戰者實踐經驗，從被動的接收何謂「負責任」內涵的階段，轉變到主動詮釋何謂「負責任」的時期。

在中國崛起不是一個是否命題後，外界面對到中國的問題轉變為「面對這樣的機會與威脅，要如何與其相處？」。David Lampton 提出，在中國國內治理和外交決策的領域裡，平衡和穩定是核心利益。<sup>71</sup>石之瑜與黃瓊菽也提出中國發展的戰略意義在避免美國的大戰略對中國的利益產生衝突。<sup>72</sup>中國他者投射與對自我的角色認知結果，表現在鄧小平所說的「韜光養晦，有所作為」。韜光養晦是作為獨立者與內部發展的角色，當外界質疑中國崛起的威脅時，韜光養晦成為了主要身分認知；「有所作為」則是內部發展、自身信仰的捍衛者、區域領導人與區域保護者的多重角色結合。除了自身實力等硬「位置」外，對自我認知的「身份」也在重塑。

習近平上臺後面對到的外部環境是美國結束「反恐戰爭」的迷失，重視制衡中國的政策。美國直白的「重返亞洲」再平衡攻勢，表現在美越、美韓、美日、美澳、美菲的關係加強，推動 TPP 的舉動（雖然川普已取消）等美國重返亞太的具體攻勢。胡錦濤時期的大國關係「和諧世界」帶來了當時的外交成功，此時在美國積極介入亞太下需要新的論述。尤其是中國對朝鮮的曖昧行徑，使得鄰國

<sup>71</sup> David M. Lampton 著，林添貴譯，從鄧小平到習近平，（台北市，遠流，2015 年），頁 141。

<sup>72</sup> Chih-Yu Shih & Chiung-Chiu Huang, "Identity and international role of China.", pp. 59-76.



質疑其區域穩定者的角色。又有遼寧號下水、南海建島爭議、機艦進入釣魚台水域爭奪管轄權的舉動，均重創了中國經營許久的負責者「身份」。<sup>73</sup>

當此之時，習近平回防周邊的「亞太夢想」，便是回應美國重返亞洲的理念。習近平一系列的東協建設「命運共同體」主張，在蒙古回應「搭便車」論，歡迎周邊國家共同來搭中國發展的列車，出訪印度強調共創和諧的「亞洲世紀」等等作為<sup>74</sup>是補強中國作為負責者的「身份」。「一帶一路」與「亞投行」更是中國被美國藉由 APEC、ARF 乃至於 TPP 的政經包圍所想出的突圍之道。因此本文認為，中國在美國重返亞洲策略後的角色，仍然是「負責的挑戰者」。中國自我認知的「身份」仍是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一帶一路」與「亞投行」的主要對象就是周邊發展中國家，藉由經濟為媒介趁勢鞏固周邊外交，增強中國在亞太地區的話語權，突圍近期美國對於中國的結構限制。更是現今中國內部發展、自身信仰的捍衛者、區域領導人、區域穩定者四個中國角色的角色行為，構成了中國「負責的挑戰者 2.0」的角色。

### 第三節 小結

本研究依循角色理論的定義「角色認知會影響角色行為」，認為中國大陸在兩岸關係中的行為會受到自身國際角色的影響，因此在實際觀察兩岸關係行為前，本研究將會先聚焦在中國大陸自身的轉換。因此，本章節分為兩個部分討論中國的角色形塑，分別是「中國角色的歷史自我」以及「中國式世界觀底下培養出的他者投射」這兩部分的觀點，意圖透過角色理論中的我者與他者視角拼湊出中國大陸依循內外兩個主因的角色建構過程以及結果。角色建構的過程代表了角色形塑的脈絡，分析角色建構過程對日後觀察其行為至為重要。本文將角色建構區分

<sup>73</sup> 張登及，「『再平衡』對美中關係之影響：一個理論與政策的分析」，遠景基金會季刊（台北市），第 14 卷第 2 期（2013 年 4 月），頁 71-72。

<sup>74</sup> 蔡東杰，「近期中國對亞洲外交政策及其影響」，全球政治評論（台中市），特集（2015），頁 17-30。

出了兩個途徑，分別是「歷史自我」與「他者投射」。上述兩個路徑分別代表了「我者」與「他者」兩個概念，彼此相互影響下建構出了角色。筆者認為，中國「歷史自我」的內涵中，也有豐富的內外分際之別。換言之，探討中國「歷史自我」當中「我者」與「他者」兩個概念，有助於理解今日在中國角色變化。

張登及意圖完善攻勢現實主義的解釋力，提出「位置」與「身份」兩個補充因素。物質性的因素如國家實力以及地緣政治因素，被歸類在「位置」因素；理念性的因素決定了國家對威脅大小的認知，這認知是由國家的「身份」（意識形態、宗教、文化、國家認同、政治信念），以及對競爭對手的相對「身份」發展趨勢的論斷所決定。<sup>75</sup>石之瑜繼續深入「身份」的概念，區別了身份當中對內「認同」與對外「圖像」的差異。「認同」由於對象是國內，所以內容會設計得較容易被群眾接受；「圖像」的對象是外部行為者，所以內容也會盡量避免與鄰交惡。所以在分析中國決策時要區別兩者不然會影響評估。

本研究試圖結合中國的歷史自我（身份、認知、慣性、意識形態等等）以及近代在國際結構的他者投射（國際結構的影響、鏡像模仿、互動後的變化）兩個面向，建構出中國的角色建構與變化。本文可以從中國的歷史自我歸類出中國角色的幾點特性，中國的歷史自我影響的主要是張登及提出的「身份」內容。首先，中國在歷史上大部分時間都很強大，而且周邊勢力林立，因此在與外部勢力接觸時會出現一些特性。中國並不會完全以交流時所達到的利益為政策導向，更多的是希望與其建立關係，進一步得到他者對中國的「尊重」。而且，這種行為的背後，代表中國是當時東亞國際穩定的最大力量，也就是區域領導人與區域穩定者這兩個角色。在中國天下觀朝貢體制下，周邊國家的穩定有賴於老大哥的維持，這與中國在不同雙邊關係中需要表現出自身的格局。在面對到破壞關係的威脅時，中國可能採取不符合成本的強硬手段，進而達到懲罰目的與關係平衡。又因為沒有出現戰爭時，中國的國家軟硬實力都可以很好的發揮，中國也不認為需要他國的幫助。中國作為周邊國家的領導人、穩定者與榜樣的角色，核心利益即是周邊

<sup>75</sup> 張登及，「『再平衡』對美中關係之影響：一個理論與政策的分析」，頁 53-98。

穩定，而不是交流得到好處。換言之，在中國的歷史自我中，中國的天下領導人角色最核心的議題並不是國家利益，<sup>76</sup>而是不同群體與中國之間的關係。這一方面在周邊勢力認同中國時得到加強；另一方面，在周邊勢力不認同時遭到削弱甚至挑戰。

其次，中國歷史上的地緣政治比美國複雜許多，所以在處理雙邊關係的時候必須更為務實。又因為雙邊關係較多邊關係容易談判，因此中國在處理國際事務時會傾向將國際關係視為一個個的雙邊關係，並且以中國的大戰略和符合為原則，並不需要認同該國領導人。如過去南越大臣弑君上位入國朝貢，中國以自身穩定的利益為考量依舊給弑君者中國的認同，等於給予了弑君者統治合法性。表現在現代可以北朝鮮為例，Lampton 書中寫到唯有北朝鮮的國際行為影響到中國的國際利益時，中國才會對其施加壓力，但又不希望這壓力大到造成不安定、並波及中國。<sup>77</sup>解放軍資深情報官員曾說：「中國的第一利益是非核的朝鮮半島。當大韓民國的外交部長在北京時，他（全國人大委員長吳邦國）說他有三個惡夢：一、北朝鮮擁有核武器；二、戰爭；三、北朝鮮崩潰。因此我們的國家利益是避免這三個惡夢。金正日的性格或意識型態與我們不相關。」<sup>78</sup>這同時也符合了黃瓊萩比較中美國略思維時所提出的，中國的大戰略是防禦性與「關係」導向的，「以身作則」、「不取人，不往教」。<sup>79</sup>更帶出了中國天下領導人與榜樣角色中，並不強加自身道德準則予他人的特性。在天下觀中，他者之所以為他者正是因為文化與中國不同，他者可以認同中國文化進而進入文化中國的領域；若他者堅持自己的政治形態，則中國也不會強迫改變。

在他者投射的部分，本文主要整理了中共建國後的外部結構對中國所造成的影響、在與他者互動後調整的「身份」以及當「身份」和「位置」不同步的調整。中國在建國後由於角色的不同，所以有著不同的大戰略。在建國初期，尤其是毛

<sup>76</sup> 因為天下觀的概念中沒有明確國家概念，他者皆可轉化為自我，唯德而已。

<sup>77</sup> David M. Lampton 著，林添貴譯，*從鄧小平到習近平*，頁 145。

<sup>78</sup> David M. Lampton 著，林添貴譯，*從鄧小平到習近平*，頁 146。

<sup>79</sup> 黃瓊萩，「關係平衡 v.s. 普世改造：中美國際干預風格與大戰略思維之比較」，*中國大陸研究*（台北市），第 58 卷第 4 期（民國 104 年 12 月），頁 71-92。

澤東時期，由於中國區域領導人與保護者角色非常的虛弱且不被承認，更有受害者角色的強烈的亡黨亡國危機，所以主要大戰略就是打倒敵人站穩陣腳。透過主要威脅認知的改變，先倒向蘇聯後反蘇聯美。與美國關係正常化並建交後，從世界舞台被抹去的威脅減少了，因此中國的角色關注於自身的發展，鄧小平時期的大戰略遂成為中國的領土與政治完整，以及後期的中國和平過渡，進入國際舞台的政治制度與經濟體系的框架。後鄧時期的江與胡大致依循了後鄧時期的中國大戰略，此時中國角色成為區域大國的客觀「位置」已然成立並越來越穩固。

惟中國的「身份」還在不斷調整，從「負責任的大國」到「負責任的挑戰者」。習近平時期的中國各方實力以及身份認知進一步的發生了變化，中國「負責任的挑戰者」身份受到美國與周邊國家的他者投射。中國歷史學者劉仲敬認為中國終將脫離「韜光養晦」的主軸。他認為中國在國共內戰時並不想推翻國民黨，而是要國民黨承認自己越來越高的地位，最後的決裂並不是共產黨的錯；共產黨也並不想與蘇聯決裂，而僅希望蘇聯承認中共在朝鮮戰爭後越來越高的地位，若不被接受則是蘇聯的霸道和自私。「韜光養晦」的目標是付出最小代價的提升自己的地位，而現在的中國似乎開始採取了主動。近日中共的「一帶一路」方案在經濟學觀點看來是很有疑慮的，包含的國家並不具備良好的投資條件。所以真正的意義，應當在於透過虧錢的投資，變相成為中國對周邊國家的讓利，進一步的鞏固周邊成為圍繞中國的衛星國，突破中國在「再平衡」策略下被孤立的可能。<sup>80</sup>但是仍要注意在中國源於天下觀的關係平衡的思維下，北朝鮮、釣魚島與南海爭議這三件中國認為損及其核心利益的三件個案。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鄰國對中國區域領導人與區域穩定者角色的信心。「永不稱霸，永不擴張，永不謀求勢力範圍。」的「圖像」宣傳是否有效尚需評估。總而言之，美國與周邊國家的他者投射，將會進一步的影響中國此時的角色建構。

---

<sup>80</sup> 劉仲敬，*遠東的線索：西方秩序的輸入與中國的演變*，（新北市：八旗文化，2017年），頁435-437。





### 第三章 大小政治實體下的中國角色

本研究意圖研究兩岸關係，並認為中共並不是鐵板一塊，中共不同的角色，將會影響中共在兩岸關係中的角色行為。然而研究兩岸關係，還有一點特色甚為重要，那就是兩岸之間大小的巨大差異。事實上，大部分的國際雙邊關係都是一定程度的不對稱關係，然中國已成長為亞洲巨獸，周邊國家與中國的雙邊關係，幾乎都是擁有巨量差距的大小政治實體的實例。當雙邊關係的實力落差過大時，就需要借助不對稱理論的內涵，幫助理解與中國的關係。因此，本章節將會探討大小政治實體的理論，以及中國角色在一段時間的變化下，如何實踐在中國與周邊國家大小政治實體交流，以做為兩岸關係研究的啟示。

本文認為，中國—越南與中國—朝鮮關係比其他中國與周邊國家關係更類似於兩岸關係。越南與朝鮮在建構中國歷史自我中，佔據了重要的位置，兩者皆長時間是天下觀朝貢體制的被羈縻者。更有甚者，在中國歷史「天下觀」中，並沒有明確的主權與國界，越南與朝鮮兩者甚至可說是中國的領地。尤其在中共建政後，越南與朝鮮都視彼此與中共的關係為「唇齒」關係。中共作為勢力範圍內的老大哥時，也出兵援助過朝鮮戰爭以及越南戰爭，這與過去中國「天下觀」的實踐類似。此兩個雙邊關係有著豐富的合作過往與爭議的經歷，因此，與其他周邊國家相比，這兩個大小政治實體關係的實踐，相較於中國與其他國家的往來，更類似於兩岸關係。中國在面對這三個與自身有豐富歷史的大小政治實體關係時，對於自我身分與地位的角色認知，以及如何定義這段關係的性質，將會影響中國「大對小」的行為。而小國選擇的扈從、避險與抗衡的不同策略，也將回饋到大國對關係性質的判斷。因此，本章節將討論中國—越南、中國—朝鮮兩個大小政治實體案例，探究中國作為周邊國家的大國時，不同角色時表現出的不同行為。並根據此，探討其對中國—臺灣大小政治實體的啟示。

在小對大關係中，並不能簡單地將小國策略一刀切，而應該將其看作是多層

次、軟硬兼施的整體規劃，目的在最大程度的對己有利。小國可能同時與大國有著交往與制衡兩個舉措；同理，大對小關係中，大國對小國的舉措也會恩威並施，交往與制衡孰輕孰重端取決於大對小與小對大關係實踐過程的理解。本章節將主軸放於中國作為大小政治實體中的大對小關係，以中國為主要出發點，討論中國的角色變化如何影響其大小政治實體中的行為模式。此外，小對大的關係也將回饋到中國的角色認知。本章節將依序上一章節的中國角色變化討論，探討中共建政後的中國—越南與中國—朝鮮兩個不對稱關係個案，並到下一個章節重點分析中國—臺灣兩岸關係三十年的變化。

## 第一節 大小政治實體框架下的大國角色建構

中國大陸自 1978 年改革開放後，以其龐大的人口紅利與市場，經濟長時間以兩位數快速增長。以經濟為基礎的國力相應提升，一掃清朝末年表現出的衰弱與潦倒，毛澤東於 1949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慶典上說出「中國人民站起來了」的豪語，伴隨著中國改革開放後真正的實現。隨著綜合國力的提升，中國大陸積極參加國際組織，融入國際社會，在這個彼此依賴且牽一髮而動全身的現代國際體系中，中國的一舉一動受到了大量的關注。現實衍生出需求，特別是對中國大陸周邊國家而言，中國大陸的崛起衍生出中國研究的重要性。本節將探討大小政治實體的理論內涵，以及中國作為「大政治實體」的角色建構。

Nicolas Khoo 整理 Womack 提出的不對稱模型，整理出其三點特色：彈性（resilience）、大對小以及小對大的觀點差異（difference in perspectives）以及通過尊重（由較小行為者提供）和承認自主（由較大的行為者提供）的方式，建立穩定的不對稱關係（normal asymmetric relationship）。<sup>1</sup>筆者認為當中國為大政治實體時，還須加上中國自身的特殊性。

---

<sup>1</sup> Nicolas Khoo, Book Review China Among Unequals: Asymmetric Foreign Relationships in Asia, *Pacific Affairs*, Vancouver Vol. 85, Iss. 4, (Dec 2012), pp. 801-803.

首先，在大小政治實體理論中的雙邊關係，若沒有彈性則很容易斷裂，這樣的彈性來自於雙邊願意繼續這段關係。大小的差異對兩造關係有著深遠的影響，但是較大的一方很少能夠單方面主宰較小的一方，單純的命令較小方執行它的意志。Womack 認為國際關係理論中的假設：「只有大國在關係中是有利的，弱國是單純被主宰」，這種說法是一種錯誤。事實上，大多數國際關係是不對稱的，通常是談判而不是強迫。<sup>2</sup>

其次，大對小以及小對大具有不同的觀點差異。大小政治實體是觀察兩個實力不對等政治實體之間的中層理論，更多的是提供觀察大小關係的觀點與視野，研究者需分別探討大政治實體與小政治實體的知覺與行為，進而分析「大對小」與「小對大」兩種不同性質的關係，目的在於建立一個穩定的不對稱關係。Womack 認為在「大對小」時可能會忽視對方所傳達的訊息，相對的「小對大」則會有過度解讀對方意象的趨勢。本文認為，兩政治實體間對自我以及彼此都有所期待，通常人們花更多的時間去注意自己期待發生的事物，甚至過分的解讀了形勢，假如對方表現的方式與自我的期待不同，就視而不見或見而不識；相對的，當對方表現的方式與自我的期待相同時，就可能擴大解釋為對方整體都符合自我的想像。期待不獲滿足時的沮喪，與期待獲得滿足的錯估情勢，將回饋到認知，進而影響行為，<sup>3</sup>這便是月暈效應（Halo effect）<sup>4</sup>的影響。除此之外，知覺與行為取決於行為者的角色，如臺灣在北京眼中的特殊性，更要追尋至中國共產黨的歷史自我中。已經被中華人民共和國革掉命並繼承其國土政權的中華民國依然在世間存在，本就是中共政權統治的異音。因此，兩岸的主權議題上就是雙方最敏感的一點，這也是吳玉山在他的大小政治實體脈絡中提出臺灣視中共政權為欲吞併臺灣的大政權，而臺灣將會選擇扈從、避險或抗衡的主要前提。

<sup>2</sup> Brantly Womack, "China as a Normative Foreign Policy Actor," CEPS Working Document No. 282, 2008, pp.20. 檢索日期：2017年12月15日  
<<http://aei.pitt.edu/11662/1/1607.pdf>>.

<sup>3</sup> 石之瑜，*政治心理學*，（台北市：五南，1999），頁27。

<sup>4</sup> 「月暈效應」為心理學用語，在1920年由Thorndike, E.L.的「The Constant Error in Psychological Ratings.」提出，意指人與人之間的認知是從片面的印象出發，透過既有的印象想像出整體，因此會出現偏誤。

再者，大小政治實體中雙邊通過尊重（由較小行為者提供）和承認自主（由較大的行為者提供）的方式，建立穩定的不對稱關係。大與小是一個客觀事實，更是「地位」因素決定雙邊該如何選擇（或只能這樣選擇）處理雙邊關係的原因。一個穩定的雙邊關係，建立在小對大的尊重和大對小的承認獨立性上。若小國在這段關係中選擇完全對抗，則不可能奢求大國將忽視小國的舉措，決定繼續在這段關係中保持其對小國核心利益的承認；反之，大國若不承認小國具有獨立自主性並尊重其核心利益，也不可能期望看到小國對大國保持尊敬並願意在國際場合為其背書。綜言之，大小政治實體的穩定，是一個持續性的動態平衡，需要雙邊對這段關係有相似的認知，方能持續。

最後，Womack 認為中國在處理對外交流中具有特殊性，與其說中國在意每次交流所實質得到的事物，不如說中國更在乎「關係」本身。中國認為雖然未來是未知的，但是一個過去與現在都是合作夥伴的國家未來也會是合作夥伴。因此，任何互動的意義在於如何塑造出一個特定的關係；相對的，有些理論關注於當下，每次的互動在於當下時空的供需來決定。<sup>5</sup>中國將「關係」邏輯應用於國際關係，其目的在於優化關係而非當下利益交換。在這樣的假設中，中國的目的並不是利用大政治實體的身份侵犯弱者，使其在交易中更為得利，而是創建一個穩定有利的關係。如過去朝貢體系中北京會給小國更有價值的交換物品，因為中國認為讓周邊國家參與以中國為中心的朝貢體制比實際交易得利更為重要。因此，Womack 認為，中國在關係的互動中，會調整自我以適應對方的需求，而不是和週邊小國討價還價。中國之所以這樣做並不是傳統的利他主義，而是希望換取與周邊國家的友好關係。<sup>6</sup>當弱者被尊重身份與邊界時，方願意為強者背書。中國由於有著悠久的「不對稱關係」歷史，因此可以熟悉的管理不對稱關係。Womack 更提出，在現在這個多元的世界中，中國仍有許多要學習和適應的事物，但其他行為者也

---

<sup>5</sup> Branty Womack, "China as a Normative Foreign Policy Actor." p.20.

<sup>6</sup> Branty Womack, "China as a Normative Foreign Policy Actor." p. 21.



可以向中國學習。<sup>7</sup>

本文認為，Womack 將中國過去天下觀的朝貢國內涵，以及現在中國處理周邊不對稱關係的實踐經驗，兩者相結合，作為現在中國「大小政治實體理論」的內涵。Womack 認為大小政治實體理論有兩點基礎。首先，國力的巨大差異創造了雙方系統性的取向和看法的差異。大小政治實體理論並不是恰好兩個相似的行動者剛好有不同的國家能力。相反的，相互感知與相互作用是在雙方面對不同情況下的作為從根本上形塑。換言之，A 與 b 兩者之間的大小政治實體的關係應當切出 A 對 b 與 b 對 A 兩個不同的關係。其次，大小政治實體關係很少是完全沒有問題的，雙方利益和立場的不同都會帶來關係的緊張。然而，在大多數的例子裡，雙方能力的差距是不會轉變的，但強者的那一方也不能簡單地忽視弱者，雙方都不能忽視或單純的「解決」彼此的問題，因此雙方會在互動中找到兩造可以接受的互動方式。<sup>8</sup>這延伸出了 Womack 認為大小政治實體理論中有權力者不代表可以控制弱勢方。

本研究目標在於探討自 1987 年開始的兩岸關係變化，因此，將重點探討該時期內中國角色變化影響其對外行為的整理。這並不代表中國的歷史自我以及在這時期前的他者投射所建構出的中國角色沒有意義。相反，現在的角色正是建築在過去的角色之上。本節將借重張登及所提出，中國自 1982 年後的中國的「身分」與「地位」表現出的特色，<sup>9</sup>並加入角色理論的內涵，建構出中國六個時期角色的對外政策特性。又由於單談論兩岸關係可能造成對中國大陸角色行為的討論過於單薄，因此將找尋中國大陸與其他的周邊國家，不對稱關係交流的案例佐證。在中國周邊的大小政治實體案例中，與台灣條件類似，且實質分治的大小政治實體案例主要有二：越南與朝鮮。越南與朝鮮都與台灣相同，在中國大陸的歷史自我天下觀中有著複雜的主權歷史，也在近三十年間與中國大陸實踐不對稱關

<sup>7</sup> Brantly Womack, "China as a Normative Foreign Policy Actor." p.2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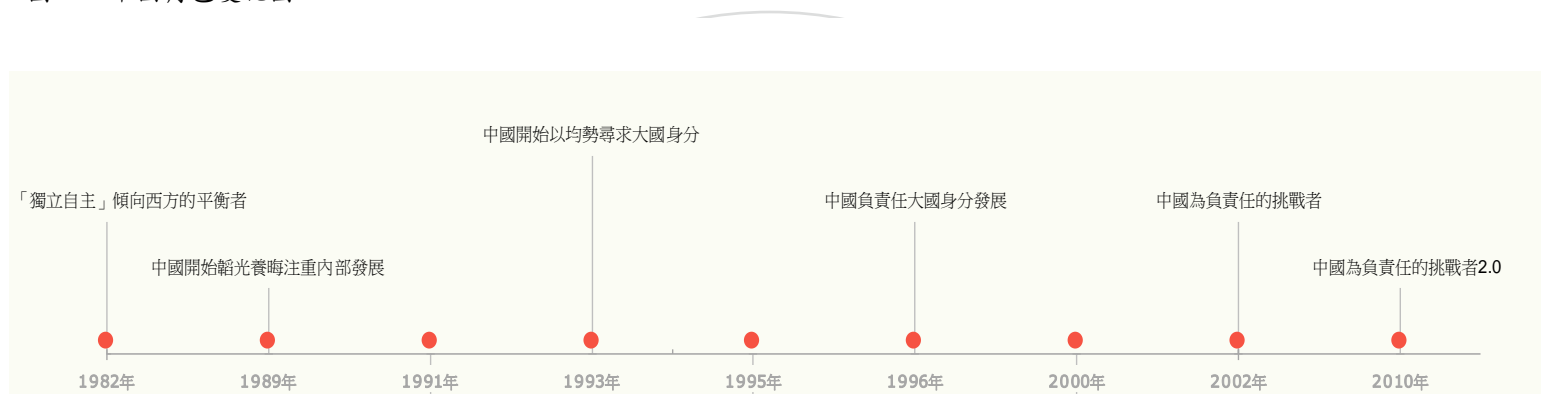
<sup>8</sup> Womack, Brantly. "China and Vietnam: The politics of Asymmetr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2006. pp.17-18.

<sup>9</sup> 張登及，「外交戰略與國際地位」，王振寰、湯京平、宋國誠，中國大陸暨兩岸關係研究，（新北市：巨流，2011 年），頁 422-449。



係時，有著大陸崛起的恐懼，以及與其交往紅利的誘惑。更重要的是，越南與朝鮮也與台灣相似，在對抗與扈從的光譜之間，尋找一個「穩定的不對稱關係」。當然，由於條件的不同因此並不奢求一體適用。然而，以中國大陸近三十年實踐越南以及朝鮮的大小政治實體雙邊關係，應當可以在兩岸關係研究中，對於中國自身的轉變有所啟示，進一步的對照兩岸關係內容時，更能解釋中國大陸在與台灣互動時，不同角色做出不同行為的解釋。

圖 3-1 中國角色變化圖



資料來源：作者自繪

上圖為本文第二章「中國大陸在國際場域的角色建構」中，整理出的中國大陸自 1982 年成為「獨立自主」傾向西方的平衡者開始的角色變化整理。由於本文欲以中國越南關係以及中國朝鮮關係作為兩岸關係的對照，因此將對比同時期的中國越南與中國朝鮮關係。本節先確立中國大陸 1982 年開始的角色，<sup>10</sup>並依序解釋角色建構內容以及可能的角色行為，到第二三節時再加入越南與朝鮮來討論。

布里茲涅夫在 1982 年提出在互相尊重的基礎上舉行會談，尋求兩個共產主義陣營大國之間的關係正常化，<sup>11</sup>中蘇關係和緩，中國處在冷戰後期很有利的位置。中國藉此當作籌碼，在美蘇兩國之間搖擺，並在十二大時宣布「獨立自主的

<sup>10</sup> 由於 1982 年至 1989 年為一個時期，因此欲從 1987 年開始探討兩岸關係中的中國大陸角色時，應當自 1982 年開始。

<sup>11</sup> 黎安有、施道安著，何大明譯，**尋求安全感的中國**，(新北市，左岸文化出版，2013)，頁 135-137。

和平外交」，成為「獨立自主」傾向西方的平衡者。<sup>12</sup>此時中國已不再像之前般與蘇聯競爭共產勢力的龍頭位置，對外政策擁有了彈性，開始與越南等國家和緩自 1979 年由於懲越戰爭造成的緊張關係。同時也藉由與西方世界交好，換取了「上海公報」有利於處理兩岸關係的中美公報。此時中國左右逢源，一方面在國際場域上發展獨立自主者的彈性，一方面在國內發展得到了巨量的成果。也在這段期間，中國較願意嘗試過去所沒有的行為與政策，表現出此時期中國角色的能動性。以兩岸關係為例，兩岸於 1987 年開放臺灣人前往大陸探親的舉措。縱然這樣的交流政策必須在雙方之間有供需時方可能發生，然而，若非中國大陸此時的角色發展在內外之間均有長足進步，自信進一步提升的背景下。兩岸之間何時方開始交流，仍未嘗可知。

1989 年，由於中國發生了「天安門事變」，受到西方主流世界關於人權的抨擊，與主流西方世界斷絕交往直到 1993 年。由於在國際場域被西方主流國家制裁，中國角色開始注重內部與周邊發展。在此階段中國回守周邊，致力於亞洲區域的周邊國家關係，如與越南、寮國、印尼、新加坡、汶萊以及南韓的關係正常化或建交，這些舉措在中國被西方主流世界封鎖時，增強了中國在亞洲區域的實力。

西方世界的封鎖持續到了 1993 年，中美之間直至 1993 年方恢復了接觸，因此張登及提出 1993 年到 1996 年中國的角色是「以均勢尋求大國身分」。<sup>13</sup>中國大陸在 1993 年後，面對到的是美國作為獨強的世界，雖然兩國已經改善了關係，但中國認為均勢的世界與多極化的理念方可確立中國成為大國的位置。因此這段時間內，中共主要與俄羅斯和歐洲等美國外的列強改善關係。中國在因為 1989 年六四天安門後的封鎖破冰後，重回到世界舞台，與西方國家建立雙邊關係。但是就此時的國際戰略結構而言，蘇聯的解體意味著聯中抗蘇的需求已不存在。中國此時的角色，作為大國的綜合實力已然成熟，正在尋求成為大國的身分，進一

<sup>12</sup> 張登及，「外交戰略與國際地位」，頁 430-431。

<sup>13</sup> 張登及，「外交戰略與國際地位」，頁 433-434。

步的兩者結合為大國角色，因此對自己是否被其他國家承認為大國抱有焦慮。在這段的摸索期間，中國渴望西方主流國家的承認與參加跨國組織發揮影響力。因此，這個階段的中國將主要目標放在與其他主流國家的交往與加入跨國組織，如 1994 年的「中俄聯合聲明」，中俄之間除了締結「平等信任面向 21 世紀的戰略協作夥伴」關係外，更在第四條中，俄羅斯明確的提到了中國的大國身分。<sup>14</sup>在這段期間，中國在追求「身分」上他者對自身大國的承認。

1996 年後，中國國力提升與香港的回歸都給予了中國自信，江澤民更在第二代領導人退出政壇後實質全面掌權，再加上中國的大國身分已然獲得滿足，中國將視野放到了國際傳統強權，開展高層互訪結交強權發展「大國外交」。其他國際行為者也承認中共「大國夥伴」的地位予以滿足，希望換取與中國在國際問題上的實質合作。此時期，中國的大國身分已然得到滿足，得到了更多的自信心，因此在處理與中國核心利益相關議題時，沒有了過去「寸土不讓、不和便戰」的零和賽局極端態勢，中國在這個時期積極加入或建立跨國組織，如 1996 年上海合作組織與 1996 年中國成為東協全面對話夥伴等等，同時也在 1999 年與美國達成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協議。

2002 年後，在胡錦濤時期的大國「和諧世界」外交下，中國的大國地位與身分經歷了多年的發展。綜合實力的大國「位置」與自我認知的大國「身份」，以及其他國際行為者對中國大國的承認，已然確立了中國的大國角色。中國希望自己能從「大國」的角色更往上一階。受到西方主流國家的影響，以及中國過往的區域領導者與區與保護者的角色認知，中國此時角色開始自許為「負責任的大國」，以及「負責任的挑戰者」。所謂的負責任代表了，中國的對外政策不能再完全以自身發展的需求出發，更應該顧慮到其他國家，甚至要維持亞洲區域的穩定平衡。與此同時，美國由於 911 恐怖攻擊，重心放到了中東，中美雙方在打擊恐怖主義的議題上取得了合作共識。同時，中國成為穩定東亞區域和平的主要力

---

<sup>14</sup> 「中俄聯合聲明」第四條內文：「互相視對方為在多極世界體系正在形成條件下維護和平與穩定的重要因素的大國」。

量。

2010年前後，美國意圖抽離中東戰爭的泥沼，也有鑑於中國在亞洲勢力的成長，在歐巴馬任期內美國開始提倡美國將「重返亞洲」，又稱「再平衡」策略。美國的「重返亞洲」再平衡攻勢，表現在美越、美韓、美日、美澳、美菲的關係加強，推動亞太經濟整合「跨太平洋夥伴關係（TPP）」的舉動。胡錦濤時期的大國「和諧世界」關係帶來了當時的外交成功，此時在美國積極介入亞太下需要新的論述。尤其是中國在朝鮮問題上的作為與不作為，使得鄰國質疑其區域穩定者的角色。又有遼寧號下水、南海建島爭議、機艦進入釣魚台水域爭奪管轄權的舉動，均重創了中國經營許久的負責任者「身份」，<sup>15</sup>造成周邊國家與中國的主權爭議。因此習近平強化鞏固周邊的「亞太夢想」，加強周邊國家政經合作與高層互訪，便是回應美國重返亞洲的理念，以及穩定周邊國家關係的舉措。

習近平在東協建設「命運共同體」主張、馬習會、蒙古的「搭便車」論，與出訪印度強調共創和諧的「亞洲世紀」等等作為，<sup>16</sup>均是補強中國作為負責任者的「身份」。「一帶一路」與「亞投行」更是中國意圖突破美國 APEC、ARF 乃至於 TPP 的政經包圍。因此，可以將美國重返亞洲後的中國角色，視為「中國為負責任的挑戰者 2.0」。與 2002-2010 年的「中國為負責任的挑戰者」相比，原有的角色的「負責任」內涵更多的是西方國家的期待，「中國為負責任的挑戰者」時期的中國角色內含主要為角色接收（role taker），中國接受他者對於自身的期待；反之，2010 年後的「中國為負責任的挑戰者 2.0」，更多的是中國主動給予的角色內涵，與原有的負責任挑戰者相比，2010 年後的中國角色內涵更多了角色創造（role maker）的內涵。中國透過自身發展的歷史自我以及一段時間的他者投射，重構了中國作為負責任的挑戰者所應當包含的內容，如中國價值的發散、東亞與東南亞區域未來的圖象等等。至少在中國周邊地區，中國已開始透過過去

<sup>15</sup> 張登及，「『再平衡』對美中關係之影響：一個理論與政策的分析」，遠景基金會季刊（台北市），第 14 卷第 2 期（2013 年 4 月），頁 71-72。

<sup>16</sup> 蔡東杰，「近期中國對亞洲外交政策及其影響」，全球政治評論（台中市），特集（2015），頁 17-30。



的經貿實力輸出，配合現今的價值觀輸出，意圖擴大自身在亞太的話語權。

本研究認為，中國在一定時間內的角色建構將會影響中國的角色行為。而角色建構並非一蹴可及，必須有客觀綜合實力的「位置」以及對自我認知的「身分」兩者相結合，再搭配他者投射的影響，方能形塑出角色。在本研究的觀察中，中國的「位置」較多先行於「身分」，當兩者並行並被其他行為者所承認時，方再追求下一個角色。舉例而言，中國在 1993 年至 1996 年，綜合實力的「位置」不可稱為不強，然此時中國仍在「身分」上追求他者對中國的大國承認，如積極的與其他國家互訪以及加入國際組織，期望取得一定的勢力。在這段期間內，若他者對於中國作為大國的「身分」做出挑戰，如李登輝總統訪美，中國會有急迫證明自己為大國的「身分」需求，甚至不會顧及區域穩定；反之，當其他國家承認中國的大國「身分」，並給予尊重。中國一方面將樂意的透過雙邊貿易或引進投資，將中國的經濟成長紅利分享給他者，另一方面也將此認知，回饋到中國的「身分」內涵，確立為角色。

## 第二節 大小政治實體下的中國—越南關係與中國的角色

中國自改革開放後，整體國力快速的提升。此時中國已不再自詡自身角色為「反帝國主義者」，而是作為最大的「發展中國家」，透過這種認知以拉攏廣大的發展中國家，希望成為其楷模。由於中國的「不干涉主義」<sup>17</sup>提供無償的支援，發展中國家僅需要承認「一個中國原則」，並不需要改變自身政體就可以獲得中國的支援，因此和西方國家要求民主體治方支援的邏輯下，發展中國家對於中國援助的接受意願較高。這種不帶前提的援助政策，除了可以藉此消除中國威脅論，獲得發展中國家的支持，也可以取決於被援助國的天然資源多寡。而調整援助多

---

<sup>17</sup> 除了南蘇丹個案。中國在南蘇丹中的不干涉主義在聯合國受到廣泛批評，因次中國在南蘇丹個案中違背了原有的不干涉原則。不干涉與人道救助之間的拉扯，體現在當時中國的選擇。

寡，更可以讓中國確保天然資源的取得。<sup>18</sup>透過這種方式，中國在非洲取得了相當的友誼，提高了中國在國際的籌碼，與過去第三世界領導者的中國角色，隔著時空相互呼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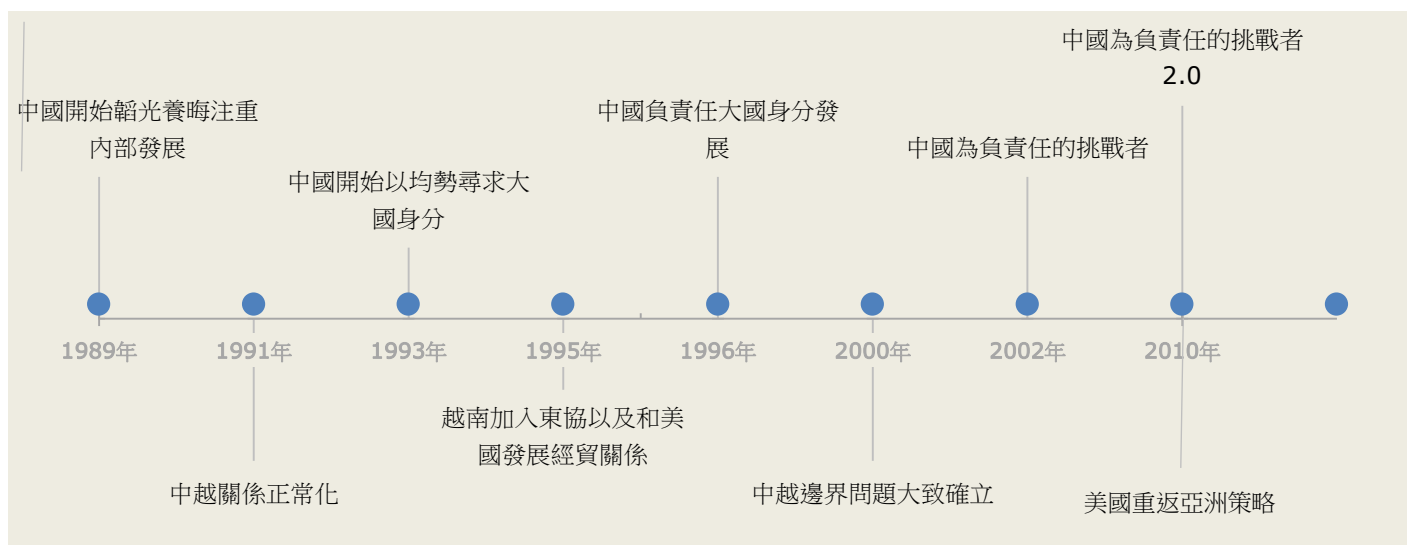
然而，由於地緣政治的因素，看似互利共生的中國與非洲小國的扈從樣板，並不能表現在中國周邊的小國中。非洲與拉丁美洲的小國與中國合作，並沒有鄰近中國的壓力。以中國的角度出發，睦鄰外交創造共榮與周邊環境的穩定安全為中國發展的核心利益。但是周邊國家的爭議如南北韓、印巴衝突與阿富汗內戰等等，對於中國營造有利經濟發展的周邊環境造成阻礙。<sup>19</sup>而當中國成為周邊國家主權議題的當事人時，睦鄰外交不見得可以發揮作用；以小國的角度出發，中國一共與 14 個國家相鄰，與 6 個國家共有著海洋。當領土主權爭議上升為兩國不能忽視的議題時，睦鄰外交將會被中國威脅論取代。一個經濟強盛的中國可能是小國所想結交的大國，但是一個軍事實力強盛的中國，將周邊小國壟罩在中國軍事實力的投射下，會引起小國的威脅感。這也造成中國周邊小國，選擇不完全扈從中國。在大小政治實體理論中，小國面對大國的意志時，採取的策略將為扈從—避險—抗衡光譜中的其中一點。如何取捨端看小國對大國的初始認知，並在雙方互動後以及小國自身的需求做出調整。在一段時間的大小政治實體互動過程中，沒有一定的對抗或順從，而應當是在這兩個極端之間尋找一個平衡點，進而達成一個理想中的「穩定不對稱關係」。

---

<sup>18</sup> 游智偉、張登及，「中國的非洲政策：軟實力與朝貢體系的分析」，遠景基金會季刊（台北市）第 12 卷第 4 期（2011 年 10 月），頁 131。

<sup>19</sup> 河凡植，「中國對朝鮮半島地緣經濟戰略與其對中國南北韓關係之影響」，中國大陸研究（台北市），第 55 卷第 1 期（民國 101 年 3 月），頁 42。

圖 3-2 中越關係時間圖



資料來源：作者自繪

上圖為中國的角色時間軸以及中越關係重要時間點的結合，我們可以藉此圖表大致對照中國角色發展以及中越關係的變化。中越關係之所以重要，首先在於雙方過去複雜的歷史。中越之間原本共屬於共產黨集團的「唇齒關係」，中國更在過去越南反抗法國殖民時投注了大量的心力與人力幫助越南對抗殖民者。因此，越南在中國政府心中有著特殊性。然而，越南在 1970 年代中蘇決裂後慢慢傾向蘇聯一方，更在蘇聯的援助下進攻柬埔寨。中國遂與越南翻臉，雙方進入戰爭狀態，直至 1991 年方關係正常化。有鑑於此，越南作為中國的周邊他者，對中國自身的角色形塑有的重要的影響力，特別在於區與穩定者和區域領導人的角色內涵。其次，越南在實踐與中國大陸的不對稱關係中，有著與中國陸上與海上主權的爭議，這很大部分的影響到了雙方交流中的「核心權益」。觀察中國與越南兩國，如何在不同的認知當中，協調出一個雙方可以接受的不對稱關係，對於研究中國作為大政治實體的不對稱關係有顯著意義。最後，綜合以上兩點，透過不同時期的中越關係分析，更加了解中國自身角色建構的過程，以及中國在大小政治實體理論中的角色行為內涵。

#### 壹、中國開始輒光養晦注重內部發展時期 1989-1993

由於在此時期之前，中越之間尚在戰爭，因此並不符合大小政治實體理論中，

雙方欲共同建造一個穩定的不對稱關係內涵。所以本文在中越關係中，以兩造之間的關鍵轉折點 1991 年的「中越關係正常化」作為起始。自此之後，中越之間的不對稱關係實踐方有意義。1989-1993 年時期的中國角色，由於受到西方世界的封鎖，在這樣的限制下，中國的目光由積極拓展西方世界放眼到了周邊國家。這個時期發生的中越關係的正常化，正受到了中國韜光養晦注重內部發展的角色影響。中越之間原本是「唇齒關係」，越南在對抗法國與美國時，中國均提供了越南軍事和經濟的援助。在 1970 年代後期，中越關係在中蘇關係的破裂與越南選擇更往蘇聯靠攏而惡化。後又因為越南入侵中國所支持的柬埔寨赤柬政權，以及中越之間的邊境衝突與南海的主權爭議，鄧小平在中國改革開放初期，發動了「懲越戰爭」，造成了雙方關係嚴重惡化。中國在 1982 年後成為了傾向西方的平衡者，與蘇聯關係有所好轉，但仍未完全體現在中越關係上，雙方在邊界上仍有零星衝突雙方直至 1991 年 11 月，時任總書記江澤民與總理李鵬接見越共中央總書記杜梅、部長會議主席武文傑的訪華團，雙方發表了「中越聯合公報」與「中越貿易協定」，兩黨兩國關係實現正常化。<sup>20</sup>

綜觀此時的中國角色，由於在國際場域很難有所作為，因此韜光養晦，專心於處理中國內部以及周邊國家關係，創造一個有助於中國日後發展的環境。由於此時越南是唯一一個與中國國土接壤且仍未關係正常化的國家，因此，中越關係正常化就是中國此時角色實踐的重要個案。中國這個階段積極處理中國與東南亞國家的關係，這段期間建交或關係正常化的國家分別有寮國(1989)、印尼(1990)、新加坡(1990)、汶萊(1991)、越南(1991)、南韓(1992)六國。<sup>21</sup>對於周邊環境的改善不遺餘力，為日後的中國周邊發展耕耘好土壤。這時期中國周邊小國對於中國的他者投射，主要內涵在於加強中國區域領導人的角色，慢慢演變出亞洲強權的背景。至此時期，中國與周邊國家的關係基本上全部實現正常化，多個

---

<sup>20</sup> 中國同越南的關係，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網站，2016 年 12 月。檢索日期：2017 年 12 月 12 日

<[http://www.fmprc.gov.cn/web/gjhdq\\_676201/gj\\_676203/yz\\_676205/1206\\_677292/sbgx\\_677296/](http://www.fmprc.gov.cn/web/gjhdq_676201/gj_676203/yz_676205/1206_677292/sbgx_677296/)>

<sup>21</sup> Womack, Brantly, “China and Vietnam: The politics of Asymmetry.”, p.220



雙邊關係進一步深化，成為亞洲區域整合的重要行為者，甚至在日後有著區域領導人的態勢。

## 貳、中國開始以均勢尋求大國身分時期 1993-1996

在西方結束對中國的制裁後，中國重新進入了世界，並積極的尋求大國的身分。此時的中越之間經貿穩定發展，但仍然有主權與邊界問題的隱憂。由於過去戰爭以及尚未處理的主權爭議，此時中越之間的大對小與小對大關係，仍不能完全互信。在尚未處理雙方核心利益問題前，「擱置爭議、共同開發」的效果依然有限。Womack 認為，雙方關係正常化（Normalization）是一個過程，要達到雙邊關係正常（Normalcy）需要時間。<sup>22</sup>中越雙方在 1991 年開始時，僅是正常化過程的開端。雙邊關係的正常，需要建立在雙方都有自信自己的核心利益將不會受到對方挑戰，而彼此的歧異可以協商。Womack 認為中越之間直到 1999 年方達到了關係正常的階段。<sup>23</sup>除此之外，越南在 1995 年加入了東協組織以及與美國建交，中國也在 1996 年成為了東協的戰略對話夥伴，雙方均試圖融入中南半島的整合。

對中國而言，與東南亞國家交好處理好周邊國家議題，是一個大國身分所應該處理的事務。在這個階段，中國透過經濟貿易以及提供物資或是金錢上的援助，以幫助東南亞國家開展開發建設。但與此同時，也發生了 1995 年中菲衝突的南海美濟礁事件。此事件可以看出，這個時期的中國大國角色正在建構，在地位上中國已然成為大國，周邊小國急欲與中國在經濟議題上合作，得到實質的經濟利益。但是在身分上，中國仍然得不到周邊小對大關係的信任。中國在領土主權爭議上的處理方式，仍然有更細緻的操作空間。因此，在此時的中越不對稱關係實踐中，越南對於中國的交往仍然沒有完全信任。除了與中國交流之餘，也積極加入東協區域組織，更與美國建交。中越之間對於彼此的觀點仍在調整，雙方仍有領土主權的爭議，嚴格而言並不能算是一個穩定的不對稱關係。因此，中越關係

<sup>22</sup> Womack, Brantly, "China and Vietnam: The politics of Asymmetry.", p. 28

<sup>23</sup> Womack, Brantly, "China and Vietnam: The politics of Asymmetry.", p. 28

在此時仍有改善空間。但是，這都是下一時期中越關係進一步改善的背景，若沒有這段期間中越對彼此觀點的調整過程，就不會有雙方關係進一步的可能性。

#### 參、中國負責任大國身分發展時期 1996-2001

中國在 1996 年後，整體國力與其他行為者對中國成為大國的需求已然成形。由於中國的大國身分得到滿足，擁有了更多的自信心，因此在處理與中國核心利益相關議題時，沒有了過去零和賽局的極端態勢，與周邊小國的大對小關係，更有了泱泱大國的格局，歷史自我中對周邊小國的朝貢體系態度，方展現了出來。Womack 認為，中越關係正常化始於 1991 年，但是雙方真正成為正常關係則要到 1999 年<sup>24</sup>。在 1999 年，時任越共中央總書記黎可漂至北京與時任中共總書記江澤民會面，提出了中越之間未來的關係「長期穩定，面向未來，睦鄰友好，全面合作」十六字方針，<sup>25</sup>雙方也在同年簽署了「中越陸地邊界條約」，促成了日後中越邊界完全法制化的結果。張登及與陳瑩義認為，雖然西方媒體普遍認為此一條約為越南的讓步，但是考量到日後中國政經實力的增強，再拖下去情勢會對北京越來越有利，雙方選擇在這個時間點簽訂條約，可以視為中國做出寬讓。此外，雙方均在北部灣的做出讓步，且中國讓步更大。<sup>26</sup>由此可知，中國負責任大國角色發展時期，對於相關領土主權爭議較之過去已較具彈性。但是，在情勢複雜多重主權的南海主權爭議上，這段期間內中國並無明顯作為。

在此可以得出，此時期的中國仍然不善於處理多邊關係。黃瓊菽認為，這必須從關係平衡（Balance of Relationship）的觀點入手。中國的關係認知主要是雙邊關係的維繫與穩定，在必要時，也可以放棄立即而顯著的利益，包含領土、安全與經濟利益等。<sup>27</sup>但是，隨著中國持續的成長，面對到的狀況必然不同於歷史自我中朝貢體系的各種雙邊關係。在沒有一個如美國「外擴型的單一行為準則」道德輸出下，中國的對外關係不會造成明顯的敵人，但也很難在現實中千絲萬縷

<sup>24</sup> Womack, Brantly, "China and Vietnam: The politics of Asymmetry.", p. 223

<sup>25</sup> Womack, Brantly, "China and Vietnam: The politics of Asymmetry.", p. 223

<sup>26</sup> 張登及、陳瑩義，「朝貢體系再現與『天下體系』的興起？中國外交的案例研究與理論反思」，中國大陸研究第（台北市），55 卷第 4 期（民國 101 年 12 月），頁 102-103

<sup>27</sup> 黃瓊菽，「關係平衡 v.s. 普世改造：中美國際干預風格與大戰略思維之比較」，頁 78。

的國際關係有著穩定的行為預測性，更會面對到多邊關係時的中國行為不確定。回首中越關係，中國仍然在擴充「負責任大國」的角色內涵。在雙邊關係中，中越關係升溫；在多邊關係中，如何處理南海議題，是中越雙邊關係中面對到的隱憂。

自 1999 年開始，中越之間沒有了陸地領土的爭議，且在交流中逐漸建立互信，彼此經貿往來增加與高層穩定互訪。就雙邊關係而言，兩國正式進入了穩定的不對稱關係中。

#### 肆、中國為負責任挑戰者時期 2002-2010

中國在 2002 年，進入了胡錦濤時期。在胡錦濤時期的大國「和諧世界」外交下，中國的大國地位與身分經歷了多年的發展，中國希望自己能從「大國」的角色更往上一階。中國在前一個階段，「大國」的角色到了確立，開始自詡為「負責任的大國」，甚至是「負責任的挑戰者」。在美國發生 911 攻擊後，中美雙方在打擊恐怖攻擊議題上，找到新的合作場域。中國在此時也肩負了反制恐怖攻擊的責任，成為國際場域中負責任的挑戰者。

在此時期，中國同南海各國簽署「南海各方行為準則」，呼籲各自宣稱南海主權國的各聲索國克制彼此，在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前提下，探討建立信任的途徑。<sup>28</sup>在此時期，胡錦濤的「睦鄰政策」以「睦鄰、安鄰、富鄰」為主軸，加強中國與周邊國家的關係。與此同時，2002 年 11 月，在第六次中國—東協領導人會議上，時任中國國務院總理朱鎔基和東協 10 個成員國的領導人共同簽署了「中國—東協全面經濟合作框架協議」，決定到 2010 年建成中國—東協自由貿易區。<sup>29</sup>在這段時期內，中國對越南的政策大抵上沒有很明顯的變化。雙方均延續著過去交流的結果，以及東南亞區域整合的成果，將中國與東協的關係透過協議與宣言的方式，制度化的進行深化，直至 2009 年前後。

<sup>28</sup> 南海各方行為宣言，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網站，2002 年 12 月 4 日。檢索日期：2017 年 12 月 12 日。

<<http://www.mfa.gov.cn/nanhai/chn/zcfg/t4553.htm>>

<sup>29</sup> 「中國—東協全面經濟合作框架協議」，中華人民共和國海關總署網站，2010 年 9 月 7 日。

<<http://www.customs.gov.cn/customs/302249/302310/302311/302312/302319/394883/index.html>>

## 伍、中國為負責任挑戰者 2.0 時期 2010 至今

歐巴馬上任總統後，婉轉的依循布希政府時期的脈絡，在 2009 年提出了「戰略保證」；以及時任國務卿的希拉蕊表達了美國重返亞洲的再平衡戰略構想。中國過去「負責任的挑戰者」角色受到了美國勢力重回亞洲的影響，做出了與過往路徑不同的改變。其實中國的角色行為在這段時間前就已經受到了影響，具體表現在中國的海洋戰略上。在 2009 年以前，中國在南海的行為相對克制與被動；2009 年後，將南海主權上升到了國家「核心利益」。<sup>30</sup>自此後，中國積極的宣示南海主權，填礁造島、漁船駛入爭議海域等等。希拉蕊對此回應：美國一再表示樂見中國和平崛起與經濟繁榮，「但同時，美國期待中國成為國際社會中負責任的一員，希望中國依照其實力、地位行事，並應符合國際規則」。<sup>31</sup>越南也受到中國海權擴張的影響，雙方在南海主權上衝突。2011 年，越南外交部致函中國駐河內大使館，要求中方停止侵犯越南大陸架和專屬經濟區主權的一切行為並賠償越方的損失。<sup>32</sup>有趣的是，中越之間的領土主權爭議，也在中越建交 60 周年的 2010 年，雙方簽訂協定後完全結束。綜觀此時中國與越南的相關政策，可以再次印證關係平衡的觀點，中國的關係認知主要是雙邊關係的維繫與穩定，至於牽涉多的國家的南海問題，仍然處於希望各方自制的「宣言」程度。更嚴重的是，中國將南海問題上升到核心利益層次，伴隨著中國的填礁造島與海軍實力的發展。胡錦濤更在 2012 年中共十八大政治報告中，提出要「堅決維護國家海洋權益，

---

<sup>30</sup> 中國首次向美國表態：南海是中國核心利益，多維新聞網，2010 年 7 月 4 日。檢索日期：2017 年 12 月 12 日。

<<http://news.dwnews.com/global/big5/news/2010-07-04/56163054.html>>

<sup>31</sup> 中國視南海為核心利益 美嚴拒，中時電子報，2010 年 11 月 10 日。檢索日期：2017 年 12 月 12 日。

<<https://tw.news.yahoo.com/%E4%B8%AD%E5%9C%8B%E8%A6%96%E5%8D%97%E6%B5%B7%E7%82%BA%E6%A0%B8%E5%BF%83%E5%88%A9%E7%9B%8A-%E7%BE%8E%E5%9A%B4%E6%8B%92.html>>

<sup>32</sup> 要求中國停止侵犯越南主權的行為，越南社會主義中央政府門戶網站，2011 年 5 月 28 日。檢索日期：2017 年 12 月 12 日。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10823131431/http://cn.news.gov.vn/Home/%E8%A6%81%E6%B1%82%E4%B8%AD%E5%9B%BD%E5%81%9C%E6%AD%A2%E4%BE%B5%E7%8A%AF%E8%B6%8A%E5%8D%97%E4%B8%BB%E6%9D%83%E7%9A%84%E8%A1%8C%E4%B8%BA/20115/3404.vgp>>



建設海洋強國」。<sup>33</sup>這無疑的讓越南等南海相關國家，懷疑中國在南海爭議上，是否有和善解決的誠意。

習近平上台後，表現出了強勢的作為。習近平的強勢個人特質，豐富了中國為負責任挑戰者 2.0 角色內涵。習近平透過對黨的改革、軍隊改革以及反貪肅腐等作為，成為了強勢權力集中的領導人。中國在習近平時期，更勇於主動出擊周邊，且不畏於犧牲部分現今利益換取雙邊關係的維繫與穩定。面對美國重返亞洲的外部因素，習近平在 2015 年與 2017 年兩次以國家最高領袖的身分出訪越南，雖然中方一級首長（國家主席、總書記、總理等）自 1991 年至 2010 年出訪越南 12 次<sup>34</sup>，但是在中國最高領袖在習近平兩次出訪前，已有九年沒有正式出訪越南。以中國的角度而言，雖然中越之間經濟互賴增高，但由於越中貿易始終是入超，且與日本、美國、新加坡、南韓等國的貿易量上漲。再加上越南近年積極與印度、俄羅斯等大國建立關係，更透過與大國的合作增強自身的軍事武裝力量，以及越南的排華意識興起，中國有必要進一步穩定越南局勢。

除了高層互訪外，中國也端出了回應美國積極重返亞太建立 TPP 的回應，也就是一帶一路與亞投行。一帶一路與亞投行可以視為中國面對到美國挑戰時，所提出的鞏固亞洲作為。根據「一帶一路」計劃，中國將在南亞及東南亞各地投資興建高鐵、公路、管道及港口，藉此振興當地經濟。也由於越南的處中國一帶一路的南進窗口，因而被視為推動「一帶一路」發展的重點國家之一。<sup>35</sup>然而，在 2016 年海牙仲裁案後，雙方敏感的南海爭議問題，仍懸而未解。

---

<sup>33</sup> 胡錦濤在中國共產黨第十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人民網網站](http://www.people.com.cn/n/2012/1118/c64094-19612151-8.html)，2012 年 12 月 8 號。檢索日期：2017 年 12 月 15 日。

<<http://cpc.people.com.cn/n/2012/1118/c64094-19612151-8.htm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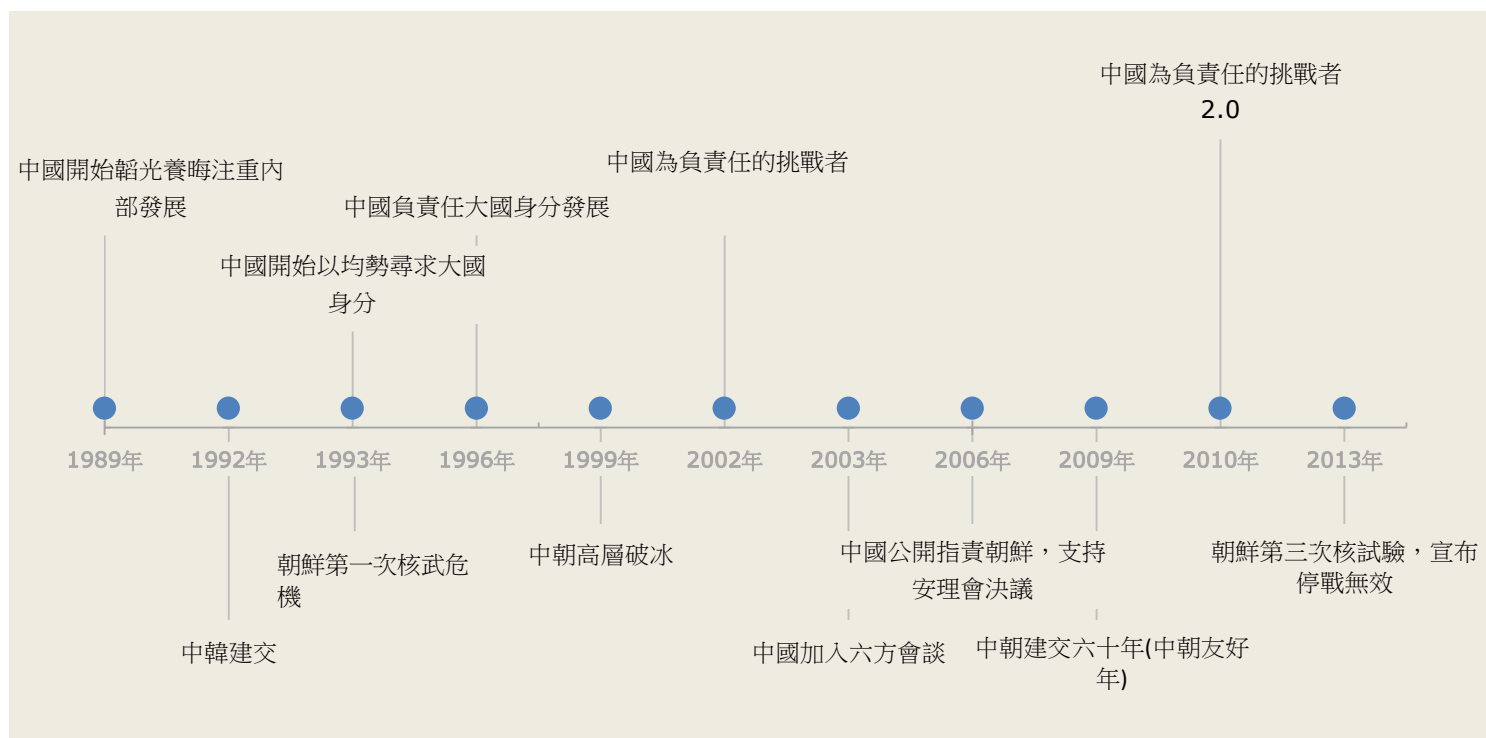
<sup>34</sup> 張登及、陳登義，「朝貢體系再現與『天下體系』的興起？中國外交的案例研究與理論反思」，頁 103

<sup>35</sup> 中國與越南積極展開「一帶一路」基建項目，[香港貿易發展局網站](http://economists-pick-research.hktdc.com/business-news/article/%E5%9C%8B%E9%9A%9B%E5%B8%82%E5%A0%B4%E7%B0%A1%E8%A8%8A/%E4%B8%AD%E5%9C%8B%E8%88%87%E8%B6%8A%E5%8D%97%E7%A9%8D%E6%A5%B5%E5%B1%95%E9%96%8B-%E4%B8%80%E5%B8%B6%E4%B8%80%E8%B7%AF-%E5%9F%BA%E5%BB%BA%E9%A0%85%E7%9B%AE/imm/tc/1/1X000000/1X0A9HQV.htm)，2017 年 4 月 13 日。檢索日期：2017 年 12 月 15 日。

<<http://economists-pick-research.hktdc.com/business-news/article/%E5%9C%8B%E9%9A%9B%E5%B8%82%E5%A0%B4%E7%B0%A1%E8%A8%8A/%E4%B8%AD%E5%9C%8B%E8%88%87%E8%B6%8A%E5%8D%97%E7%A9%8D%E6%A5%B5%E5%B1%95%E9%96%8B-%E4%B8%80%E5%B8%B6%E4%B8%80%E8%B7%AF-%E5%9F%BA%E5%BB%BA%E9%A0%85%E7%9B%AE/imm/tc/1/1X000000/1X0A9HQV.htm>>

### 第三節 大小政治實體下的中國—朝鮮關係與中國的角色

圖 3-3 中朝關係時間表



資料來源：作者自繪

自 1989 年開始，中越關係的有起有伏，與之相比，中朝關係更像是由高處向下的滑落。中朝關係與中越關係同樣歷史悠久，在中國歷史的朝貢體系中，朝鮮半島也一直都是重要的參與者。中共建政後，也在國力低盪時期出兵朝鮮幫助金日成抵禦了韓戰中後期美國的逼近，促成了南北韓的停戰。直至中國改革開放，朝鮮一直都是中國在東北亞最重要的小兄弟。與越南情況類似，中越與中朝雙方共有豐富的歷史情感、同源的意識形態。這使得中朝與中越之間，自中共建政後，始終是站在中國這一方。然而，中國與這兩個「唇齒關係」的小兄弟關係發展，在上世紀八零年代出現了分野。越南雖然在中蘇決裂後，更靠近了蘇聯陣營，但是在八零年代選擇了與中國類似的改革開放策略。朝鮮則是堅持社會主義的經濟發展路線，成為世上少數至今仍使用計劃經濟的國家。以中國的角度而言，中朝關係從「鮮血凝結的友誼」，到制裁朝鮮，中間經歷了中國的角色變化以及朝鮮所給予的他者投射。本章節將探討大小政治實體下的中國—朝鮮關係以及中國的

角色變化。

#### 壹、中國開始韜光養晦注重內部發展時期 1989-1993

沈志華認為，毛澤東時期的中國有著傳統中央大國的統治者心態，對周遭的小國都要寬容並給予保護；又有一種社會主義領導者的心態，對亞洲社會主義國家有義務給予幫助。所以改革開放前的中國，給予了朝鮮很多的經濟援助。<sup>36</sup>在毛澤東逝世後，中國開始了改革開放，由於不同的經濟發展道路，以及中美關係的好轉，中朝之間的關係不再像過去緊密。中國在 1989 年因為六四天安門事變的鎮壓群眾，受到西方主流世界的封鎖，目光由積極拓展西方世界放眼到了周邊國家。由於中國的經濟發展、地緣政治的需求、周邊國家關係的拓展需要以及冷戰結束後的國際格局，中國開始與南韓改善了關係，並在 1992 年建交。朝鮮自然不願見此，據錢其琛『外交十記』的內容回憶，「金主席看了看我們帶來的禮品，九龍戲珠玉雕和新鮮荔枝就送客告別了，在我的記憶中這次會見是金主席歷次會見中國代表團中時間最短的，會見後也沒有按過去的慣例舉行宴會招待。」

37

此後中朝之間雖然仍有經貿往來，但斷絕了高層的互訪直至 1999 年，朝鮮更於 1993 年違背了僅簽屬一年多的「關於半島無核化協議」，開始了核子武器的研發。以朝鮮的角度而言，中國給予的他者投射非常不友善。首先，中國自己率先拋棄了社會主義的生產道路。其次，中國開始往西方世界靠攏，並在與西方世界的接觸中得到好處。最後，是中國與南韓建交。以朝鮮的角度而言，中國先背棄了共產主義生產方式，然後與美國帝國主義關係改善甚至建交，甚至與南韓建交拋棄自己轉而支持敵人。這造成了中朝之間的低盪以及朝鮮發展核武力圖成為軍事強權增加話語權。以中國的角度而言，不遵守教條式的共產主義追求自身的發展才是強國大業。在改革開放過後，融入世界體系對中國而言已是必然，特別

<sup>36</sup> 沈志華，「『唇齒相依』還是『政治聯姻』？—中朝同盟的建立及其延續（1946-1961）」，近代史研究所集刊（台北市），第 63 期（民國 98 年 3 月），頁 188-189。

<sup>37</sup> 中韓建交後，金日成沉思後說了一句話，鳳凰衛視新聞網，2012 年 9 月 24 日，檢索日期：2017 年 12 月 16 日。

<[http://phtv.ifeng.com/program/zmdfs/detail\\_2012\\_09/24/17852739\\_0.shtml](http://phtv.ifeng.com/program/zmdfs/detail_2012_09/24/17852739_0.shtml)>

是周邊國家關係的改善。在 1989 年被西方封鎖後，耕耘亞洲建立區域的穩定，則不能將重要的經濟體南韓排除在外。因此，對於朝鮮的他者投射，中國應當是認為遺憾但是可以理解。所以，在這個時期及其後的中韓關係，雖然高層之間冷凍，但中國仍在雙邊交流中援助朝鮮。

## 貳、中國開始以均勢尋求大國身分時期 1993-1996

在這段期間內，中國與朝鮮仍在中國與南韓建交後的低盪，並沒有官方的高層互訪，僅剩下經貿的關係。西方此時結束了對中國的制裁，中國重新進入了世界，並積極的尋求大國的身分。與此同時，中國大國的身分正在確立，在國際情勢中也得到了成功，更在此一階段認真經營了東南亞與東北亞的關係。然而，朝鮮並不在中國追尋大國身分的藍圖當中。雙方延續了冷和的情勢，直到 1999 年。

## 參、中國負責任大國身分發展時期 1996-2001

1999 年，朝鮮在中韓建交後，首次派遣官員訪華，雙邊打破過去由政府高層冷和局面。2000 年六月，北韓領導人金正日訪問中國，與上次北韓領導人訪問中國時隔 11 年。雙方恢復了領導人互訪與領導人會談，中國藉此向北韓提出希望可以改善南北韓關係。藉此，中國向世界表現出了自身對北韓的影響力，<sup>38</sup> 回應了中國是負責任大國的角色建構。

## 肆、中國為負責任挑戰者時期 2002-2010

經歷 911 恐怖攻擊後，美國將與中國崛起的矛盾淡化，尋求共同解決恐怖攻擊。當中，小布希總統 2002 年將伊朗、伊拉克與朝鮮並列為資助恐怖份子的「邪惡軸心」，並且指責朝鮮透過壓榨自己的平民，進而裝備大量武器危害世界。<sup>39</sup> 無獨有偶的，美國發現朝鮮仍在進行核試驗，更在 2006 年進行了第一次核試爆。這個時期，在中國的遊說下，朝鮮同意與美國和中國進行三方會談，乃至之後增

---

<sup>38</sup> 河凡植，「中國對朝鮮半島地緣經濟戰略與其對中國南北韓關係之影響」，頁 52。

<sup>39</sup> 原文為：Some of these regimes have been pretty quiet since September the 11th. But we know their true nature. North Korea is a regime arming with missiles and weapons of mass destruction, while starving its citizens. 來源為 President Delivers State of the Union Address，美國白宮網站，2002 年 1 月。檢索日期：2017 年 12 月 18 日。  
<<https://georgewbush-whitehouse.archives.gov/news/releases/2002/01/20020129-11.html>>



加了南韓、日本與俄羅斯的六方會談。雙方一共自 2003 年至 2007 年舉行了六輪會談，然在朝鮮於 2009 年宣布退出六方會談後已不再有成果。

在這段期間，中國作為負責任的挑戰者，希望自身可以發揮大國的影響力，所以在促使朝鮮與國際對話時不遺餘力。此外，2000 年至 2008 年，中朝之間的貿易額成長了六倍，朝鮮主要經濟來源是向中國出口礦物產業。朝鮮對中國有著依賴，中國也希望藉由幫助朝鮮與世界接軌以符合自身負責任挑戰者的形象，更希望維持東北亞局勢的和平，幫助中國自身東北產業，以及與日本、南韓與美國的東北亞博弈。然而，在中國鄰近研發核子武器，並不是中國所樂見，且若南北韓戰事再起，更不利於中國自身的發展。此時中國角色的行為，受到了自身歷史自我以及這段期間的角色影響。首先，朝鮮是中共建政後的忠實盟友，基於意識形態與歷史淵源，中國並不希望朝鮮被西方世界主流價值消滅。其次，朝鮮的存在可以讓中國的東北亞局勢更有籌碼，並且維持既有的情勢。若朝鮮真的被消滅，中國將會面對到一個統一的韓國，以及可能大量跨境入中國的朝鮮政治難民，這對中國日後的發展可能不利。再者，朝鮮的存在是中國在東北亞勢力的屏障，可以想見若朝鮮被統一，中國原有的東北地區與朝鮮合作的產業鏈，將要做出調整。且中國將直接面對親美的韓國勢力與中國的國土接壤，甚至是日本右派勢力崛起的可能危機。最後，朝鮮半島無核化是中國的核心利益，若有朝鮮徹底放棄核子武器發展可能，中國自然樂觀其成。但是，中國也不會與西方世界解採取完全相同的標準，徹底的孤立朝鮮。若進一步將朝鮮推擠到「邊緣策略」的極致，將無法預測朝鮮的反應。因此，此時的中國積極協助朝鮮與西方對話，並且在聯合國安理會投票時贊同對朝鮮的制裁。但是，中國並不完全孤立朝鮮，依然與朝鮮共同慶祝建交六十年（中朝友好年），與朝鮮的關係有和有僵。

#### 伍、中國為負責任挑戰者 2.0 時期 2010 至今

2011 年 5 月，金正日訪中，希望謀求中國領導班子對金正恩接班的承認與

支持，顯露了當時北韓政權需要中國的政治支持，以維持自身的政治安定。<sup>40</sup>可見得中國在朝鮮的心中，仍是朝鮮所相信且倚重的強大盟友。中國此時面對到美國重返亞洲在平衡攻勢，開啟了一系列的防守反擊。一方面加強中國在亞洲區域的經濟發展；另一方面強化自身軍事硬實力。然而，中朝關係並沒有在中國此時的規劃藍圖當中。

Lampton 在論及中國—朝鮮關係中寫到，唯有北朝鮮的國際行為影響到中國的國際利益時，中國才會對其施加壓力，但又不希望這壓力大到造成不安定、並波及中國。<sup>41</sup>金正恩上台後，一連試爆了四次核武器，甚至宣稱 2017 的核子試爆是氫彈，並且與俄羅斯關係日益密切。這一再地違背了中國希望朝鮮半島無核化的意念以及自己身為區域穩定者的角色。所以近日對於朝鮮的經濟制裁越發收緊，不但將中國境內的朝鮮企業關閉，<sup>42</sup>也下達了朝鮮出口中國的禁令。本文認為，2002 年至 2010 年的中國「負責任挑戰者」，更多的是為了符合主流世界所給予的內涵。中國為負責任的挑戰者 2.0 與前期最大的不同，在於中國將「負責任」的詮釋權收回，主動創造中國應當如何才是負責任的。在過去這個脈絡中，中國過去介入朝鮮半島的方式，較為被動。多是透過自身對朝鮮的影響力，將朝鮮請上談判桌，而對於金氏政權的作為，比較少有主動的制裁行為。到了 2010 年後，中國自己的「負責任」概念開始形塑，中國更主動的對朝鮮制裁。這樣的對朝鮮政策，可以看出中國的角色形塑確實在近年出現了改變，更多的表現出「區域領導人」、「區域穩定者」等自己的角色價值觀出發，對其他行為者發揮影響力。

以大小政治實體理論綜觀中朝關係，可以發現中國與朝鮮雙方的觀點截然不同。中國作為亞洲區域穩定者與區域領導人，自然希望與自己關係密切的朝鮮可以遵從自己的意志，不危害區域穩定。朝鮮作為被主流世界邊緣化的國家，不但希望中國忠實的站在自己這邊，且想要擁有更多的話語權。這樣的觀點差異，表

<sup>40</sup> 河凡植，「中國對朝鮮半島地緣經濟戰略與其對中國南北韓關係之影響」，頁 53。

<sup>41</sup> David M. Lampton 著，林添貴譯，*從鄧小平到習近平*，(台北市：遠流，2015)，頁 145。

<sup>42</sup> 中國對朝鮮再施壓，要求境內朝企業明年 1 月前關閉，*BBC 中文網*，2017 年 9 月 28 日。檢索日期：2017 年 12 月 20 日。

<<http://www.bbc.com/zhongwen/trad/chinese-news-41434613>>

現在行為上的不同。朝鮮實行邊緣策略，透過發展核武和對外挑釁以及適時的透漏善意換取自身所需要的物資以及話語權。中朝雙方在不同的觀點中，謀求一個穩定的平衡點，在長時間內達成了一個穩定的不對稱關係。然而，金正恩上台之後，朝鮮邊緣策略的意圖越發明確，多次的導彈試射以及核子武器的開發，讓東北亞成為了亞洲最有可能發生衝突的地區。中國了反映出了自身負責任挑戰者 2.0 的角色，祭出了過去沒有的直接制裁朝鮮動作，不但禁止中朝之間的雙邊貿易，也嚴格審查在中國境內的朝鮮企業。但是中國也深怕朝鮮在受到這樣的刺激後完全脫離中國的掌控，表現出更不可預測的行為，所以中國也很小心的在制裁力度上有收有放。

在中國與朝鮮關係中，可以看到中國的角色建構內涵。中國在承擔了越來越大的區域穩定責任後，對於朝鮮破壞區域穩定後的制裁行為越來越強烈。但是，中國也在思考這樣的制裁是否會破壞中朝之間的穩定不對稱關係。因此，在收與放之間，把持了一個維持雙方關係的平衡點。對朝鮮而言，金正恩的挑釁動作嚴格而言目標並不是中國，而是美國、南韓與日本，甚至是國內情勢所以必須如此。吾人並不能確定中朝高層之間對此的理解為何。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中國隨著角色的變化，開始以區域穩定為己任，而朝鮮對西方世界的挑釁很可能已違背了中國的角色內涵。因此，未來的中朝關係，可能存在著更多的變數。而在兩岸關係的啟示上，可以透過中朝關係的變化，對照中國不同時期的地位、身分以及他者投射後融合出的角色變化，以實例來觀看中國在不同角色時處理朝鮮問題的手段變化。這對於理解中國大陸的兩岸關係作為時，有著參考價值。

## 第四節 大小政治實體概念對於理解中國處理兩岸關係的

### 啟示

在上述的中國—越南與中國—朝鮮大小政治實體實踐中，補充了中國在國際場域的角色建構過程，所影響的角色行為。在上述兩個大對小關係實踐中，可以看出中國在特定時期的角色建構，確實會影響對周邊國家的施政方向。這對於研究兩岸關係，有著重要的關聯。吾人更可以透過中共這三十年的對外政策改變，一窺兩岸關係的脈絡。但是，在研究兩岸關係時，仍要注意中國與臺灣兩個政治實體的特殊關連。

中國共產黨自詡為革命政黨，透過「不斷革命」將中國的政權掌握在手中。<sup>43</sup>中國共產黨擊敗中國國民黨成為中國正朔是共產黨統治合法性的很大一部份基礎。相對的，中國國民黨撤退至臺澎金馬後，在國際上很長的一段時間成為「中國」在聯合國的代表。蔣氏政權一方面在國際上打壓中國共產黨的國際空間，一方面將臺灣建設為「反共復國基地」，意圖透過武力重返大陸。在韓戰爆發時期，「一年準備、兩年反攻、三年掃蕩、五年成功」的前景似乎煞有其事。然而，現實情勢已如前文所撰，中華人民共和國在 1971 年重返聯合國，成為國際場域「中國」的唯一代表。在龐大的人口紅利與國土資源，快速發展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兩岸關係中成為了「大政治實體」。時至今日，中國的軍事與經濟等各項實力在多數人眼中已僅次於美國，兩岸關係中的「大政治實體」當之無愧。

然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角色實際能力（國力）與角色認知不可視為完全相同，亦即所身處的「位置」與其所認知的「身份」之間會出現落差，本文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處理兩岸關係涉及主權議題時，會出現過度反應的原因主要在此。在大小政治實體的模型中，大國由於小國對自身的影響力不如其他大國，因此會出現專注但「忽視」的舉動；相對的大國由於對小國相當重要，所以小國往往會「過

---

<sup>43</sup> 在鄧小平確立為中共中央核心後，鄧小平提出共產黨將不再遵循不斷革命乃至永遠革命的邏輯，改以經濟建設為中心。



度反應」甚至是「負面詮釋」大國的行為。但是兩岸關係中，早期北京對於臺北丟出的「主權球」往往會朝向「負面詮釋」的解讀並做出「過度反應」，如試射飛彈行為的大動作的文攻武嚇。這反映出了 1996 年代時北京對於台獨可能性的知覺是很高的，以及北京正處於大國角色建構過程，所以出現直接且大力度的反應，害怕自己的大國地位被挑戰。

中國在近三十年的時間內變化過五個角色。分別是 1989-1993 年的「韜光養晦注重內部與周邊發展」、1993-1996「以均勢尋求大國身分」、1996-2002「負責任大國身分發展」、2002-2010「負責任的挑戰者」以及 2010 之後開始的「負責任的挑戰者 2.0」。從中越以及中朝關係的變化中可以觀察，五個不同的角色對於中國如何處理大小政治實體關係中的軌跡。

在 1989-1993 年「韜光養晦注重內部與周邊發展」時期，中國注重周邊國家關係的發展與改善，甚至可以付出讓原有盟友憤怒的代價。以越南而言，雙方此時放下過去戰爭的陰影攜手創建關係正常化。以朝鮮而言，北京不惜付出朝鮮憤怒以及斷絕高層關係的代價，也要與南韓建交。朝鮮案例看似不符合中國此時期周邊國家改善的行為，卻隱含著中國已經規劃好了日後的發展藍圖。在當時，特別是蘇聯解體後，中國是朝鮮最倚重的國家，甚至可以說是朝鮮的命脈。在這樣的背景下，朝鮮對於中國並沒有任何制裁的本錢，僅能以保存面子式的方式斷絕高層訪中，以及加速研製核子武器加強自己的本錢。對中國而言，與一個經濟發展強盛的南韓保持斷絕關係，對自己現在與未來發展並沒有好處，更可能把南韓穩定的推向美國。兩害相權取其輕，北京經過冷靜計算下，選擇了與南韓建交，並繼續與朝鮮保持經濟合作關係，造就了日後發展的良好環境。

到 1993-1996 年「以均勢尋求大國身分」時期，中國大陸在 1993 年後，面對到的是美國作為獨強的世界，雖然兩國已經改善了關係，但中國認為均勢的世界與多極化的理念方可確立中國成為大國的位置。因此這段時間內，中共主要與俄羅斯和歐洲等美國外的列強改善關係。中國重新被西方世界接納，一方面重新進入西方世界建立「大國外交」，一方面繼續參與周邊整合，雙管齊下的發揮自

身的影響力。也由於中國大國的身分與地位持續成長，以及在這兩個場域都參與融入，中國在這段時期確立了自身「大國」的角色，也在 1996 年後進一步成長為「負責任的大國身分」發展。此時，朝鮮尚與中國高層斷絕來往，中國與越南仍在雙方關係正常化的過程中。這個時期的中國和越南已著手處理雙邊的國土爭議，並且在這個階段，中國透過經濟貿易以及提供物資或是金錢上的援助，以幫助東南亞國家開展開發建設。越南也得力於此時中國對東南亞國家的資源投入，雙邊貿易量快速增長。然而中國其他鞏固自身核心利益的行為，如南海美濟礁事件，也使得越南對於中國是否有尊重其獨立性有所懷疑。東南亞國家樂意與中國在經濟議題上合作，得到實質的經濟利益；但是在不對稱關係理論中，小對大關係的信任，仍有待加強。因此，在此時的中越不對稱關係實踐中，越南對於中國的交往仍然沒有完全信任。除了與中國交流之餘，也積極加入東協區域組織，更與美國建交。中越之間對於彼此的觀點仍在調整。

在 1996-2002 年「負責任大國身分發展」時期，中國在身份與地位上，以及他者投射的影響下，接受了自身成為大國的角色。已然成為大國角色的背景後，進一步追尋負責任大國的身分。由於中國的大國身分已然得到滿足，得到了更多的自信心，因此在處理與中國核心利益相關議題時，更有了彈性與空間，如 1996 年中國成為東協全面對話夥伴與簽署了「中越陸地邊界條約」，促成了日後中越邊界完全法制化等等。由此可知，中國負責任大國角色發展時期，對於相關領土主權爭議較之過去已較具彈性。這也使得不對稱理論中的小國給予尊重，大國給予自主的內涵相結合。1999 年，朝鮮在中韓建交後，首次派遣官員訪華，雙邊打破過去由政府高層冷和的局面。2000 年六月，時隔 11 年，中朝雙方恢復了領導人互訪與領導人會談。中國藉此影響東北亞半島改善南北韓關係，表現出了自身對北韓的影響力，<sup>44</sup>回應了中國是負責任大國的角色建構。在中國負責任大國身分的發展時期，在大對小與小對大的不同觀點下，透過許多更有彈性的作為，穩定周邊局勢，得到了小對大的尊重，達成了中越與中朝的穩定不對稱關係。這樣

<sup>44</sup> 河凡植，「中國對朝鮮半島地緣經濟戰略與其對中國南北韓關係之影響」，頁 52。

的他者投射下，負責任大國角色在此時期確立。

2002-2010 年「負責任的挑戰者」2002 年後，綜合實力的大國「位置」與自我認知的大國「身份」，以及其他國際行為者對中國大國的承認，確立了中國的大國角色。受到西方主流國家的影響，以及中國過往的區域領導者與區與保護者的角色認知，中國此時角色開始自詡為「負責任的大國」以及「負責任的挑戰者」。負責任的意涵為，中國的對外政策不能再完全以自身發展的需求出發，更應該顧慮到其他國家，甚至要維持亞洲區域的穩定平衡。與此同時，美國的目光焦點由於 911 恐怖攻擊，重心放到了中東。中美雙方在打擊恐怖主義的議題上取得了合作共識，中國不再是小布希上台時短暫認為的「競爭者」。在美國不再將焦點放在亞洲後，中國成為穩定亞洲區域和平的主要力量。

在此時期，中國同南海各國簽署「南海各方行為準則」，呼籲各自宣稱南海主權國的各聲索國克制彼此。<sup>45</sup>同時也以「睦鄰政策」以「睦鄰、安鄰、富鄰」為主軸，加強中國與周邊國家的關係。與此同時，2002 年 11 月，在第六次中國—東協領導人會議上，時任中國國務院總理朱鎔基和東協 10 個成員國的領導人共同簽署了「中國—東協全面經濟合作框架協議」，決定到 2010 年建成中國—東協自由貿易區。<sup>46</sup>在這段時期內，中國對越南的政策大抵上沒有很明顯的變化。雙方延續了一個穩定的不對稱關係，鞏固過去交流的成果，直至 2009 年前後。

至於朝鮮方面，美國發現朝鮮正在進行核試驗，更在 2006 年進行了第一次核試爆。在中國的勸說下，朝鮮同意與美國和中國進行三方會談，乃至之後增加了南韓、日本與俄羅斯的六方會談。雙方一共自 2003 年至 2007 年舉行了六輪會談，然在朝鮮於 2009 年宣布退出六方會談後以基本破裂。在這段期間，中國作為負責任的挑戰者，發揮了對朝鮮的影響力，將朝鮮推上與國際對話的談判桌。

---

<sup>45</sup> 「南海各方行為宣言」，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網站，2002 年 11 月 4 日。檢索日期：2017 年 12 月 22 日。

<<http://www.mfa.gov.cn/nanhai/chn/zcfg/t4553.htm>>

<sup>46</sup> 「中國—東協全面經濟合作框架協議」，中華人民共和國海關總署網站，2010 年 9 月 7 日。檢索日期：2017 年 12 月 22 日。

<<http://www.customs.gov.cn/customs/302249/302310/302311/302312/302319/394883/index.html>>

朝鮮半島無核化是中國的核心利益，若有朝鮮徹底放棄核子武器發展可能，中國自然樂觀其成。但是，中國也不會與西方世界採取完全相同的標準，徹底的孤立朝鮮。若進一步將朝鮮推擠到「邊緣策略」的極致，將無法預測朝鮮的反應。因此，雖然中國同意對朝鮮發展核武採取必要行為，但也不完全孤立朝鮮，依然與朝鮮共同慶祝建交六十年（中朝友好年）。作為一個負責任的挑戰者，中國與越南及朝鮮關係不但仍然維持了兩個穩定的不對稱關係，同時也幫助中國實踐這個時期中國的角色內涵。

本文認為，2002年至2010年的中國「負責任挑戰者」，更多的是為了符合主流世界所給予的內涵。中國為負責任的挑戰者 2.0 與前期最大的不同，在於中國將「負責任」的詮釋權收回，自己詮釋中國何種行為方屬負責任。2010 後，中國開始的「負責任的挑戰者 2.0」。其中的轉折點在於美國開始提倡美國將「重返亞洲」，又稱「再平衡」策略。美國的「重返亞洲」再平衡攻勢，表現在美越、美韓、美日、美澳、美菲等美國與亞洲區域小國關係的加強，以及推動亞太經濟整合「跨太平洋夥伴關係（TPP）」的舉動。過去美國深陷中東戰爭的泥沼，在決定從中東撤軍後重新加強在亞洲的影響力，期待自己「世界警察」的角色投射到亞洲，又由於中國沒有壓制住朝鮮越來越極端的手段，使得鄰國開始質疑中國作為區域穩定者的角色。又有遼寧號下水、南海建島爭議、機艦進入釣魚台水域爭奪管轄權的舉動，均重創了中國經營許久的負責任者「身份」，<sup>47</sup>造成周邊國家與中國的爭議。對亞洲小國而言，美國重回亞洲代表了中國在亞洲區域安全的話語權減少，自己角色的能動性更可以加強，如同過去中國之於美蘇，現在小國更可以在中美兩大強國之間游移，藉此換取雙方的援助。因此，習近平上台後強化鞏固「亞太夢想」，加強周邊國家政經合作與高層互訪，便是回應美國重返亞洲的理念，以及穩定周邊國家關係的舉措。

中國與越南關係此時轉為複雜。一方面在 2010 年雙方完全確定了彼此的陸地邊界，並慶祝建交 60 周年；另一方面受到中國海權擴張的影響，雙方在南海

---

<sup>47</sup> 張登及，「『再平衡』對美中關係之影響：一個理論與政策的分析」，頁 71-72。



主權上衝突加劇。雙方在穩定的大小政治實體關係中，高層互訪增加、經濟合作擴大、領土爭議解決，單純雙邊關係的問題可以得到妥善的解決。但是當情況為雙邊都參與其中的南海主權國各聲索國多邊關係中，由於中國的填礁造島與海軍實力的發展，因此無法得到各聲索國的信任。越南近年因此積極與美國、印度、俄羅斯等大國建立關係，透過與大國的合作增強自身的軍事武裝實力。但是，雖然越南表現出了抗衡的一面，中越之間並沒有要破壞這段關係的意圖，因此中越之間就有合作有對抗的內涵下，穩定的實踐不對稱理論

以大小政治實體理論綜觀中朝關係，雙方的觀點差異已然加劇。中國作為亞洲區域穩定者與區域領導人，並不希望朝鮮危害區域穩定。朝鮮作為被邊緣化角色，希望中國可以支持自己對抗世界。這造成了中朝雙邊觀點可能是最大差異的時期。過去中朝雙方在不同的觀點中，尚可一個穩定的平衡點，在長時間內達成了一個穩定的不對稱關係。然而，金正恩上台之後，朝鮮邊緣策略的挑釁行為越來越多，多次的導彈試射以及核子武器的開發，讓東北亞成為了亞洲最有可能發生衝突的地區。中國則反映出了自身負責任挑戰者 2.0 的角色，祭出了過去沒有的直接制裁朝鮮動作，不但禁止中朝之間的雙邊貿易，也嚴格審查在中國境內的朝鮮企業。中朝不對稱關係的完全破裂，並非兩國所願見，因此，這階段的中朝不對稱關係實例，仍然符合該理論的定義。但是，觀點差距的擴大，以及朝鮮是否對中國完全失望，不再給予尊重，都是未來中朝之間的課題。

本章節透過中越以及中朝兩個例子，觀察了中國在不同角色發展時期，實踐大小政治實體理論的內涵，期望可以對中國處理兩岸關係有所啟示。在觀察中國不同角色實踐不對稱理論的內涵中，可以看到中國不同時期的認知改變以及偏好。對兩岸關係而言，這樣的背景可以幫助台灣從更大的角度理解中共對台政策的流變內涵。從韜光養晦時的嘗試接觸，到自信不足的大動作文攻武喝，到負責任角色下的法治規範，到讓利方式的促進雙方交流，再到已然成為強權的對台手法收與放。再再表現出中國不同角色下的政策傾向與邏輯，因此，下一章節將以台灣與中國大陸實際接觸的 1987 年至 2017 年為界。分別探悉中國歷史自我的觀念認

知，以及特定時期中國大陸的「身分」與「位置」，揉合其他行為者給予的他者  
投射，上述綜合出的角色，以及在這個角色下中國大陸如何因應兩岸關係。



## 第四章 中國的角色認知與兩岸關係實踐

中國大陸的「歷史自我」以及配合了自我認知「身分」和實際能力的「位置」構成了自我認知，後經過「他者投射」的影響，共同建構出了中國大陸的角色變化。張登及與陳瑩羲透過邊界領土問題的處理、高層互訪、經貿往來以及經濟合作四個面向討論中國大陸與其周邊國家是否符合「天下觀」的朝貢體制，<sup>1</sup>當中得到了證實與反證。本文認為中國大陸「歷史自我」中的「天下觀」屬於理念性質，且在進入現代時已被西方國家主權思想補充，但是中國大陸「天下觀」中的許多概念，仍在今日影響著北京的行為。舉例而言，北京的「不干涉」原則可能脫胎自「天下觀」內涵，當然「不干涉」原因可能在於本身國力衰弱的具體無法作為，然至今日，北京仍不會對他的經貿援助給予價值觀的條件限制，除了南蘇丹的人權以及朝鮮發展核武威脅到北京本身的少數案例外，北京也不會對其他國家內政予以干涉。這進一步的說明了中國大陸「歷史自我」的觀念，對現今角色行為的影響。

放眼兩岸，「天下觀」其中一個面向的具體呈現應在「一國兩制」中，「一國兩制」脫胎自「羈縻制」。然兩岸之間「先經後政、先易後難」，即使在兩岸關係最良好的馬英九總統任期八年中，又政又難的「一國兩制」也未放上兩岸交流的議程（agenda）中。此時必須注意到「天下觀中的朝貢體制」所適用的範圍，中國歷史中自宋朝後，由於外交情勢的改變，已然出現近似主權的概念，對於周邊民族的控制（土司制度）已然強化，不再給予中國境內少數民族太大的彈性。這也可以部分說明香港目前「一國」的概念越來越強，而「兩制」的內涵越來越限縮的現象。林文程認為北京的中、長程目標是透過將臺灣香港化，不斷擴大中國在臺灣之影響力，滲透臺灣的各行各業及各個角落，最終達成統一臺灣之目標，<sup>2</sup>這

<sup>1</sup> 張登及、陳瑩羲，「朝貢體系再現與『天下體系』的興起？中國外交的案例研究與理論反思」，中國大陸研究第（台北市），55卷第4期（民國101年12月），頁89-123

<sup>2</sup> 林文程，「台海兩岸關係的現況與未來」，蘇起、童振源，兩岸關係的機遇與挑戰，（台北市：五南，2013年9月），頁55。

也是兩岸關係涉及主權的困境，當兩岸之間始終走不上政治談判桌，則中國「歷史自我」的「天下觀」影響與解釋能力就有限制，但是，這也不代表中國「天下觀」在兩岸關係研究中完全沒有意義，因為「天下觀」作為一個具有多面向的觀點，會影響北京的認知與行為。具體而言，「天下觀」的另外一個面向是較為熟悉的「以大事小」維繫友好關係的「讓利」行為以及「以小事大」的「尊重」行為。「讓利」源自「天下觀」中的朝貢體制，傳統朝貢體制中周邊國家往往會得到中國更大量的回報；「尊重」源自於遣使入朝，周邊小國派遣使者進入朝廷，並且透過中國承認自身統治合法性。中國歷史上往往藉由物質的不對等交換換取從屬國意識形態上的效忠，謂之名份。兩岸之間若沒有明確政治效忠或尊重，就不會有明確的「讓利」行為。

除了「天下觀」外，中國大陸的歷史自我角色如受害者、區域領導人、區域穩定者等角色，不但在國際場域的角色建構中提供了中國大陸角色建構的內涵，也在兩岸關係中發起了重要的影響力。以北京的角度而言，兩岸關係之所以存在，就是因為中國過去積弱被西方列強宰制的「受害者」身分，方有中國尚未完全統一的局面。而當中國已然成長為大國甚至負責任的挑戰者時，作為區域領導人則必須可以自己處理好家務事，並對周邊國家「讓利」並希望其「事大」，承認中國是區域領導人的角色。並且北京還要有能力成為區域穩定者，建構出一個有利於亞洲周邊國家發展的環境，且要以身作則不能成為麻煩製造者，在臺灣沒有主動挑釁下挑起亞太地區的動盪。在這樣的中國大陸自我認知背景下，以及中國式世界觀底下培養出的「他者投射」，自我以及其他行為者雙向影響，建構出中國的角色變化，本論文在前面的章節已整理出了中國不同年代的角色建構，以及該時期的角色內涵與特性。將這個大背景放入兩岸關係研究中，可對兩岸之間的互動方式以及彼此認知，有著更明確的脈絡。

本章先探討小對大關係中可能採取的選項，亦即扈從、避險與對抗的光譜。藉此整理臺灣在面對到中國大陸時，所採取的行為內涵。之後，再爬梳兩岸之間自 1987 年交流至今的重要事件，藉鑑中國大陸當時的角色建構內容，整理中共



對台政策的變化。本章將以中國大陸的國際角色建構為主，探討北京在面對兩岸關係時角色理論的實踐，並從大小政治實體理論審視各種角色的策略選擇。第一節將探討大小政治實體理論中各行為者的策略與可能作為，後以兩岸之間具有重大意義的事件作為時間段落。其中分期的依據是透過兩岸關係中具有代表性意義的重大事件。本文認為，若單純以台灣總統任期來分期，則台灣總統的政黨特性影響將太明顯，會太注重短期效果而忽略中國大陸自身角色的轉換。因此，本文將以 1987 年兩岸開始實質交流、1996 年海峽導彈危機、2005 年反分裂國家法以及 2015 年的馬習會這四項重要時間點，做為切割的依據。本文認為這些事件代表了兩岸關係中的重要轉捩點，不但影響了兩岸關係的內涵同時也反映出了中國大陸當時的角色行為。先從兩岸關係的初始：從融冰到破碎（1987-1996）這段期間內，中共渴望成為大國的兩岸關係變化。再討論兩岸導彈危機後至反分裂國家法的：由熱到冷，武嚇台獨乃至於法理反獨（1996-2005）期間，中共負責任大國角色期間的兩岸關係。之後，處理強大的中國，擔任責任的挑戰者以及負責認的挑戰者 2.0 的從反獨到促統的再接觸（2005-2015）時兩岸關係變化。最後，馬習會過後至今凍結（2015 至今）期間的兩岸關係。在上述依時段分別探討的兩岸關係重要事件和特性後，整理兩岸關係三十餘年的變化。

## 第一節 大小政治實體理論與小國的選擇

在大小政治實體理論中，吳玉山將小國的選擇區分為「抗衡」(balancing) 與「扈從」(bandwagoning) 兩個選擇。<sup>3</sup>而 Womack 筆下的「抗衡」(defiance) 與「扈從」(deference)<sup>4</sup>主要是說明小國對大國時所展現出的兩種可能態度，與吳玉山的權力平衡 (balance of power) 概念有所不同。總而言之，選擇屈服的扈從與選擇對抗的抗衡分別佔據了光譜的兩端，在光譜之間的策略，國際關係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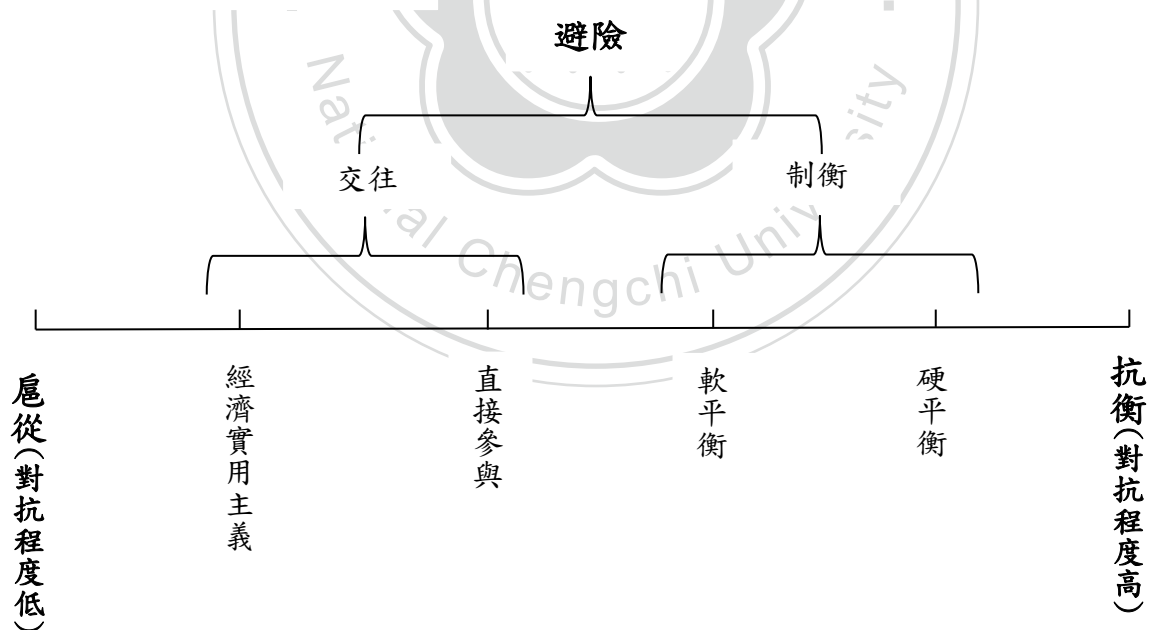
<sup>3</sup> Wu, Yu-Shan. 2005. "Taiwan's Domestic Politics and Cross-Strait Relations." *The China Journal* (53), pp. 35-60.

<sup>4</sup> Womack, Brantly., *China and Vietnam: The politics of Asymmetr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2006, pp. 77-92.

究大致以「避險」(hedging)稱呼這種戰略。<sup>5</sup>避險策略是擁有彈性的，可以依據小國自身的需求、大國表現的行為以及雙方交流的成果下做出光譜上的移動。Womack 也在 2010 年提出，透過中越兩國的歷史研究可以發現，與中國相鄰的中小型國家，最有效的生存策略是參加當時中國的朝貢體系中，爭取經濟與文化紅利，避免與中國全面的敵對，同時也要警戒中國勢力的南侵。<sup>6</sup>

避險策略同時結合了「交往」(engagement)與「制衡」(balancing)兩種概念。<sup>7</sup>換言之，不採取非黑即白的明確策略，而在中間的模糊地帶，尋求特定時空背景下，雙方關係均可接受的一點。Le Hong Hiep 提出，避險策略有四點內涵，分別為經濟實用主義 (economic pragmatism)、直接參與 (direct engagement)、硬平衡 (hard balancing) 與軟平衡 (soft balancing)。<sup>8</sup>綜合上述，可以得到以下光譜圖。

圖 4-1 扈從、避險與抗衡光譜圖



資料來源：作者自繪

<sup>5</sup> 張登及、金世勛，「朝貢體系下中小國家的避險行為：朝鮮半島的兩個歷史案例初探」，政治學報 (台北市)，第六十三期 (2017 年)，頁 66。

<sup>6</sup> Womack, Brantly. "China among Unequals Asymmetric Foreign Relationships in Asia." pp.183-211

<sup>7</sup> 張登及、金世勛，「朝貢體系下中小國家的避險行為：朝鮮半島的兩個歷史案例初探」，頁 67。

<sup>8</sup> Le Hong Hiep，「建交後越南對中國的避險戰略」，全球政治評論 (台中市)，第四十九期 (2015 年)，頁 149-180。

從上圖可以得知，小國的策略依據對抗程度低至高分別左起扈從、經濟實用主義、直接參與、軟平衡、硬平衡與抗衡。其中經濟實用主義與直接參與屬於交往的範疇；軟平衡與硬平衡屬於制衡的範疇，兩種範疇共構了避險策略。經濟實用主義內涵為，透過與大國發展經濟貿易，一方面增強自身經濟綜合實力，一方面將自身融入大國對外經貿體系，以雙方互利為原則，減少大國對自身的威脅；直接參與則是與大國建立健全的雙邊交流合作機制，如定期的制度性協商或高層領導人的互訪，並參與大國所主導的多邊跨國組織。上述兩點屬於交往的範疇。另一方面，軟平衡為與其他國家如蘇聯、美國與東盟等國深化雙邊關係。透過與主要大國外的國家建立關係，進而稀釋主要大國的影響力，增加自己的談判籌碼；硬平衡則是提升自身的實力，特別在軍事武裝上。透過購買國外的先進裝備與發展國內的軍事防護工業，加強自身的軍事嚇阻能力，甚至是發展核子武器，使得主要大國不得迴避出現衝突時的成本，取得制衡大國的結果。

在兩岸關係的實踐中，1987年過後就幾無出現純然對抗與純然扈從的光譜極端行為。臺灣在面對北京時，無論國民黨兩黨，均採取了交往與制衡並進的手段，差別僅在於比重的孰輕孰重，以及北京如何認定這段關係的性質。值得注意的是，由於交往與制衡往往是並進的手段。所以，小對大的戰略選擇為何，不僅是小國自身能動性的選擇，更要考慮大國如何認定。當大國認為小國的舉措是具有尊重性的，則大國將給予自主性，雙邊不對稱關係正向影響；反之，當大國認為小國未給予應有的尊重，則將是雙邊不對稱關係維持的困境。在臺灣的例子中，由於兩岸的主權議題，所以自主性應當解釋為一定的國際空間還有對岸的善意。如何理解目前是怎樣的關係，是不對稱關係中雙方認知的關鍵，也是月暈效影的影響範疇。當雙方較有互信時，雙方的知覺會傾向將對方想像成對己有利（尊重、自主性）的作為。反之，則會忽視彼此散發出的善意，交流雙方均往壞處（具有威脅、斷絕來往）去想，進而惡性循環。<sup>9</sup>

---

<sup>9</sup> 如國民黨時期的拓展國際空間以及民進黨時期的拓展國際空間，在北京的眼中是完全不一樣的行為。月暈效應認為認知會被最開始的映象所影響，因此不論民進黨做什麼都可能使北京認為正

## 第二節 兩岸關係的初始：從融冰到破碎（1987-1996）

在 1987 年至 1996 年間，中國大陸經歷了不同時期的角色變化，分別是美蘇兩強的平衡者、被孤立乃至於韜光養晦重視內部與周邊發展者以及尋求大國身分的角色變化。以中國外交類型學的觀點而言，這階段的中國外交表現較為符合「國際體系平衡者」的內涵。<sup>10</sup> 這個階段的中國由於綜合國力的原因，主要目標為爭取安全與壯大自身，對國際體系產生衝撞的「國際現狀挑戰者」類型內含並不明顯。正在這段時間內兩岸關係開始了實質交流。1987 年，國務院辦公廳公布了「鼓勵臺灣人民赴大陸探親旅行之規定」以及 1988 年「國務院關於鼓勵臺灣同胞投資的規定」，期望雙邊交流深化。在這個階段中國大陸在國際場域的重要性爬升，也建立了一定的自信。在 1989 年以前，中國大陸在國際上受到重視，相對應的地位不斷提高，與美國、蘇聯等等國家維持良好關係，身分上成為了傾向西方的平衡者。隨者中國地位的上升，周邊國家對中國的合作需求也增高，加強了中國重新取得區域領導人與區域保護者的角色。中國更藉此當作籌碼，與美國換取了與臺灣核心利益相關的上海公報。這樣的背景下，加上臺灣不接觸、不談判、不妥協三不政策實施者，政治強人蔣經國的過世。就兩岸關係的客觀事實而言，上述的種種因素，造就了兩岸開始接觸的土壤。

然而，1989 年六四天安門事件，國際對於中國大陸鎮壓民眾的行為譁然，針對中共政權的不信任與制裁相應而起，成為偉大復興夢的夢醒時分。本研究認為在 1989 年至 1993 年期間，中國大陸在被國際主流世界封鎖後，身分發展成為「韜光養晦注重內部與周邊發展」。因為在西方世界接觸的大門被暫時關閉，此時中國更為注重自身發展以及積極拓展周邊國家關係，包含與越南關係正常化以及與南韓建交等。<sup>11</sup> 兩岸關係也在此時期開始深化，雙邊在一開始的交流並沒有互信，且涉及到了意識型態問題，因此兩邊更為小心的處理兩岸融冰的議題。在

---

在為台獨做準備，進而忽視民進黨對北京所釋出的善意。

<sup>10</sup> 張登及，「外交戰略與國際地位」，頁 426-427。

<sup>11</sup> 以毛澤東的語言與中國的意識形態而言，可以將此時的中國行為解釋成過去「打掃房子再作客」的天安門後版本。在不能有所作為的地區沉潛，在能有所作為的地區繼續發展自身。



這段期間，雙方還未確立海基會與海協會的民間「白手套」交流機制，主要透過密使交流。蘇起提出，1988年元月李登輝總統方剛接掌大權，二月五日大陸方面就與南懷瑾接觸，表達希望牽線之意。兩岸雙方在兩年後1990年，於香港南懷瑾寓所，初談臺灣將「終止動員戡亂」問題，自此至1995年雙方共舉行了二十七次密會。<sup>12</sup>蘇起認為，中國大陸此時會如此積極的建立與臺灣溝通的機制，很大的原因在於天安門事件遭到國際制裁後，希望藉由將臺灣拉上談判桌，一則有利於推動和平統一工程，二則吸引國外資金，三則改善國際形象。<sup>13</sup>此與本研究所認為的中國角色認知變化影響的角色行為符合。

在密使談判階段，雙方並不需要處理意識形態的定位問題。但一旦當雙方交流浮上檯面，如何處理雙方視對方為叛亂政權的問題，就是亟待解決的議題。1990年時任總統李登輝集結了黨內外人士，成立國家統一委員會，討論如何處理兩岸之間的主權與認知問題。1991年國統會通過「國家統一綱領」，將兩岸統一設定為近、中與遠程三個階段，<sup>14</sup>凝聚了當時臺灣的主要共識。然而，遠程目標建立在中國大陸成為民主自由政體，明顯的是在承認一個中國原則下將戰線拉長，觀察中國大陸的反應。無論如何，這階段的雙方海基會、海協會交流結果成為今日共產黨、國民黨與民進黨各自表述的「九二共識」、「九二精神」或「九二歷史事實」。「九二共識」的存在與否並非本研究所要解決的問題，本研究僅將其確認為目前國共雙方交流的基礎。

1992年由於雙方日益增加的交流需要，立法院通過「兩岸人民關係條例」，雙方民間與經貿交流屬於臺灣小對大的「交往」策略；同年美國總統布希宣布售台一百五十架F-16戰鬥機，臺灣也與法國簽約購買六十架幻象2000，這是臺灣的「制衡」策略中的硬平衡策略。上述行為即是當年臺灣面對中國大陸的小對大

<sup>12</sup> 蘇起，**兩岸波濤二十年紀實**，（臺北市：遠見天下文化，2014年），頁20-24

<sup>13</sup> 蘇起，**兩岸波濤二十年紀實**，頁20-24

<sup>14</sup> 「國家統一綱領」，**行政院大陸委員會網站**，民國80年2月1日。檢索日期：2017年12月25日。

<[https://www.mac.gov.tw/News\\_Content.aspx?n=AD6908DFDDB62656&sms=161DEBC9EACEA333&s=E843129F8763C0DD](https://www.mac.gov.tw/News_Content.aspx?n=AD6908DFDDB62656&sms=161DEBC9EACEA333&s=E843129F8763C0DD)>

「避險」策略。中國大陸固然反對美國對台軍售，但此時期的主要目的在於雙邊交流的深化，所以並沒有對臺灣「避險」策略中的硬平衡表現出為此不惜切斷交流的作為。也由於中國大陸此時的內部發展角色表現出的「韜光養晦」行為，尚無力對美國如何實行「臺灣關係法」中，對台軍售的事實給予有效的打擊。

雙方於 1993 年，由辜振甫與汪道涵在新加坡舉行了「辜汪會談」。台灣對中國大陸表現出交流與制衡並進的手段，中國大陸也有軟的一面與硬的一面。1993 年大陸國台辦發表「臺灣問題與中國統一」白皮書，當中提出「必須指出，臺灣當局雖對兩岸關係作了某些鬆動，但其現行大陸政策仍嚴重阻礙著兩岸關係的發展和國家的統一。他們口頭上雖聲稱「中國必須統一」，但行動上卻總是背離一個中國的原則，繼續維持與大陸分離的局面，拒絕就和平統一問題進行商談，甚至設置障礙，限制兩岸交往的進一步發展。」<sup>15</sup>此時的北京對兩岸關係的定調具體呈現在 1995 年，中共總書記江澤民所發表的「江八點」。

在毛澤東與鄧小平的視野中，「一個中國」指的是「世上只有一個中國，臺灣是中國的一部份」，但江澤民對此做了調整，嘗試將「臺灣」與「大陸」對等並列，暗示臺灣與大陸都是中國的一部份。<sup>16</sup>李登輝總統以「李六條」回應，期盼中國大陸正視雙方分治的事實，在尊重對等的原則下，尋求現今兩岸分治的現實上國家統一的可行方式。蘇起認為，1990 年代初期兩岸政治關係的和緩，帶動了軟性的民間經濟與文化交流，尖銳的軍事與外交鬥爭也變得溫和。<sup>17</sup>因此，雖然這個時期雙方由於觀點的差異性，彼此在這段關係是放出彈性，手法有軟有硬對抗交往並進。但終究是在摸索中初步建立了雙邊的一個不對稱穩定關係，維持到了 1996 年。

1995 年李登輝總統訪問康乃爾大學，強調中華民國存在的事實，挑動了北

<sup>15</sup> 「臺灣問題與中國統一」白皮書，人民網網站，1993 年 8 月 31 日。檢索日期：2017 年 12 月 25 日。

<<http://www.people.com.cn/BIG5/channel1/14/20000522/72537.html>>

<sup>16</sup> 游梓翔，*領袖的聲音：兩岸領導人政治語義批評：1906-2006*，（台北市：五南出版社，2006）頁 227-228。

<sup>17</sup> 蘇起，*兩岸波濤二十年紀實*，頁 37。

京的敏感神經。中國大陸海協會推遲第二次辜汪會談，甚至在7月18日，解放軍宣布對臺海進行導彈試射，並自此開始加強了對臺灣的飛彈數量。1996年3月5日，中共宣布將在基隆港與高雄港外海進行導彈試射。3月10日美國宣布派遣兩艘航空母艦群前往臺海巡弋，維持兩岸不擦槍走火。雙方交流態勢急轉直下，軍事與外交鬥爭轉趨緊張。

就其所以，在於北京認為臺灣正在試圖挑戰中共的主權紅線，片面的想改變過去一個中國的承諾。值得注意的是，根據國貿局的統計，兩岸雙方屬於民間的經貿交流仍然直線上升。<sup>18</sup>以角色理論觀之，1993年後由於重新進入西方世界，中國大陸挾著韜光養晦時期打下的基礎，重新進入世界後角色已轉換為追尋「大國」身份的時期，在這個階段，中國大陸大國角色正在建構，在地位上中國已然成為大國，樂於與周邊小國在經濟議題上合作，讓周邊國家得到實質的經濟利益。但是在身分上，中國尚未得到周邊小對大關係的信任。在追尋大國身份的過程中，北京對挑戰自己身份的行為格外敏感。從中朝與中越南的例子可以看出，中國大陸要在1996年後，整體國力與其他行為者對中國已然成為大國的需求方成形。由於中國的大國身分已然得到滿足，得到了更多的自信心，因此在處理與中國核心利益相關議題時，才沒有了過去零和賽局的極端態勢，更能符合關係平衡的定義。在處理周邊國家的不對稱關係時，更有了泱泱大國的格局，歷史自我中對周邊小國的朝貢體系態度，才在適當的時機展現出來。而台海95年與96年的導彈危機，剛好在中共角色轉型期間的落差，加之中共此時真心認為臺灣將可能脫離其控制，此時的北京歷史自我中的「受害者」角色孕育而起，聯想到了過去被西方國家分割國土的記憶，因此得到強烈的反擊。在自身大國身分被挑戰以及過去「受害者」角色的出現。此時中國歷史自我中的區域領導人與區域穩定者角色相對降低，不惜一戰之勢也要將臺灣問題壓下去。此便為中國大陸角色的認知「身份」與實力「位置」出現落差，成為此時期「從融冰到破碎」的北京政策產出脈絡。

<sup>18</sup> 蘇起，兩岸波濤二十年紀實，頁39。

就大小政治實體理論而言，兩岸之間從 1987 年至 1996 年間，彼此摸索出了一個穩定的不對稱關係。在這段關係中，台灣雖與中國大陸有觀點上的差異，但是台灣透過「國家統一綱領」的方式給予北京承諾，台灣並不會片面改變一個中國的框架，這樣的承諾可以被解釋為尊重或效忠。中國大陸則在這個基礎上與台灣接觸並深化交流，雙方在這個政治承諾中給予彼此彈性，促進了這時期內的穩定關係。然而，雙方此時的交流基礎仍然脆弱，在認定對方對自己有威脅時，戰火一觸即發，中斷了這個穩定關係。以角色理論而言，除了關注雙方從好到壞的交流過程，更要進一步的追問為什麼此時中國所表現出來的會是這種角色行為。自伊始，中國大陸經歷了三種不同角色。兩岸之間的初始交流發展於中國大陸快速崛起的兩強平衡者階段，北京透過這樣的角色與美國換取在兩岸關係中的主動性，並在這樣的時空背景下開啟了兩岸之間的實質交流。天安門事件後，積極參與國際事務的中國大陸被西方世界封鎖，成為了韜光養晦關注內部與周邊發展角色，開始注重周邊國家的關係改善。兩岸關係的維持與深化相當符合中國此時的角色。

1993 年後中國重返西方世界舞台，開始發展自己的大國身分。同年，辜汪會談於新加坡登場，對兩岸關係交流而言是實質的深化。然此景不長，雙方馬上就李登輝訪康乃爾大學事件發生衝突，中國大陸更不惜外界的眼光對台灣文攻武嚇。以此時的理論而言，中國追尋大國身分的同時，自己也加強了區域穩定者和區域領導人的角色。但是對台灣的威脅，以及逼近戰爭邊緣的行為並不符合此時的角色內涵。本文認為此時中國大國角色仍在建構中，要到 1996 年後方確立，並進一步追尋負責任大國的身分。此時期的中國大陸角色正在轉換階段，意識形態被翻轉的恐懼大過於區域保護者的角色認知。也由於此時中國仍在追尋大國的道路上，對於台灣是否真的脫離一中框架有著被實現的恐懼。因此，此時的中國大陸做出了這樣的選擇。同時期的中越關係也可以看出，中國此時期與南海主權各聲索國也面對到困境。在追尋大國身分之後要如何與周邊和諧相處，就是中國下一個階段角色建構處理的問題之一。



### 第三節 由熱到冷：武嚇台獨乃至法理反獨（1996-2005）

1996年兩岸關係凍結，同一時期的國際場域中，中國大陸已然成為大國乃至於開始負責任大國的身分發展。北京開始反省過去兩岸關係中的美國角色，以及美國為何同意臺灣領導人進入美國國土並發表演說。因此在中國已然成為大國角色並且深化中美關係後，試圖改變過去美國在兩岸關係中所累積的影響力；同時也檢討對台「文攻」「武嚇」所付出的成本與收益是否符合，明顯的96年危機不只將李登輝，更將被寄希望的臺灣人民推得更遠。1996年至2001年中國大陸開始「負責任大國」的身份發展，中共開始與其他大國密切交流發展「大國外交」，這是北京過去「韜光養晦」自我內部發展的角色身份與位置所無法企及的。因為「臺灣關係法」的緣故，兩岸關係很大部分鑲嵌在中美博弈上。中美之間關係升溫後，中共藉由自身國力的上升與成功的「大國外交」，要求美國對兩岸關係中「一個中國」原則表態。1998年，柯林頓在上海提出華府對台政策的「三不原則」，亦即，不支持「兩個中國」或「一中一台」、不支持臺灣獨立、認為臺灣不應加入任何必須以國家名義才能加入的國際組織，藉此壓縮臺灣能動性。

與此同時，兩岸之間的交流仍在持續，1998年10月14日，辜振甫在上海會晤汪道涵，達成四項共識，並邀請汪道涵訪台。10月18日，江澤民在北京會見辜振甫。雙邊關係有望進一步深化。但是，臺灣在北京與華盛頓越走越近的打壓下，自身可迴旋的空間越來越小，考量到兩岸之間關於主權的爭議，1999年，李登輝總統在任期即將結束的時期，接受德國之聲專訪，提出「特殊的國與國關係」，被認定為「兩國論」。此舉的臺灣主權意識，更勝於1995年李登輝會造訪康乃爾大學，當然也強烈的觸動著北京的敏感神經，也讓美國覺得臺灣單方面想改變現狀，違背柯林頓剛提出的對台「三不政策」，因此延緩宣布對台軍售，以及對中國大陸解釋自身並不是臺灣兩國論的幕後推手。北京第一時間強烈的反對「兩國論」，多次出動軍機至台海中線以及大力宣傳對台的軍事演習，且與柯林

頓熱線確定「兩國論」並不是美國所同意的臺灣新路線。<sup>19</sup>但是這樣的抗議力道遠遠沒有三年前試射導彈的那樣激烈。

北京將矛頭指向李登輝總統，認為兩國論是蓄謀已久的分裂企圖，除非臺灣放棄兩國論，否則兩岸兩會沒有復談的基礎；但雙方的歧異不妨礙經貿往來以及台商的合法權益。<sup>20</sup>更重要的聲明在 2000 年的「一個中國的原則與臺灣問題」白皮書，當中提出「李登輝已經成為臺灣分裂勢力的總代理，是臺灣海峽安定局面的破壞者，是中美關係發展的絆腳石，也是亞太地區和平與穩定的麻煩製造者。」<sup>21</sup>，更在臺灣選舉前夕透過朱鎔基出口威脅，這造成與四年前導彈危機相似的效果，又一次地將臺灣人民推離北京，民進黨執政，中華民國第一次政權轉移。

綜觀此階段的中國大陸角色身份，可以看出北京已學習從美方的方向限制了臺灣獨立的可能。「負責任大國」的身份發展使得北京在短短四年就變換了完全不同的手法，從中越關係的案例當中可以看到，中國在負責任大國身分發展時期，變的更有彈性。本研究認為中國大陸的角色建構在 1996 年經歷了重要的轉變，從追求大國身份，到已然大國身份進一步追求「負責任大國」的角色。過去直接的試射飛彈的張牙舞爪行為，轉變為較間接的軍事演習、官員強烈回應以及透過美方對臺灣施壓等方式表達不滿。更進一步討論，中國「歷史自我」中的區域穩定者包含在正在追求的「負責任大國」角色內涵中，同時也與美國的大國外交關係密切。此時的中國已經可以得到美國的保證不支持兩個中國的「台獨」可能，「受害者」角色得到了美方保證後暫時退去，沒有激起過激的民族主義浪花，也沒有了過去台獨真的可能實現的恐懼。因此更偏向採用「負責任」者的抗議行為，不讓自己的行為與負責任的區域穩定者角色抵觸。蘇起認為，也正是因為如此的信心上升，中共的對台政策在 1999 年後已由「防獨」走向「促統」，也因此

<sup>19</sup> 蘇起，兩岸波濤二十年紀實，頁 113-120。

<sup>20</sup> 梁寶華，「中共仍將堅持和平統一、一國兩制和江八點」，工商時報，1999 年 8 月 19 日，第十版。

<sup>21</sup> 一個中國的原則與臺灣問題。

出現了「統一時間表」的說法。<sup>22</sup>但是，北京仍在介入臺灣的選舉中，讓事態朝向不樂見的發展方向，朱鎔基成為了民進黨在 2000 年最關鍵的助選員之一。

2000 年，陳水扁當選中華民國第十任總統，並在五月就時演說提出「四不一沒有」承諾「只要中共無意對台動武，本人保證在任期之內，不會宣佈獨立，不會更改國號，不會推動兩國論入憲，不會推動改變現狀的統獨公投，也沒有廢除國統綱領與國統會的問題。」意圖向北京示好。北京則答覆，陳水扁總統在一個中國原則上採取模糊與逃避的態度，<sup>23</sup>北京將「聽其言，觀其行」。在陳水扁總統上台後，不斷試圖修正民進黨原有的路線試圖與北京產生交集。除了「四不一沒有」外，也在 2000 年六月接見美國學者訪問談時脫口而出「可以接受一個中國各自表述的九二共識」，但經過當時陸委會主委蔡英文介入後，總統府改口否認。2000 年 9 月陳水扁總統也想恢復李登輝總統時代的「國統會」，但也因蔡英文反對轉而成立「兩岸跨黨派小組」。並在 2000 年 10 月以「臺灣前途決議文」取代「公投台獨黨綱」，宣告民進黨的「台獨黨綱」已不適用。<sup>24</sup>然而這些作為，均未得到北京的善意回應，或者說足夠善意的回應。就其所以，在於月暈效應的認知影響。北京已然先入為主認知陳水扁為台獨人士，不論其立場如何往中間靠攏，仍不足以採信，北京看重了陳水扁過去台獨的一面，在成為總統後試圖打開新道路的作為被忽略，或需「再觀察」。除此之外，在 2000-2001 的短時間當中，中國大陸被甫上任的小布希總統視為「競爭者」，有一改過去柯林頓時期「新三不政策」的態勢，在不希望節外生枝的情況下，對於兩岸關係先冷處理觀望情況是當時中國大陸角色身分的理性做法。

陳水扁總統的「新中間路線」可謂是提出者不對以及生不逢時，在陳水扁總統還可以壓制住自身黨內獨派勢力時得不到北京的善意回應。甚至在陳水扁總統就任黨主席當天北京挖走臺灣邦交國諾魯，加上臺灣內部支持者流失，逼迫了陳

<sup>22</sup> 蘇起，兩岸波濤二十年紀實，頁 71-76

<sup>23</sup> 中共中央台辦、國務院台辦授權，就兩岸關係問題發表聲明，人民網網站，2000 年 5 月 20 日。檢索日期：2017 年 12 月 25 日。<<http://www.people.com.cn/GB/channel1/10/20000520/71092.html>>

<sup>24</sup> 黃偉峯，「兩岸協商談判經驗之比較：1990-2010 年」，吳釗燮，台海兩岸關係與中國國際戰略，（台北市：新臺灣國策智庫，2011 年），頁 107

水扁總統透過兩岸政策換取國內的空間。2002年8月3日，陳水扁提出「臺灣中國，一邊一國」，北京對其「觀其行」的時間結束，將陳水扁打為台獨同路人，兩岸之間官方成為了對抗格局。值得一提的是，時任美國總統小布希原本對中國大陸態度強硬對臺灣則較友善，但在911恐怖攻擊後北京與華盛頓之間扭轉了位置，美國的角色成為了全球反恐領袖，在這樣的情境下中美競爭與「臺灣問題」重要性下滑。小布希總統於2001年4月25日說「美國將竭盡所能防衛臺灣」，<sup>25</sup>並大量出售武器給與臺灣。同年稍晚911恐怖攻擊後的2001年10月20日便改口「美國需要一個與中共的建設性關係」。蘇起認為，在這段時間內，中共對台開始展露自信與彈性。對於來自台北的大多數刺激言行，北京不再像以前動輒暴跳如雷、惡言相向。在公開場合也盡量寧軟毋硬，幾乎不再提「不放棄武力」之類的字眼。<sup>26</sup>中共也開始拾起「負責任」的身份，力圖在當時的國際中展現出大國的氣魄。

2003年，美國總統小布希與中國總書記胡錦濤在法國見面，反對臺灣領導人台獨言行，重申美國的「一中政策」。<sup>27</sup>更在該年底與溫家寶在華府的記者會中公開的反對台獨立場。2004年5月17日，國台辦搶在陳水扁總統連任的演講前發表「五一七聲明」，同年12月17日大陸全國人大常委會將「反分裂國家法」草案列入議程，2005年3月15日，大陸全國人大會議通過「反分裂國家法」。「反分裂國家法」具有非常大的意涵，首先，其有「戰爭授權法」的罵名，這部中國大陸自身的國內法給予了解放軍出兵臺灣的授權。其次，其強調了北京版本的「一中原則」，將北京版本的「一中原則」包覆在了如美國「臺灣關係法」概念中的國內法，為日後反對台獨確立了法理性。再者，這呼應了中國大陸此時朝向霸主下的首極前進「負責任的挑戰者」身份。在胡錦濤完全掌權後，太平洋另一側的美國總統小布希政府陷入戰爭的泥沼威望衰落。中共不再是消極的參與現狀秩序來負責任(如一開始的朝鮮六方會談)，更在亞洲區域自己成為了秩序的訂定者。

<sup>25</sup> 此時美中才剛在南海發生撞機事件，雙方關係迅速惡化。直至911恐怖攻擊後才又合作。

<sup>26</sup> 蘇起，兩岸波濤二十年紀實，頁273。

<sup>27</sup> 蘇起，兩岸波濤二十年紀實，頁358。



此外，回首到中共的「受害者」角色，在民族主義的大旗下對「外力介入」自身國土完整的法令頒布，對於國內的民族主義者以及鷹派有著安撫的作用。最後，「反分裂國家法」成為了北京對於兩岸關係一個不可再回溯的關鍵文件，日後當兩岸關係再次出現主權爭議時，不再需要引用「反分裂國家法」前的領導人言論或是雙方協商的內容，簡單乾脆具有法理性的「反分裂國家法」成為兩岸關係基礎性的規範文件。<sup>28</sup>

1996 年到 2005 年間，面對台灣類似的挑戰，中國大陸從逼近戰爭的激進行為，轉換到將台灣問題限縮在大陸國內法的範疇，表現出不同危機處理的行為。回首中朝與中越關係，此時其中國大陸的行為，符合了該時期的中國大陸角色。中國大陸自 1996 年開始負責任大國身分發展，以及 2002 年開始成為負責任的挑戰者。在 1996 年後，中國的大國身分得到滿足，取得更多的自信心，因此在處理中國核心利益相關議題時，沒有過去零和賽局的極端態勢，與周邊小國的不對稱關係，更有了泱泱大國的格局。在中越關係中，雙方 1999 年實現雙邊關係正常化，並且在國土議題的核心價值中，對越南作出讓步。在中朝關係中，1999 年中朝高層破冰，並在 2003 年加入六方會談幫助周邊國家處理東北亞的緊張局面。這些案例說明了中國這階段內不斷的透過對外行為，符合此時中國的負責任角色。因此，兩岸關係自 1996 年後，在雙邊關係緊張時期，北京轉換了過去較為激進的手法，以較為平和的文攻為主，較少對台灣進行武嚇。

台灣方面，在陳水扁總統上任初期釋放出尊重的善意，試圖建立民共之間的交流基礎。惟其未得到北京方面的認可，因此陳水扁總統上任兩年後的兩岸不對稱關係中小對大策略時，已放棄了偏向扈從策略給予中國尊重的「四不一沒有」，轉向為鞏固民進黨基本盤的台獨策略。由於兩岸雙方主權的因素，北京並不將台灣視作鐵板一塊的唯一行為者，而區分出台灣官方與民間。民間交流自始至終均未被北京拒絕，官方交流有熱有冷，但民間交流始終存在甚至火熱，這也類似於

---

<sup>28</sup> 林濁水，「國家的不理性的目的與理性決策：『反分裂國家法』和 ECFA 折衝的案例」，吳釗燮，*台海兩岸關係與中國國際戰略*，(台北市：新臺灣國策智庫，2011 年)，頁 175。

中國與朝鮮的關係。將其帶入到 Womack 的大小政治實體理論中，可以看出兩岸關係確實非常特殊。中國大陸作為大政治實體，在台灣官方沒有給予尊重或承諾時，就切斷雙方官方之間的交流，但是仍然給予台灣民間獲取大陸經濟成長紅利。這樣的行為，從政府之間的角度切入並不能算是一個穩定的不對稱理論實踐。然而回歸到原處，北京始終給予兩岸民間一個穩定的交流空間，對於官方之間可以解釋為斷絕，也可以解釋為不進一步交往但維持過去已有的成果。所以，本文認為中國大陸在處理兩岸不對稱關係時，除了武嚇時期，可以將其稱為一個穩定的不對稱關係。

1996 年至 2005 年時期的中國大陸角色變化，已從負責任大國的角色進一步加強至負責任的挑戰者。隨著中國國力的成長，中國威脅論的憂慮將不可避免。因此，扮演一個負責任的行為者，一方面降低他者對於中國威脅的恐懼，一方面幫助中國自身的發展，達成一個雙方均有利的雙贏局面。因此，此時中國負責任角色的發展，體現在不主動製造爭端恃強凌弱，以及扮演區域和平的穩定者。此角色體現在兩岸關係中時，民間始終開放，而當兩岸官方觀點過於懸殊，甚至北京認為台灣官方在意圖改變現狀時，斷絕官方來往，但是保持過去的交流成果，不作為亞洲區域和平的危害者，此即為由熱到冷：武嚇台獨乃至法理反獨的兩岸關係時期。

#### 第四節 兩岸的再接觸：反獨到促統的轉移（2005-2015）

2002年至2010年中國的角色可說是「負責任的挑戰者」。<sup>29</sup>此時的中美關係可以由2006年胡錦濤訪美提出「發展雙邊關係六項主張」做為總結，中國主張展開與美國的高層互動進而增加互信、強化雙方經貿關係，強化互賴，減少衝突、在臺灣問題上尋求美國共管法理台獨勢力。在2005年「反分裂國家法」頒布後，民共兩黨沒有信任且民進黨自身國內議題纏身，兩岸之間的官方斷絕了溝通，反而民間交流火熱。這段期間陳水扁總統宣布廢除「國統綱領」、以臺灣名義申請加入WHO以及「入聯公投」三項與主權爭議有關的議題。然而，陳水扁總統後半段任期的主權紅線議題，均在美國的明確反對下即宣告結束。北京也學習到了在面對臺灣主權挑釁時，自己已然成為負責任的大國，以及區域穩定者的身分，不適合透過過於強硬的方式給予回應，整體而言雷聲大雨點小。直至2008年馬英九總統在競選期間宣布承認「九二共識」當選中華民國總統後，雙方重新回到談判桌上重啟海基、海協兩會對談，兩造官方才又有了交流。

2008年雙方重新起步後發展快速，7月大陸觀光客組團赴台旅遊正式啟動，陳雲林率海協會團來台與海基會董事長江丙坤舉行「江陳會」，同年12月兩岸實現空運、海運與郵政直接雙向三通，12月31日，胡錦濤發表中共對台政策的「胡六條」，被視為兩岸關係在臺灣承認「九二共識」後的中共對台政策新綱領。

馬英九總統執政的八年期間，經歷了胡錦濤與習近平兩任中共最高領導人；也經歷了中國大陸在國際間的角色從「負責任的挑戰者」到「負責任的挑戰者2.0」的角色變化。中國過去的負責任挑戰者角色多半是扮演他者對中國的期望。然在2010年過後，中國角色在美國決定重返亞洲後又做了一次轉變，從「負責任的挑戰者」晉升到了中國自身價值更具分量，且更多自我詮釋的「負責任的挑戰者2.0」。美國作為中國角色最主要投射的重要他者，刺激了中國角色的變化。中國在美國的他者投射刺激下，開始更主動的在國際場域有所作為，在南海議題

<sup>29</sup> 張登及，「外交戰略與國際地位」，頁437-440。

與朝鮮危機中主動性更強。其中歷史自我的「區域領導人」、「區域穩定者」、「自身信仰的捍衛者」隨著中國大陸國力以及身分的上升，顯性的融入了此階段中國大陸的角色認知當中。在兩岸關係中，雖然美國仍然執行「臺灣關係法」中對臺灣的保護協議，仍然售予台灣軍事武器提供台灣自衛能力。然而，中美關係的深化以及兩岸關係的好轉，進一步的降低美國在兩岸關係中所扮演的角色。馬英九總統前朝相比，兩岸交流中美國的角色明顯的小了很多，美國也在他的「一個中國」原則中屬意兩岸之間直接對話，也由於兩岸在這段期間沒有明顯的主權鬥爭，雙方和大於鬥，僅少數時間國台辦要求臺灣不要對中國大陸的人權問題說三道四。

在馬英九總統任期中，可能可簡單地將其兩岸政策歸類為「扈從」，畢竟在馬英九總統「不統、不獨、不武」的架構以及「九二共識」的認同下，兩岸之間快速的彼此交流，臺灣單方面對中國大陸的經貿依賴提高，二十一項協議的事務性協商也是馬英九總統認為在該任期中兩岸關係的顯著政績。然而，在臺灣內部認同本土的變化下，若馬政府在兩岸關係中對中國大陸過度傾斜，必然招致（或已然招致）批評。馬政府時期的兩岸之間談判，始終沒有上升到政治談判。交往本身也可以屬於「避險」的範疇，以及臺灣始終沒有放棄與美國「臺灣關係法」中的軍購硬平衡項目<sup>30</sup>。本文推斷，馬英九總統時期的臺灣小對大政策，應當屬於「避險」的範疇。對北京而言，馬政府早期的作為確實可能讓北京認為馬政府是選擇「扈從」，然而在「先經後政」的「政」只聞聲響不見人影，以及雖然「不獨」但也「不統」的維持現狀最大化選票策略考量，北京可能也認定此時的臺灣小對大策略為「避險」。就兩岸交流成果的觀察，北京對於臺灣政府的「避險」策略處理方式有三。首先，加大兩岸之間的民間交流，意圖透過下層建築（經濟）影響上層建築（政治、意識形態）的方式，慢慢拉近臺灣與大陸的距離。其次，類似於前項，既寄希望於臺灣人民，也寄希望於臺灣當局，希望在現實的交流中，

---

<sup>30</sup> 2008年，美國通過售台30架阿帕契武裝直升機、2010年，美國售臺60架黑鷹直升機、2015年，美國售臺兩艘佩里級巡防艦。以及陸續更新的愛國者飛彈套件等等。



彼此了解進而彼此吸引。最後，在臺灣的國際場域發展中，慢慢的建構出一個給臺灣既限制又適度開放的國際環境，迫使臺灣慢慢地走向北京所想要的「一中」政治框架。2010年，「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FA)生效，本文不討論ECFA對臺灣實質經貿的影響、後續的細項談判順利與否以及是否更陷入「一中框架」的討論。至少可知兩岸經濟合作的架構已然成形，雙方經貿交流更加確立。

2012年習近平在胡錦濤「裸退」之下，執政一開始就三位一體掌管了中共的黨、政、軍體系。此外，習近平藉由反貪肅腐以及成立跨部會組織如深改組與國安委，自己兼任領導人大權一把抓。習近平上台後的快速集權標誌了臺灣面對到的一個權力高度集中的領導人，權力高度集中的領導人較少受到派系的影響，可以在個人意志的展現下「硬的更硬，軟的更軟」，甚至在涉及意識形態的關鍵議題上，可以給予讓步而不會受到國內反制者的借題發揮。強勢的北京領導人搭配更多自我詮釋的「負責任的挑戰者 2.0」國家角色時，兩岸關係在大小政治實體理論內涵中的彈性因素擴大。

在習近平主政後，臺灣的統派勢力領導人有著中國傳統「天下觀」中的「事大」傾向，或曰「避險」內涵的直接參與，透過高層領導人的積極進入大陸訪問宣示「尊重」的行為。北京方面也樂於這個現象的產生。不論是連戰、蕭萬長、吳伯雄、郝慕明等統派代表人物，均多次前往北京與習近平會面。2014年陸委會主委王郁琪與國台辦主任張志軍在南京舉行會談，雙方互稱職位，幾乎可以稱為雙方「互不否認治權」的體現，為雙方主權彼此退讓後的現象。

馬政府的避險策略在上任的前六年展現出了成果，簽訂了二十一項協議。但在最後兩年一方面要承受北京要求政治協商的壓力，以及臺灣內部對於被統一的疑慮。兩方的壓力在2014年3月18日下爆發了「太陽花學運」。「太陽花學運」，透過反對兩岸之間的「服務貿易協定」的程序問題，透露出臺灣社會高昂的反中情緒。北京此後重新思考了對台政策，同年9月26日，習近平會見臺灣統派團體，公開強調「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是實現國家統一的方針。意圖降低台灣本土化對於獨立未來的想像，也傳達兩岸關係中和平處理，基調不變的立場。

中國大陸在 2010 年前後面對到了美國「重返亞太」的再平衡策略衝擊，角色成為了「負責任的挑戰者 2.0」，隨著國力的增強以及集權的領導人，在處理東北亞朝鮮問題以及南海主權議題時，都提升了很高的主動性。但是在處理兩岸關係時，得不到很明確的進展，又在「太陽花學運」後，察覺到了不承認「九二共識」的民進黨有很大的機會重新執政。在這樣的背景下，北京一方面關注於對過去統戰失敗的臺灣「三中一青」對象的重點拉攏。一方面習近平甘冒著反對的聲浪，在兩岸關係中主動踏出了過去領導人達不到的腳步。兩岸領導人於 2015 年 11 月 7 日在新加坡香格里拉飯店舉行「馬習會」，兩岸現任領導人首次會面。

「馬習會」為兩岸關係的里程碑，不但實現了國民黨過去想要實現的願望，也釋放訊息給即將上任的民進黨整府，承認「九二共識」後可能與中國大陸有領導人見面的想像，更給了周邊國家中國確實是負責任國家的角色強化。在過去兩岸危機出現時美國透過軍事力量協助臺灣的民主化，在 911 攻擊事件後，中美兩強找到了新的合作方式，以及解放軍能力近年的高速成長，臺灣問題的重要性下降，致使中美兩國出現衝突的機率也大大降低。在美國重返亞洲後，北京重新面對到過去「第一島鏈」式的封鎖。兩岸關係的變化不僅僅是兩岸之間的主權競爭，更是中美之間的博弈，以及未來中國大陸想要發展成全方位強權的海上強權所必須面對的困難。

中國成為負責任的挑戰者 2.0 後，在中朝關係中主動出手制裁朝鮮；在中越關係中主動推出一帶一路周邊國家建設藍圖。在這段時期，中國除了延續了過去的負責任挑戰者角色外，更添加了自主角色能動性的內涵。過去的中國對朝鮮為被動地將朝鮮推上談判桌，而現今主動給予朝鮮制裁；過去的中國積極與越南一同加入區域整合組織，現今的中國自己端出了中國主導的龐大區域整合政策，表現出了中國亞洲區域領導人角色。在中國的歷史自我以及身分、位置與他者投射四位一體形塑出的中國成為負責任的挑戰者 2.0 角色後，兩岸之間大小政治實體的實踐中，大對小的控制力越來越強，小對大不尊重的風險越來越高。

中國大陸自 2010 年後成為「負責任的挑戰者 2.0」後，於國際場域的作為更

為主動，展現給世人中國對於相關議題的影響性，累積了相當自信。這樣的主動信與自信也表現在兩岸關係中「馬習會」的召開。<sup>31</sup>「馬習會」的象徵意涵重大，締造了過去兩岸雙方最高領導人不見面的歷史。中國大陸進入現在的角色時，除了在國際場域更能有所作為，也在兩岸關係中取得了過去無法達到的進展。然而，馬政府執政的八年雖然給予北京過去達不到的兩岸合作，也讓北京認知到，就算台灣領導人再怎麼宣示目標是統一，受制於民主體制的選票最大化邏輯搭配成長的本土意識，不可能貿然與中國大陸進行政治協商，進一步的討論統一後的配套。而臺灣方面，兩岸關係在大國博弈中，重要性大大降低，時間必然在北京一方，臺灣的選擇變少，以及國內本土認同的逐漸增加。雙向在往不同方向拉扯，這不平衡的現象短期而言造就了民進黨的重新執政，此時期的強大中國與選擇變少的台灣，長期而言可能將在未來以某種形式造成兩岸不對稱斷裂。

---

<sup>31</sup> 中國時報與港媒均有報導指稱，「馬習會」的召開與否在中共高層內部有分歧，最後為習近平拍板定案。不論真實性與否，可以看出兩岸之間現任最高領導人的會面，對於中共內部也是具有爭議，特別在意識形態上。然而，習近平上台後快速集權以及中國在國際場域所積累的自信，均有助於其在「馬習會」中的表態。

## 第五節 重新結凍：馬習會至今（2015 至今）

2016 年，蔡英文總統率領的民進黨在臺灣完全執政，兩岸進入了「冷和」甚至「冷對抗」的局面，首當其衝的就是臺灣近年越發依賴大陸觀光客的旅遊產業鏈。蔡英文總統並不直接觸動北京的敏感神經，也不願意承認他自陳水扁總統時期擔任陸委會主委時就反對的「九二共識」。反之，他以「九二精神」、「九二年會談歷史事實」、「中華民國憲法」的方式婉轉地向「一中」的中間地帶靠攏。<sup>32</sup>然而，北京仍將其視為「交白卷」的行為。對北京而言，不會不清楚民進黨的意識形態或選舉語言中，很大部分將「九二共識」視為「投降共識」，而蔡英文總統正在試著用其他模糊性質的語言包裝「九二共識」的模糊內涵。然而，至目前為止，北京方面的領導人與國台辦官員的發言，將「九二共識」定調為兩岸交流基礎，也將其視為對錯分明的是非題，而非蔡英文總統的申論題。

臺灣方面，蔡英文總統在競選時提出「新南向政策」。目的在於減少對大陸經貿的依賴性，開拓新的對外市場。甚至是「新東向政策」，加強並鞏固台美之間的市場。與川普總統通電，增強臺灣在國際的能見度，一度有臺灣重回談判桌成為中美博弈間籌碼的態勢。然而實際成效如何，還有待後續發展的觀察。目前兩岸之間，敵不動我不動，在臺灣主動跨出半步不被承認後，兩岸互相宣稱對方必須跨出第一步。臺灣認為中國大陸需要主動提出善意，北京則認為臺灣必須承認「九二共識」雙方才有近一步交流的基礎。這樣的「官方冷、民間熱」的交流在國際上誠屬罕見，但在兩岸關係中並不新鮮。過去沒有互信的民共兩黨執政時，雙方也是民間交流火熱而官方冰凍。但是，現今臺灣所面對到的中國大陸已然與過去不同，不但角色有著與 2000-2008 年民進黨第一次執政時期的顯著變化，也面對到了一個更集權的大陸領導人。

習近平上台後迅速的集權，習核心的確立更在十九大政治報告將「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列入黨章後進一步強化。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

---

<sup>32</sup> 可見於蔡英文總統的就職演說、2016 年國慶演說以及 2017 年國慶演說。



心主任寇健文認為，十九大後的習近平以及其他政治局常委的關係，已經轉變為長官與部屬的關係，中共權力格局已經徹底改變。<sup>33</sup>中國大陸在角色轉變為「負責任的挑戰者 2.0」後，積極的布置亞太局勢，透過成立「一帶一路」與「亞投行」以及「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CEP)」的加入，意圖整合亞洲區域的經貿市場，唯獨將臺灣排除在外。兩岸交往的三十餘年間，中國大陸並沒有將臺灣完全排除在區域整合外的實力，也沒有如此快速集權的領導人。<sup>34</sup>然中國大陸透過自身的角色變化，如實質的制裁朝鮮的行為，拉攏到美國盟友南韓的靠近，以及軟實力的輸出，建構了自己定義何謂負責任的「負責任的挑戰者 2.0」內涵。在國際上以更主動的發揮自己的影響力，以及持續推銷自身文化軟實力，輸出自己的經濟與文化成果；在亞洲周邊以「區域領導人」與「區域穩定者」的角色內含定義自己。雖然仍有南海以及與日本的釣魚島爭議，但仍可說明中國大陸的整體國力投射範圍已然比過去擴大了不少，臺灣民主紅利所獲得的國際關注也快速消退。

兩岸之間的大小政治實體實踐中，從未有如此重大的大小實力差距。特別是兩岸關係實質上鑲嵌在中美關係中。中國透過中美關係的加深，以及自己的角色成長，降低美國在兩岸關係中的能動性。過去，美國為兩岸之間出現危機的協調者，甚至多次透過「臺灣關係法」在台海軍備條件中加強台灣的籌碼。但是現在由於中國大陸的角色成長，美方更多時間是兩岸關係中國大陸與台灣自行協調的旁觀者。除非中國大陸在台灣沒有主動挑釁下決定出兵台灣，否則美國不會主動干涉兩岸交流事務。兩岸之間的大小政治實體實踐中，當屬 2008-2016 最符合彈性、不對稱關係裡不同行為者的觀點差異以及通過尊重（由較小行為者提供）和承認自主（由較大的行為者提供）的方式，建立穩定的不對稱關係的定義。<sup>35</sup>

<sup>33</sup> 寇健文，政治大學學者解讀十九大人事：總書記與常委變成長官與部屬，聯合新聞網，2017年10月25日。檢索日期：2017年12月27日。

<<https://udn.com/news/story/7331/2778866>>

<sup>34</sup> 鄧小平時期的中國大陸國力還過於虛弱，不列入討論

<sup>35</sup> Nicolas Khoo, Book Review China Among Unequals: Asymmetric Foreign Relationships in Asia, *Pacific Affairs*, Vancouver Vol. 85, Iss. 4, (Dec 2012), pp. 801-803

當民進黨重新執政後，面對到如此強大的中國對臺灣宣示擁有主權並實行包圍，臺灣再想逃跑顯然力有未逮。如何在黑暗崎嶇的道路中，尋找光亮與方向，摸索出一個兩岸雙方均可接受的交流模式，將是臺灣未來的難題。畢竟，時間是站在北京的一方，一個強大的中國與再想跑掉的台灣，實踐上絕非易事。如何創建出符合現況的兩岸大小政治實體交流，將是台灣未來的課題。

在兩岸關係研究中，1949年至1987年左右，面對到的是純對抗的零和賽局。此時期經歷了古寧頭戰役以及八二三炮戰的戰爭行為，以及台灣主張的「不接觸、不談判、不妥協」政策，雙邊關係沒有交流的可能。直至1986年中華航空334號班機劫機事件，雙方才開始從民間進行接觸與談判。在兩岸1987開放大陸探親後，由於人員交往增加，雙方方正式對口，進行業務交流。雖然在兩岸仍在對抗期間，雙方已有密使交流，但是制度化的兩岸交流，進而發展出的兩岸關係，應從1987年始。是故，本文從1987年起，探討兩岸關係近三十年的變化。

在研究兩岸關係的過程中，小對大的關係也很重要。雖然本節主要以北京觀點出發，但由於兩岸之間的主權特殊性，以及雙方交流密切的特質，果斷地認為北京會忽視臺灣的反應，只根據自身目前的角色特性調整對台策略，是不切實際的想像。本研究認為，中國大陸在國際場域建構出來的角色，會調整在兩岸關係中北京的認知與行為，而非單純的以角色決定行為。北京的兩岸政策會考量臺灣方面的反應而調整作為，在臺灣選擇扈從、避險或對抗的小對大作為時，北京會根據自身當時的角色思維，以及當時北京對臺灣反應的理解，表現出或急或徐，符合當下角色身分的行為。

兩岸關係三十年間，北京經歷了國際場域上的角色變化，而臺灣也在扈從、避險與對抗的光譜中游移。本文認為，若簡單的將兩岸關係視為不考慮時間因素的挑戰、回應；因為中共出台政策、所以臺灣如此回應。則過於傾向短期政策研究，忽視背景而看不出中共對台政策的邏輯。本文試圖將時間拉長，並將分析主軸放在北京自身，搭配北京在國際場域的角色建構，由角色出發，建構出北京在不同角色扮演下的知覺行為。在這樣的脈絡中，更為宏觀的解釋中共對台政策的

連貫性，企圖在兩岸關係研究中，找出中共的主體性與能動性。中共並不只是對臺灣有主權要求的不變政治實體，中共是會考量多方因素而調整對台政策的行為者。

綜觀兩岸關係實質交流發展的這三十餘年，雙方各經歷了四與五任不同的領導人。北京方面為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與習近平，臺灣方面則為蔣經國、李登輝、陳水扁、馬英九與蔡英文。以北京的角度而言，中國大陸在這三十年間，綜合實力大幅度的上升，在國際上的角色也從韜光養晦演變到尋求大國身分，進一步的達到負責任的大國，更進一步的自我詮釋負責任大國內涵的變化；臺灣方面則不斷的在自我認知中調整國家認同，從過去的正統中國繼承到本土意識的抬頭雙向拉扯，這造就了兩岸關係三十餘年的起與伏甚至翻轉，以及北京面對臺北的不同策略考量與處理方式。



## 第五章 結論

兩岸關係的複雜與動態發展的特性，並不能簡單的一言以蔽之，複雜在於中國的變化以及兩岸主權的特殊性。動態的發展使得兩岸關係研究並不能面面俱到，達到一個大家都滿意的狀態。本文聚焦的重點在於，透過角色理論的爬梳，先探討中國角色型塑的過程。透過中國的歷史自我以及中國是天下觀底下培養出的他者投射，兩相結合整理中國的角色變化。尤其在中國邁入現代後賦予其「身分」與「地位」兩個自我概念，再試圖整理現代中國自我認知與他者投射後產出的角色。透過中國大陸的角色建構過程，分析中國在特定時間內的角色以及其特性。

其次，透過 Womack 的大小政治實體理論，以及中國自身的角色變化，觀察中國越南與中國朝鮮兩個不對稱理論的案例實踐中，中國作為大政治實體展現出的特性。中國在實踐中越關係以及中朝關係時，一方面受到自身角色的影響，另一方面受到不對稱關係交流中的限制，並不能無視小國意願的為所欲為。因此。透過中國與越南和朝鮮的關係實踐，可以對於中國在大小政治實體概念中，處理兩岸關係的啟示。

最後，整理不對稱理論中小國對於大國的可能選擇，以及中國大陸的角色變化，搭配兩岸關係三十年間的重要轉折點，將兩岸關係分為四個時間點。



表 5-1 中國歷史自我角色表

時間點	角色	角色特質
中國傳統天下觀	天下領導人、天下保護者、周邊民族榜樣	理想天下觀中，中國作為天下領導人應育而生的角色
兩漢與南北朝	區域領導人、區域保護者	天下觀實踐過程，實力被降階被迫接受的角色
唐代	天下領導人、天下保護者、周邊民族榜樣	中國重新強盛，最為符合傳統天下觀中的角色
宋代	漢族中心的：區域領導人、區域保護者	開始出現天下觀中未有的漢族中心主義
清代	非漢族中心的：區域領導人、區域保護者、受害者	非漢族中心的多元天下觀實踐，以及傳統中國面對主權國家挑戰後的角色內涵
中華人民共和國	中國革命解放的堡壘、反帝國主義的代理人、受害者、共產國際的忠實盟友、區域領導人、區域保護者	新時期的中國，融合了國際現實與過去天下觀中的角色發展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

中國歷史自我的重要性在於其代表的中國特殊性以及角色理論基礎，主要內容有天下觀的源起、天下觀的實踐以及中國進入世界後天下觀國家與民族國家的碰撞。天下觀是一個哲學概念中的理想，在中國歷史實踐與他者互動的過程中，出現了變形，並不是一個無所不包且沒有變化的典範。在理想中，中國為天下的領導者、天下的保護者以及周邊民族的榜樣，並不要求周邊的小政治實體(四夷)體制完全複製成中國的政體。且對於周邊小政治實體多要求宣示效忠或建立關係，

而非中國自身主權的擴張。但是在實踐中，往往因為它者實力的成長或中國實力的削弱，被迫接受自己成為區域領導者的現實。

到了清朝末期，清王國在與西方國家接觸後，碰撞出了天下觀中所沒有的主權火花，更確立了自宋朝開始的主權概念。中國改變了過去「天下觀」的統治概念，明確了主權領域範圍即領土界線。這是中國自我與他者；天下觀與民族國家作用下的一個重要里程碑。中國繼承了過去歷史自我中的中國角色，以及今日的國際情勢，建構出今日的中國角色。

角色必然隨著情勢而轉變，但是曾經扮演的角色內涵不會消逝，而將轉換特定形式出現在新一輪的角色建構中。以中國歷史而言，區域領導人與區域保護者的角色內涵幾乎不曾消逝，在中國能力許可之時中國均試圖再現這過去的角色內涵，今日的中國也是如此。

下圖對比中國近三十年來，角色變換之間以及中越關係、中朝關係以及兩岸關係時序上的對照。透過三個例子來應證中國版演不同角色時，面對周邊國家所產生的差異。

表 5-2 中國角色斷代以及中越、中朝與兩岸關係比較

	中國角色	中越關係	中朝關係	兩岸關係
1982-1989	美蘇兩強中的平衡者	仍在戰爭的對抗期	中國唇齒關係的忠實盟友	開始接觸
1989-1996	內部與周邊發展者	關係正常化	由於南韓問題關係凍結	交流深化、由於主權議題試射飛彈
1996-2002	負責任的大國	雙邊關係正常、雙方國界確定	關係破冰	克制主權議題過激反應、民間交流
2002-2010	負責任的挑戰者	簽署「南海各方行為準則」	督促朝鮮參與六方會談	反分裂國家法、民間持續交流、重啟官方交流

2010 至今	負責任的挑戰者 2.0	一帶一路、南海問題加劇	主動制裁朝鮮	馬習會、中斷官方交流、加大力度拉攏台灣民間
---------	-------------	-------------	--------	-----------------------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

從上表格可以看出，本研究試圖闡述中國在不同的角色中，面對越南、朝鮮以及台灣的政策輸出特性。可以看出中國在不同時期處理周邊國家議題方面，有一定的一致性。中國基於不同角色的理解，會改變其看待國際事務的特性。從關係的建立，到雙邊交流的方式，均隨著中國的角色而有所轉變。有證實必有證否，研究中國的角色行為時不可能要求中國面對自身核心利益時也處處讓步。因此，探討中國不同角色的變化如何影響對外政策中，仍需理解某些特定議題（例如兩岸主權）是中國意識形態中最硬核（Hard Core）的一塊，操作手法可能改變，但原則並不會隨之變化。本研究認為，中國大陸角色近三十年變化的影響有兩種層次。宏觀而言，中國大陸處理周邊事務的主動性越來越強，也更有自己的特色；微觀而言，中國大陸處理雙邊交流的細節，如大對小的讓利行為，以及面對到衝突的尋求共識、擱置爭議進而繼續合作行為，也符合中國歷史自我中的某些特性。

最後，本研究依然存在幾項研究限制。首先，由於本文的分析途徑為角色理論，主要仰賴作者的詮釋，所提供的研究並非為解釋個案發生的因果關係，而是提供不同於既有觀點的論述型研究。其二，兩岸關係是一個動態且複雜的過程，在資料蒐集上較難齊全。再者，在進行個案比較時，本文所選擇的個案之間，本質方面的差距可能造成可比性不足而解釋力偏弱的現象。然而本研究仍有三項貢獻，其一是將中國自身的變化帶入兩岸關係的研究領域，其二是透過角色理論的方式探討中國在兩岸關係中的變化，進一步補充大小政治實體的內涵。其三是融合上述兩點，討論中國在全球與區域政治舞台的角色建構與兩岸之間雙邊互動行為間的關聯。本文希望透過外交決策分析的途徑，即角色理論的視角，解讀中國

大陸這三十年間的變化，同時將中國大陸對自身角色的認識放入權力不對稱理論的框架中進一步分析，以解析中國大陸的國際角色變遷與兩岸在權力結構不對稱下如何互動以及其影響。希望藉由本研究的成果，提供另外一種兩岸關係研究的視角，進而補充現有兩岸關係研究的文獻。





## 參考文獻

### 一、中文書籍

- David M. Lampton 著，林添貴譯，**從鄧小平到習近平**，(台北市，遠流，2015年)。
- John Mearshimer 著，潘崇易&張登及譯，**大國政治的悲劇**，一版二刷(臺北市：麥田出版社，2014)，頁 476~493。
-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二卷(1949-1978)上冊，(北京市：中共黨史出版社，2011年)。
- 王柯，**中國，從「天下」到民族國家**，(台北市：政大出版社，2017)。
- 石之瑜，**政治心理學**，(台北市：五南，1999)。
- 李英明，**重構兩岸與世界圖像**，(台北市，生智，2002)。
- 沈有忠，「美中台三角關係：改良的戰略三角分析法」，**展望與探索**，第4卷第3期(95年3月)，頁 39~32。
- 沈志華，「『唇齒相依』還是『政治聯姻』？—中朝同盟的建立及其延續(1946-1961)」，**近代史研究所集刊**(台北市)，第63期(民國98年3月)，頁 147-194
- 易君博，**政治理論與研究方法**，(台北市：三民書局，1990年)，頁 165。
- 秦亞青，**關係與過程：中國國際關係理論的文化建構**，(上海市：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
- 許倬雲，**我者與他者-中國歷史上的內外分際**，(台北市：時報文化，2009.10)。
- 陳永發，**中國共產革命七十年**，上冊，二版(台北市：聯經出版社，2001年)。
- 陳寅恪，**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唐代政治史述論稿**，(台北市：里仁書局，1980)。
- 游梓翔，**領袖的聲音：兩岸領導人政治語義批評：1906-2006**，(台北市：五南出版社，2006)。
- 楊開煌，**出手-胡政權對台政策初探**，(臺北：海峽學術出版社，2005年)，頁 21~26。
- 葛照光，**何謂中國-疆域民族文化與歷史**，(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14)。
- 趙汀陽，**天下體系：世界制度哲學導論**，(河南省：江蘇教育出版社，2005年)。
- 劉仲敬，**遠東的線索：西方秩序的輸入與中國的演變**，(新北市：八旗文化，2017)

年)。

黎安有、施道安著，何大明譯，**尋求安全感的中國**，(新北市，左岸文化出版，2013)。

蘇起，**兩岸波濤二十年紀實**，(臺北市：遠見天下文化，2014年)。

## 二、中文期刊與書籍章節

Le Hong Hiep，「建交後越南對中國的避險戰略」，**全球政治評論** (台中市)，第四十九期 (2015年)，頁 149-180。

林文程，「台海兩岸關係的現況與未來」，蘇起、童振源，**兩岸關係的機遇與挑戰**，(台北市：五南，2013年9月)，頁 55。

林濁水，「國家的不理性目的與理性決策：『反分裂國家法』和 ECFA 折衝的案例」，吳釗燮，**台海兩岸關係與中國國際戰略**，(台北市：新臺灣國策智庫，2011年)，頁 175。

河凡植，「中國對朝鮮半島地緣經濟戰略與其對中國南北韓關係之影響」，**中國大陸研究** (台北市)，第 55 卷第 1 期 (民國 101 年 3 月)，頁 41-70。

秦亞青，**關係與過程：中國國際關係理論的文化建構**，(上海市：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

袁易，「安全典則與美『中』關係：一個認知社群的分析」，包宗和、吳玉山，**爭辯中的兩岸關係理論**，二版 (臺北市：五南，2012年)，頁 269-299。

高朗，「從整合理論探索兩岸整合的條件與困境」，包宗和、吳玉山，**爭辯中的兩岸關係理論**，二版 (臺北市：五南，2012年)，頁 19-51。

張五岳，「分裂國家模式之探討」，包宗和、吳玉山，**爭辯中的兩岸關係理論**，二版 (臺北市：五南，2012年)，頁 53-79。

張登及，「『再平衡』對美中關係之影響：一個理論與政策的分析」，**遠景基金會季刊** (台北市)，第 14 卷第 2 期 (2013 年 4 月)，頁 71-72。

張登及，「外交戰略與國際地位」，王振寰、湯京平、宋國誠，**中國大陸暨兩岸關係研究**，(新北市：巨流，2011年)，頁 422-449。

張登及、金世勛，「朝貢體系下中小國家的避險行為：朝鮮半島的兩個歷史案例初探」，**政治學報** (台北市)，第六十三期 (2017年)，頁 63-79。

張登及、陳瑩義，「朝貢體系再現與『天下體系』的興起？中國外交的案例研究與理論反思」，中國大陸研究第（台北市），55 卷第 4 期（民國 101 年 12 月），頁 102-103

游智偉、張登及，「中國的非洲政策：軟實力與朝貢體系的分析」，遠景基金會季刊（台北市）第 12 卷第 4 期（2011 年 10 月），頁 111-156。

童振源，「兩岸關係與區域經濟」，王振寰、湯京平、宋國誠，**中國大陸暨兩岸關係研究**，（新北市：巨流，2011 年），頁 500。

黃偉峯，「兩岸協商談判經驗之比較：1990-2010 年」，吳釗燮，**台海兩岸關係與中國國際戰略**，（台北市：新臺灣國策智庫，2011 年），頁 107

黃瓊菽，「關係平衡 v.s. 普世改造：中美國際干預風格與大戰略思維之比較」，中國大陸研究地 58 卷第 4 期，民國 104 年 12 月，頁 71-92。

趙建民，「中共談判行為」，蘇起、童振源，**兩岸關係的機遇與挑戰**，初版（臺北市：五南，2013 年），頁 123-143。

蔡東杰，「近期中國對亞洲外交政策及其影響」，全球政治評論（台中市），特集（2015），頁 17-30。

### 三、中文網路資料

中共中央台辦、國務院台辦授權，就兩岸關係問題發表聲明，**人民網網站**，2000 年 5 月 20 日。

<<http://www.people.com.cn/GB/channel1/10/20000520/71092.html>>

中國首次向美國表態：南海是中國核心利益，**多維新聞網**，2010 年 7 月 4 日。

<<http://news.dwnews.com/global/big5/news/2010-07-04/56163054.html>>

「中國—東協全面經濟合作框架協議」，**中華人民共和國海關總署網站**，2010 年 9 月 7 日。

<<http://www.customs.gov.cn/customs/302249/302310/302311/302312/302319/394883/index.html>>

「中國—東協全面經濟合作框架協議」，**中華人民共和國海關總署網站**，2010 年 9 月 7 日。

<<http://www.customs.gov.cn/customs/302249/302310/302311/302312/302319/3>>

94883/index.html>

中國視南海為核心利益 美嚴拒，**中時電子報**，2010年11月10日。

<<https://tw.news.yahoo.com/%E4%B8%AD%E5%9C%8B%E8%A6%96%E5%8D%97%E6%B5%B7%E7%82%BA%E6%A0%B8%E5%BF%83%E5%88%A9%E7%9B%8A-%E7%BE%8E%E5%9A%B4%E6%8B%92.html>>

中韓建交後，金日成沉思後說了一句話，**鳳凰衛視新聞網**，2012年9月24日，

<[http://phtv.ifeng.com/program/zmdfs/detail\\_2012\\_09/24/17852739\\_0.shtml](http://phtv.ifeng.com/program/zmdfs/detail_2012_09/24/17852739_0.shtml)>

中國同越南的關係，**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網站**，2016年12月。

<[http://www.fmprc.gov.cn/web/gjhdq\\_676201/gj\\_676203/yz\\_676205/1206\\_677292/sbgx\\_677296/](http://www.fmprc.gov.cn/web/gjhdq_676201/gj_676203/yz_676205/1206_677292/sbgx_677296/)>

中國與越南積極展開「一帶一路」基建項目，**香港貿易發展局網站**，2017年4月13日。

<<http://economists-pick-research.hktdc.com/business-news/article/%E5%9C%8B%E9%9A%9B%E5%B8%82%E5%A0%B4%E7%B0%A1%E8%A8%8A/%E4%B8%AD%E5%9C%8B%E8%88%87%E8%B6%8A%E5%8D%97%E7%A9%8D%E6%A5%B5%E5%B1%95%E9%96%8B-%E4%B8%80%E5%B8%B6%E4%B8%80%E8%B7%AF-%E5%9F%BA%E5%BB%BA%E9%A0%85%E7%9B%AE/imm/tc/1/1X000000/1X0A9HQV.htm>>

中國對朝鮮再施壓，要求境內朝企業明年1月前關閉，**BBC 中文網**，2017年9月28日。<<http://www.bbc.com/zhongwen/trad/chinese-news-41434613>>

「中國日益走進世界舞台中央」，**人民日報十九大專題報導**，2017年10月22日。

<<http://cpc.people.com.cn/19th/BIG5/n1/2017/1022/c414305-29601479.html>>

『兩岸經濟統計月報』，(台北：行政院大陸委員會) 120期 表八 臺灣對大陸貿易占我外貿之比重。

<<http://www.mac.gov.tw/public/MMO/MAC/%E5%85%A9%E5%B2%B8%E7%B6%93%E6%BF%9F%E7%B5%B1%E8%A8%88%E6%9C%88%E5%A0%B1no.1208.pdf>>

『兩岸經濟統計月報』，(台北：行政院大陸委員會) 284期 表二 兩岸貿易占外貿比重。<[http://www.mac.gov.tw/public/MMO/MAC/284\\_2.pdf](http://www.mac.gov.tw/public/MMO/MAC/284_2.pdf)>

『兩岸經濟統計月報』，(台北：行政院大陸委員會) 284期 表十 我國對外投資統計-國家(地區)別。

<[http://www.mac.gov.tw/public/MMO/MAC/284\\_10.pdf](http://www.mac.gov.tw/public/MMO/MAC/284_10.pdf)>



「南海各方行為宣言」，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網站，2002年11月4日。

<<http://www.mfa.gov.cn/nanhai/chn/zcfg/t4553.htm>>

胡錦濤在中國共產黨第十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人民網網站，2012年12月8號。<<http://cpc.people.com.cn/n/2012/1118/c64094-19612151-8.html>>

要求中國停止侵犯越南主權的行為，越南社會主義中央政府門戶網站，2011年5月28日。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10823131431/http://cn.news.gov.vn/Home/%E8%A6%81%E6%B1%82%E4%B8%AD%E5%9B%BD%E5%81%9C%E6%A2%E4%BE%B5%E7%8A%AF%E8%B6%8A%E5%8D%97%E4%B8%B%E6%9D%83%E7%9A%84%E8%A1%8C%E4%B8%BA/20115/3404.vgp>>

寇健文，政治大學學者解讀十九大人選：總書記與常委變成長官與部屬，聯合新聞網，2017年10月25日。<<https://udn.com/news/story/7331/2778866>>

「國家統一綱領」，行政院大陸委員會網站，民國80年2月1日。

<[https://www.mac.gov.tw/News\\_Content.aspx?n=AD6908DFDDDB62656&sms=161DEBC9EACEA333&s=E843129F8763C0DD](https://www.mac.gov.tw/News_Content.aspx?n=AD6908DFDDDB62656&sms=161DEBC9EACEA333&s=E843129F8763C0DD)>

梁寶華，「中共仍將堅持和平統一、一國兩制和江八點」，工商時報，1999年8月19日，第十版。

「臺灣問題與中國統一」白皮書，人民網網站，1993年8月31日。

<<http://www.people.com.cn/BIG5/channel1/14/20000522/72537.html>>

#### 四、英文書籍

Womack, Brantly. “*China and Vietnam: The politics of Asymmetr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2006.

Womack, Brantly. “*China among Unequals Asymmetric Foreign Relationships in Asia.*”, World Scientific Publishing Press, Singapore, 2010.

## 五、英文期刊與書籍章節

- Bart Dessein, "Historical narrative, remembrance, and the ordering of the world." Harnisch, Sebastian, Sebastian Bersick, and Jörn-Carsten Gottwald. *China's International Roles : Challenging or Supporting International Order ?* ( NY : Taylor & Francis, 2016 ) , Volume 2, pp. 22~37.
- Cameron G. Thies. & Marijke Breuning, "Integrating Foreign Policy Analysi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rough Role Theory." *Foreign Policy Analysis*, ( 2012 ) , pp. 1-4.
- Chih-Yu Shih & Chiung-Chiu Huang, "Identity and international role of China." Harnisch, Sebastian, Sebastian Bersick, and Jörn-Carsten Gottwald. *China's International Roles : Challenging or Supporting International Order ?* ( NY : Taylor & Francis, 2016 ) , Volume 4, pp. 59~76.
- K. J. Holsti, "National Role Conceptions in the Study of Foreign Policy."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14, No. 3 ( Sep., 1970 ) , pp. 233-309.
- Lynch, Daniel C. 2004. "Taiwan's Self-Conscious Nation-Building Project." *Asian Survey* 44(4), pp. 513-533.
- Nicolas Khoo , Book Review China Among Unequals: Asymmetric Foreign Relationships in Asia , *Pacific Affairs* , Vancouver Vol. 85, Iss. 4, (Dec 2012): 801-803.
- Saunders, Phillip C. 2005. "Long-term Trends in China-Taiwan Relations: Implications for U.S. Taiwan Policy." *Asian Survey* 45 ( 6 ) pp. 970-91.
- Sebastian Harnisch, "China's Historical self and its international role." Harnisch, Sebastian, Sebastian Bersick, and Jörn-Carsten Gottwald. *China's International Roles : Challenging or Supporting International Order ?* ( NY : Taylor & Francis, 2016 ) , Volume 3, pp. 46.
- Sebastian Harnisch, "China's Historical self and its international role." Harnisch, Sebastian, Sebastian Bersick, and Jörn-Carsten Gottwald. *China's International*

*Roles : Challenging or Supporting International Order ?* ( NY : Taylor & Francis, 2016 ) , Volume 3, pp. 38~58.

Sebastian Harnisch, “Conceptualizing in the Minefield: Role Theory and Foreign Policy Learning.” *Foreign Policy Analysis* Vol. 8 ( 2012 ) pp.63.

Sobel, Richard, William-Arthur Haynes, and Y. U. Zheng. 2010. "Trends-Taiwan Public Opinion Trends, 1992-2008: Exploring Attitudes on Cross-Strait Issues." *The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74 ( 4 ) :782-813.

Womack, Brantly. “China as a Normative Foreign Policy Actor.” , CEPS Working Document No. 282, 2008 。 <<http://aei.pitt.edu/11662/1/1607.pdf>>

Wu, Yu-Shan., "Taiwan's Domestic Politics and Cross-Strait Relations." *The China Journal* No.53, 2005. pp.35-60.

Yudan Chen, “Philosophy, Identity, and Role Theor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Harnisch, Sebastian, Sebastian Bersick, and Jörn-Carsten Gottwald. *China's International Roles : Challenging or Supporting International Order ?* ( NY : Taylor & Francis, 2016 ) , Volume 5, pp. 77~94.

## 六、 英文網路資料

Cameron G. Thies, “Role Theory and Foreign Policy”, pp.9~12.

<<http://myweb.uiowa.edu/bhlai/workshop/role.pdf>>

Global Firepower Countries Ranked by Military Strength 2016, Global Firepower.

<<http://www.globalfirepower.com/countries-listing.asp>> 。

SIPRI Fact Sheet Trends in World Military Expenditure 2015, Stockholm

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 <<http://books.sipri.org/files/FS/SIPRIFS1604.pdf>> 。

The World Bank GDP ranking 2015, World Bank Group.

<<http://data.worldbank.org/data-catalog/GDP-ranking-table>>.